

# 中華崛起未？

全球化時代中軟實力的競賽

林垂宙



# 中華崛起未？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唐 · 王維

# 中華崛起未？

全球化時代中軟實力的競賽

林垂宙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0

初版 2010  
第二次印刷 2010

ISBN 978-988-8028-95-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 目錄

|                       |     |
|-----------------------|-----|
| <b>第一章：緒言</b>         | 1   |
| 歡迎中華時代                | 2   |
| 各章內容概略                | 13  |
| <br>                  |     |
| <b>第二章：全球化</b>        | 23  |
| 全球化的思維：風流人物看今朝        | 24  |
| 全球化中看兩岸關係的轉折          | 33  |
| 全球化對中國人的機遇            | 38  |
| 全球化中華企業的建立            | 45  |
| 全球化看人才：世界級大學與軟實力      | 50  |
| <br>                  |     |
| <b>第三章：軟實力</b>        | 57  |
| 從中華文化看軟實力與硬實力         | 58  |
| 中華文化的實力觀：硬實力與軟實力孰優    | 63  |
| 中華文化的實力觀：硬實力與軟實力共生與運用 | 68  |
| 軟實力的消失：政治人物職業病        | 73  |
| 實力共生案例：從北京奧運看中華崛起     | 78  |
| 實力崩潰案例：卡特里娜巨颶天災變人禍    | 83  |
| <br>                  |     |
| <b>第四章：香港</b>         | 89  |
| 全球化中香港的競爭優勢：歷史特色      | 90  |
| 回歸十二年看香港：技術化與人才培育     | 96  |
| 回歸十二年看香港：民主化          | 103 |
| 曾蔭權的民意煩惱：軟實力的消失       | 110 |
| 曾蔭權的民望轉機：重建軟實力        | 116 |
| 香港與珠三角在全球化中的新定位       | 122 |
| 香港與珠三角發展的關鍵：軟實力       | 127 |

|                     |     |
|---------------------|-----|
| <b>第五章：台灣</b>       | 133 |
| 台灣領導文化軟實力的培養        | 134 |
| 台灣領導文化軟實力的式微        | 139 |
| 全球化對台灣的挑戰           | 146 |
| 總統大選與選舉文化           | 152 |
| 台灣民主化的勝利            | 159 |
| 民眾是民主選舉的贏家          | 163 |
| 認識台灣的價值觀與軟實力        | 168 |
| 馬英九的全民總統情結          | 174 |
| 馬英九的考驗：重拾軟實力        | 179 |
| <b>第六章：他山之石</b>     | 185 |
| 從軟實力競賽看以巴歷史糾紛       | 186 |
| 伊朗的平反與抉擇：核電乎核武乎     | 191 |
| 民主化過程的示範：美國總統初選     | 197 |
| 奧巴馬的全球性挑戰           | 206 |
| <b>第七章：兩岸未來</b>     | 215 |
| 兩岸合作的障礙：意識與情結       | 216 |
| 兩岸的共同橋樑：孫中山的理想      | 221 |
| 兩岸合作的契機：變數與盲點       | 226 |
| 兩岸合作的關鍵：塑造軟實力       | 233 |
| 兩岸合作的願景：從辛亥革命百年談起   | 238 |
| <b>第八章：軟實力領導的典範</b> | 243 |
| 徐賢修：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先知     | 244 |
| 孫運璿：建設台灣胸懷中華        | 257 |
| 霍英東：平凡的人非凡的事        | 276 |

第一章

# 緒言



# 歡迎中華時代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探索一個問題：中華崛起來？

中華崛起了嗎？從表面來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難道還需要懷疑嗎？我們所關心的應該是：這中華的崛起，是不是可持續的(Sustainable)，會不會只是一個過渡(Transient)的現象。

或許我們應從深一層問，究竟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應該憑藉甚麼力量，才能達成長治久安？才能在全球化時代競賽中保持位列前茅？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在全球化時代中的競賽，有幾個特點：

- 時間與空間極度壓縮：人與人、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聲氣相聞，來往頻仍。任何問題發生，必需審慎考慮，並需快速回應。
- 競爭的對手，會以多種面貌、從各個方向出現，因此敵友難分，亦敵亦友。
- 競爭的賽場，是多方面的，長時間的，有可觸摸的，亦有虛擬的。
- 競爭的方式，是多類型的，是物理的，亦是精神的。

- 競爭與合作共存：在一方面的競爭，不排除在他方面的合作。
- 突發事件，將成常規：危機處理，是總體組織效能的表現。
- 地球資源是有限的，但可以創新：人的知識和意志是最後的決定要素。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且回顧一下歷史的教訓吧！

## 西歐

自十八世紀中葉起，西歐是世界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一連串在能源（水力、煤炭、蒸汽機）、材料（鑄鐵）、機械（紡織）、交通（火車）方面的科技發明和經濟創新，促成了工業革命，帶來了人類生活及文明上重大的改變。隨後內燃機、電力、鐵道、輪船等技術的成熟和廣泛應用，加速了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到了十九世紀初，西歐國家如英、德、法、意、荷蘭、瑞典等，紛紛崛起，各擅勝場，成為國際政經舞台上的要角。國家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及它的人均值(Per Capita GDP)，被廣泛採用為國家經濟力量的指標。

## 北美

到了二十世紀初，國際社會經濟活動的重心，逐漸進入北美。由於科學的探索及生產技術的改良，美國的生產效率大增，經濟力量隨之大幅增長。一方面因美國國內的建設開發刺激了消費市場的擴大，一方面亦因重大的科技發展，如飛機、汽車、電話、電報、越洋通訊、人造塑膠等的應用，使人民生活的品質，在食、衣、住、行、音、樂各方面，都能全面提升。這雙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促使美國的經濟力量，更上一層樓。

這時在基本科學方面，經過歐美兩洲多年的共同孕育，已有超時代的進展。如量子物理、相對論、原子結構、染色體等，進展之重大，應可稱之為突破。它們大都在世紀的前二十年提出，成為此後人類知識發展的基石。

1930年間計算技術、人造纖維、噴射引擎、訊號數碼化相繼出爐，導致了五〇年代中半導體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的重大成就，而為社會廣泛的採用。電子資訊技術，因之成為二十世紀中葉後，社會與經濟進步的最大動力。在此之外，網絡、光纖、多媒體、無線通訊、軟體設計等平台技術，紛紛建立，相互構成資訊經濟的支撐要件。以科技及創新為要素的「新經濟」(New Economy)或「知識經濟」(Knowledge Based Economy)，於焉成形，儼然成為人類歷史上的新工業革命。這些新科技的研發，和經濟創新的推動，擴及全球，但大都以美國為焦點。

美國以崇尚自由，鼓吹平等，尊重人權，恪守法治，實行民主為主張立國。以此號召全球，成為民族的大熔爐 (Melting Pot)。美國對各種文化，極力兼收並蓄，更增加它的包容性及創造力。基督精神的博愛、同情、敬神，亦成為多數美國人民的價值觀。美國的本土，沒有遭受兩次世界大戰戰火的破壞，所以在二十世紀中葉，立國不過兩百年，已經卓然崛起，成為世界自由國家的盟主。美國的實力，在經濟及軍事方面，無可懷疑的是世界第一。至於政治、科技、人文等，在二十世紀中，亦趨於全盛。

據2002年的一個國際調查研究，世界人士覺得美國吸引人的主要有三點：科學技術，娛樂（音樂、電影、電視），民主理念，這些都是軟實力的範疇。可注意的核子武器的儲備量、迅速的軍事動員力或龐大的GDP等明顯的硬實力，反不是美國令人傾倒的優點。

美國在韓戰、越戰以後，人民安於逸樂，社會浮奢成風，然而基礎建設日為老化，生產效率相對降低，加以信用貸款盲目膨脹，經濟亦流於泡沫化。個人先遊玩後會帳(Play now, pay later)，政府成為大印鈔機，所以國家與國民，同樣的是債台高築。今日美國的國民人均負債，已與國民人均所得相當。

經過兩次石油危機、1987年股市崩盤、中東戰火燒錢日以億計、2009年銀行倒閉、金融海嘯如狂風橫掃，全國上下，無不飽受其害。目前雖然喘息方定，但失業率高達

10%、政府赤字巨萬，美國的經濟何時復蘇，仍是奧巴馬政府的重大挑戰。可以肯定的是若非科技發達，創新有方，民主政治基礎穩固，法治規範成型，美國早已破產。「花無百日紅」、「福者禍所伏」，這些老生常談，實在是至理名言。

## 日本

「十年風水輪流轉」，時代的巨輪，在二十世紀中葉後，已經慢慢的向東亞傾斜。

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後，社會民眾已感受到能源和環境對生活的威脅，但美國企業界為保護固有利益，多數躊躇不前，居企業龍頭的汽車工業，並未積極改良技術，反遊說政府，以多種藉口，拖延改善的努力。在這關鍵時刻，日本汽車業乘虛而入，積極推出低油耗、低排放、低維修、低價格的產品，以前通用(General Motors)、福特(Ford Motors)所堅持的不可能的顧客夢想，紛紛在豐田(Toyota)、本田(Honda)汽車產品中實現。所以日製汽車迅速稱霸新大陸，美國的汽車工業，由此江河日下。

2008年時，豐田已超越通用成為汽車業的霸主。汽車工業的經濟關連性極高，因此美國所有的衛星工業及百般周邊關係服務業，為之一蹶不振。美國的家用電器業及企業機械業，如電視、音響、傳真機、打印機、複印機等，在日本「高品質、低售價」雙重夾擊下，亦相繼豎上白旗。

所以現時美國的主流工業，多為日本所取代，目前可以稱霸全球的除速食店、精品咖啡、商品流通、金融服務等外，已經寥寥可數。美國的航空工業雖然仍是全球泰斗，但在911事件後，航運業極受打擊，市場亦今非昔比。

日本以工業技術及管理為手段，利用環境的變遷與時空的壓縮，異軍突起，逼使美國工業屈膝，不可不說是二十世紀中葉後的異數。美國以經濟實力崛起稱雄，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何其短暫？

## 中華

1970年後，台灣在蔣經國、孫運璿政府領導下，勵精圖治，落力培育人才，提升工業技術，推行民主選舉，尋求國際合作。二十年之間，台灣的經濟由日據殖民時代的基本農業主體，逐漸轉型為技術工業經濟。若干台灣設計、製造的工業產品，特別在電子、電腦、光電、機械、材料等領域中，在世界上已居領導地位。

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有市場經濟的基礎，以法律運作的規範，三十年來是中國與國際貿易的重要通道。隨着中國大陸的開放，現代化與國際貿易的成長，香港的經濟力量日為升高。台灣、香港兩地，自1990年代初，同列名「亞洲四小龍」。兩地的競爭力，在過去二十年中，各列世界前茅。

中國自1980年代中，鄧小平第三度平反主政，廢棄毛澤東的教條主義，採取開放式、現代化的經濟政策。一方面改良農業生產，一方面恢復私有財產制，十年之間，成績斐然。1990年後，江澤民主政，繼續鄧小平的政策，並主張「三個代表」的務實路線，以「小康社會」為發展目標。各省市、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可謂一日千里。

在此期間內，台灣科技產業因民進黨政府在本土的壓擠，紛紛西進大陸，以求生存，並以大陸為國際化跳板。台商與大陸企業的力量互補互惠，十年來形成了「台灣設計—大陸製造—全球市場」的營業模式，加速中國科技製品，暢銷全球，這可稱之為「中華全球化企業」模式的開端。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產品主要製造基地。

胡錦濤執政後，提出以建設「和諧社會」為目標，實行「科學發展觀」的策略，擴大建設發展，十年來中國的總體經濟，已層樓更上。

中、台、港三地優勢的結合，促使大中華經濟力量崛起。在1980年初，中、港、台三地的經濟總和，約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到2008年時，三地的GDP已急速增長而為美國的三分之二。中國目前是美國的數一數二債權人，存額接近萬億美元。據保守的估計，如以目前8%的經濟增長率計，到了2020年前，中國經濟國力將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位，這將是「中華崛起」的明確表示。

## 歷史教訓

日本的崛起，相對來說亦是短暫的。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學習西歐國家的富強之道，厲行西化。數十年間，終於船堅炮利，成為一方豪雄。然而軍國主義者的傲慢，得到天皇的默許，在中國、東南亞、太平洋挑起瘋狂的戰火，但最後引火焚身，終於生靈塗炭，不得已終向盟國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利用美國的協助，幸能在廢墟上重建，又採取中國儒家「止於至善」的理念，及兵家「精準嚴密」的實行，用之於企業管理。並利用美國社會浮華不實的空隙，從全球工業競賽中崛起。然而盲目膨脹，是企業的大患，亦是日本企業階層的通病。2009年冬豐田汽車失控的事件，導致全球一千萬車輛的召回整修。這個事件目前還在演變之中，如不能精心改善，還「誠信」於顧客，將是日本工業潰敗的前奏。

日本是一個奇特的民族：日本民眾特別是專業人員非常友善、守分、可信、進取；但企業家及政治領袖甚多頑固、傲慢、保守、腐化，這是非常可以惋惜的事。日本政治領袖許多沒有勇氣面對歷史，承認二十世紀上葉在亞洲侵略的暴行；亦沒有誠信放棄既有利益，厲行革新，所以年輕一代日本人在全球化社會中深具排斥之挫折感。最近三年之內，日本三度變換內閣，足見日本青年，已積極有求新求變之心。

美國自二十世紀中葉起的全盛，現時仍有龐大的軍事力量，但並不能免除今天的經濟困難。2009年奧巴馬總統上任之後，矢言變革，以謀求解決當前經濟的危機。然而此次金融海嘯的根源，乃是消費者及銀行長期不守信約而引起，冰凍三尺，豈乃一日之寒。政府所推出的多項刺激方案，如果只是圍魏救趙，或削足適履，即使印刷更多鈔票，恐未能對症下藥。需知激發國民信心，重建賴以立國、強國的軟實力，應是種種改革方案的首要。

## 展望中華崛起

由此可見，崛起的國家，在急速變化的全球化時代中要能持續站在世界前茅，除了硬實力之外，更需要有軟實力：賢能的政府，公義的社會，守法的行為，以科技創新，以誠信處世，尊重歷史文化，保護生態環境，協助弱小民族。

今天中國經濟雖然已經高度增長，但國家整體發展仍面臨重大挑戰。特別是社會各層，未能建立誠信守法的規範，而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富人與貧民的兩極化，日為尖銳。過去數年間，毒奶粉、毒玩具不幸已成中國產品在世界的標籤；假藥、假貨、煤災、礦災、盜版軟件、非法排放等事件充斥於全國各地。更可憂慮的是公職人員的腐化，據官方報導2009年全國立案偵查的職務犯罪案達32,439件，牽涉41,531人；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大案18,191件，重大瀆職侵

權案3,175件，其中不少在司法與公安部門執法服務。近年已來，被判刑、「雙開」、「雙規」的領導階層，從部會、省、廳、市、局、處等比比皆是。重慶市掃黑事件中，報載有三千三百名執法人員，包括高級官員，參與黑道的運作。政府官員如知法犯法，濫權腐化而肆無憚忌，長此以往，社會自是無法無天。一個沒有品質的法治社會，是很難長期稱雄於世界的。

朱鎔基前曾告誡財務金融的幹部：不做假帳！真是一針見血的警語。類似的話，應該在政府各部門宣示。歸根到底，中國人必須回歸誠信，才能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公義、和諧的社會。這些才是可以支撐中華崛起的力量。

在台灣方面，五十年來建立的公義理念及中華文化價值觀，受到陳水扁執政的扭曲和破壞，已經元氣大傷。台灣能否恢復上世紀末的雄風，端在能否重振激奮淬礪的志氣，建立一個高品質的法治社會。

在香港方面，九七回歸展開了歷史的新頁，但十餘年來，政府及社會領導大都以能保持國際商貿競爭力而沾沾自喜，未有積極開創的作為。香港所面臨內外的威脅，其實相當嚴峻。在全球化洪流中，不進則退，可不慎乎！

二十一世紀是中華民族的世紀，這是很顯然的。但中華民族要能在世界上持續崛起，發揮領導作用，除了上述的基礎問題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兩岸三地的華人，要能在台灣海峽的兩岸達成和平共存，並攜手共進。假如兩岸

在共同語言、文化、歷史、宗族、遠景、利益之下仍然不能互相尊重，積極包容，那如何說服世界其他的國家民族：中國人追求和諧，愛好和平，而能成為他們的榜樣？

中國人是否能有適當的準備去接受這個歷史性的挑戰呢？中國人在新的世紀裡，除了有龐大的市場、勞工、科技等經濟力量，及火箭、太空、核武等軍事力量外，仍需塑造甚麼力量，成為競賽中的終極致勝因素，而可持續領導歷史前進，這個答案，還有疑問嗎？



## 各章內容概略

本書文章，主要來自作者2007至2009年間在香港《信報》刊載的「南沙隨筆」專欄。這些文章，不是學術性的論著，而是出於作者對中國未來前途的關切，有感而發，隨興寫出。既非黃鐘大呂，亦無微言要義，只是就事論事，實話直說。

專欄文章，自然有數字限制，只能點到即止。但有時不能自己，嘮叨過度，承編輯先生優容，常把過長的文章，瓜分兩次刊出。然因版面安排所限，段落的分隔，標題的顯示，有時與原意有所出入。在這書上，都已重新審訂，若干文字，亦作了一些修飾，以便前後連貫。所以各篇文章，並非只從報上複印。各章的排列，以主題歸類，和《信報》刊出次序不盡相同。

### 第一章「緒言」

說明本書的主題，在於探討中華是否崛起，能否持續。人類科技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進步。西歐是工業革命的起源地，所以從十八世紀起，自然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隨著美國獨立，科技創新活動西移，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逐漸轉移至北美。到二十世紀中葉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知識經濟

來臨，美國的實力臻於全盛。晚近三十年，世界的經貿重心陸續擴散至東亞，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世紀了。然而在全球化的競賽裡，能致勝、可持續的力量，不是硬實力，而是軟實力。近五十年來美國和日本經濟力量的崛起浮沉，是一個明白的教訓。對大中華地區來說，經濟硬實力已顯明的在崛起中，但在軟實力方面，隱憂仍多。未來另有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台灣海峽兩岸能否達成和平合作。兩岸要能互助互利，看來亦要從共同培養軟實力着手。

## 第二章「全球化」

本章之主旨為全球化。甚麼是全球化？對中國人有甚麼特殊意義？作者對全球化的來臨及其對中國人的挑戰，在二十年前已開始關切。

第一節敘述作者1993年春與江澤民晤談的經過及內容。雙方對全球化三個成分：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及其對中國未來的影響，以及台海兩岸問題的解決，當時已有基礎性的討論。「國號、國旗、國歌」等細節而重要的課題，亦坦誠的溝通，同認為待時機成熟時，應而由當代國人討論商定，而不受歷史包袱的束縛。作者此時對台海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充滿信心。

第二節探討此後十年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不理想，原因何在？對此轉折作了一個分析，並大略指出台灣及大陸各自的盲點。

第三節闡述全球化的內涵。作者認為全球化的時代洪流，實際上是包涵了民主化、技術化、國際化三個主流的相互激盪。作者認為中國人對這三個主流都不陌生，有許多歷史事實可以佐證。所以中國人應能成功的面對這個挑戰，並以之為奮發圖強的手段。

第四節說明過去十五年台海兩岸在科技產業的合作，已為彼此開拓了新的天地及經濟力量。「中華全球化企業」的營業模式，已在實踐中成形。

第五節闡述培養人才的重要。軟實力的養成，應是未來大學教育的一重要目標。目前全球的主要大學，莫不以爭取成為世界一流為目標，但甚麼是「世界級大學」，並無定論。作者提出一個回歸基本常識(Back to Basic)的看法。

### 第三章「軟實力」

本章主旨分析軟實力的來源、本質及影響。作者認為軟實力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上是根深蒂固的。

第一節引述老子「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理念，是硬實力與軟實力關係的根源。

第二節比較軟實力與硬實力的相對重要性。孔子所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已把「誠信—軟實力」作為施政最後不可撤離的防線。

第三節再從中國的傳統文化，說明軟實力與硬實力兩者，並非對立的。實際上兩者相輔相成，互動互生。許多

知識經濟社會的科技、產品及企業，如電腦及軟件、貨物流通、建築設計等都是例證。

第四節分析政治人物易患的通病，姑名之為「政治人物職業病」。即因軟實力之流失，背離誠信，最後終為選民所棄。

第五節把2008北京奧運，作為硬實力與軟實力相互配合的正面案例。中國能夠把這次奧運會辦好，是中華崛起中的一個明證。

第六節把2005年卡特里娜颱風對紐奧良的襲擊及政府的危機處理，作為軟實力與硬實力崩潰的負面案例，指出最後的結果是把天災變成人禍，不亦悲夫。作者認為類似事件亦可能發生在中國，建議政府對長江三峽水壩作周期性之檢查及檢討，以確保公共安全及人民福祉。

## 第四章「香港」

香港回歸中國主權，是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象徵著中華民族對殖民主義侵略者的勝利。回歸十三年來，香港在全球化中的競爭力，有些甚麼改變？未來香港的發展，應該如何走？和珠江三角洲的關係，該如何定位？都是本章的主旨。

第一節說明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形成了它的特殊的歷史文化，這是其他城市所無法比擬的優勢。香港未來的發展，應該建立在這基礎上，對中國的未

來，更有正面的貢獻。這亦應是鄧小平揭橥「一國兩制」的意義。此外，香港在國際化上沒有重大的改變，但空氣污染日為嚴重，將影響國際企業在香港投資的意願。特區政府在污染防治上的努力，十年來乏善可陳。

第二節從技術化檢討香港，憂喜參半。回歸十年來，香港人才匯集，對大學有正面的影響，已有三名高校，列名全球前五十名大學之列。但科技研發進步仍為緩慢，主要原因為政府投入過小，而管理措施缺乏軟實力的思維。

第三節指出香港的民主化十年來甚少進展，令人失望。主要原因為特區領導不能善體「一國兩制」的政策意義，領導港人，建立共識，並向中央反映民意。

第四節分析特首的煩惱，為軟實力的流失，逐漸背離民信，似已感染「政治人物職業病」。

第五節建議特首重建軟實力，以重拾民信。

第六節分析香港與珠三角應重新定位，並捨棄回歸前之合作營運模式。

第七節指出香港與珠三角發展之關鍵為人才之培育、技術之提升以及政府軟實力之重建。

## 第五章「台灣」

台灣1970年代後在經濟與社會的進步是多方面的：國民所得躍升，國民教育普及，生活品質改善，中小企業抬頭，地方自治圓熟，全民普選成型。這種在經濟、社會、政治、

文化多方面的改革和升級，在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甚為罕見，所以廣稱為「台灣奇蹟」。但在2000年以後，各項進展躊躇不前；2008年以後，台灣的政經發展又有新的轉折。台灣的浮沉，和軟實力的變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分析這些演變，是本章的主旨。

第一節敘述1950年後台灣前三任總統的領導風格及對台灣的影響。蔣中正是傳統式軍事領袖，爭議極多，但他是一個民族英雄，堅持中國傳統文化及孫中山三民主義所建立的中華民國，奠定台灣安全的基礎。嚴家淦是技術官員的表率，以專業、守法、忠勤、廉潔為楷模。蔣經國有世界觀，以科技建設台灣，推行民主政治，拔擢本土人才，其後開放黨禁、報禁、海禁，並開啟與大陸重新交通之門。

第二節評述後三任總統。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李是台籍專業人士，蔣優為栽培。李就任後銳意改革，善用政治矛盾，瓦解國民黨而獨攬大權；其後縱容台獨、財閥、黑道以影響民主選舉，是一敗筆。陳水扁以台獨為名，分化社會，貪污瀆職，終墮法網。馬英九書生本色，崇法守分，上任以來，左右支綽，是否已感染「政治人物職業病」？

第三節分析國際化為台灣經濟所必需，但在陳水扁政府時被政治化及邊緣化，成為「鎖國」奇觀。

第四節在台灣的總統大選前，分析台灣選舉文化及陳水扁破壞公義的可恥。

第五及六節評論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是「二次政黨輪替」，這表示台灣的民主化已走上正確的方向。這是民主化的勝利，老百姓是最大贏家。

第七節分析台灣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實際上不只因發展科技產業。它的發展過程，受到一種獨特的價值觀所支撐，就是：崇尚中華文化，注重教育科技，實施民主政治，追求國際合作。這些是台灣崛起的動力。

第八節分析馬英九以極大多數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但他的民意支持快速下降，原因何在？他有甚麼難解的情結？

第九節指出他必須重拾軟實力，才能回復民信及民望。

## 第六章「他山之石」

2007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初選正如火如荼進行，兩黨候選人甚多，然而辯論尖銳而不鄙俗，過程熱烈而不粗暴。推銷治國理念，表現個人軟實力，這自應是國家民主化的典範。作者當時預測，美國下任（第44任）總統必在弱勢族群選出：老翁、婦女、黑人。與此同時，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訪美，在哥倫比亞大學辯論，單刀赴會，舌戰群儒，自有奪人的軟實力氣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藉此了解軟實力特性的應用。

第一節和第二節是對艾哈邁迪內賈德在哥大辯論的述評。艾氏在極不友好的情況下，侃侃而談，展示個人的容忍和勇氣，自是一種軟實力特性的表現。

第三節評述美國總統大選初選兩黨候選人的狀況：彼此如何與選民溝通治國理念。

第四節評述奧巴馬總統面臨的挑戰。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因個人及金融機構的喪失信用引起；外交的困難與美國失去友國的公信力有關。如何建立美國政府的軟實力和硬實力，誠信應是重要的考慮。

## 第七章「兩岸未來」

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崛起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在台灣海峽兩岸達成和平共存，使兩岸同胞並肩攜手，互助互惠，而非劍拔弩張，先殺個你死我活。雙方經歷五十年的隔離，尋求快速融合，事實有所不能。然而時間的拖延，將會使固有的感情淡化，在全球化的時代裡，亦可能產生新的變數。本章的主旨，為探討兩岸的意識和心理障礙，勾劃共同的橋樑、分析合作的關鍵，並展望合作的遠景。

第一節闡述台灣先民捍衛華夏文化的傳統，其後因甲午割讓、二二八喋血，因之加深了悲情心態。此種意識，原與台獨無關，大陸同胞對之必需了解及尊重，更可進一步體會台人的勤奮、敬天、同情心與正義感。

第二節指出孫中山受兩岸共同景仰，中華的文化傳統「大同社會」是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追求。

第三節和第四節闡述兩岸各自的不安定因素及盲點，指出擋置爭議、共創未來的四個機緣，主要都在軟實力的範疇。

第五節是在辛亥革命近百年的前夕，分析近年來兩岸的三個考驗，展望未來兩岸關係的積極發展。

## 第八章「軟實力領導的典範」

這一章記載作者對三位前輩的回憶：孫運璿、徐賢修、霍英東。對作者來說，他們是「亦師亦友」。在近十年來有緣共事，較有親炙馨頤的機會，因此對他們的志節事功，能有直接的感悟。他們的背景經歷，各有不同，但都有強烈的愛國心，而公忠謀事，誠信待人，服務社會，與人為善，三位都是一致的。

孫、徐兩位，在1975至1990年間，是蔣經國團隊的重要成員。孫在經濟部長任內，推動台灣十大建設，並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徐在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任內，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並出任工研院董事長。兩人領導各類專業人員，以科技為載具，促使台灣經濟脫胎換骨，並早日進入知識經濟社會。今天台灣在全球化中保存競爭力，孫、徐兩位是最重要的功臣。

霍英東在香港白手興家，熱心公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環境窘迫，霍不計安危，為國服務。1980年後鄧小平實行開放政策，霍率先響應，致力協助珠三角之建設。1999年與香港科技大學成立南沙資訊科技園，以培養人才，研發技術，促進創新，建設大珠三角地區為目標。



# 全球化

第二章



# 全球化的思維：風流人物看今朝

1993年春天，我以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身份，趁赴北京訪問中國科學院之便，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先生會面。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我們交換了對許多課題的看法，包括了全球化、國家實力，及未來海峽兩岸合作的核心敏感問題——國號、國旗、國歌等。見面當天深夜，我和同事在北京旅舍中，詳細記載會面的經過。我必須聲明，下面所記載的，是我個人的對話記錄(verbatim)。

時間：1993年3月24日晚8時

地點：北京中南海

人物：江澤民（中共中央總書記）

周光召（中國科學院院長）

王佛松（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王兆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事處主任）

劉震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事處局長）

---

林垂宙（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 內容：

江總書記首致歡迎之意。

**林** 此時適逢人大及政協會議期間，先生公務繁重，而蒙撥冗接見，至感盛意。

**江** 素聞林先生領導工研院，對台灣應用科技與產業之發展，甚有貢獻。當今國內正在重要發展時刻，如未能當面請教，實為憾事。

此行聞為先生四十年來首次回中國，希望能盡量遊賞。如北京、長城、敦煌、酒泉等地，都是無比的河山勝景，亦可懷念中華的歷史文化。想當年，漢武帝為獎賞霍去病，大宴將士，君臣盡歡，飲酒如泉，涓涓不絕，故有酒泉之稱。而敦煌勝地，氣象萬千。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如孔子所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都是做人做事的精髓。又如莊子所謂：「一樹之木，日取其半，百世不竭」，應為西方微積分中無限理論 (Infinity theory) 的要義。

兩岸血濃於水，希望能捐棄成見，共同攜手，為中華民族創造新局面。林先生對國際情況，至為熟悉，此次不遠千里而來，希望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有所指教。

**林** 個人才能淺薄，在工研院工作十年，因為政府的積極支持與產業界的配合，幸或略有成效。這次來大陸，不作公開拜會、避免媒體接觸，就是希望能安靜的觀摩和學習。國內外情況甚為複雜，個人是一個科技人員出身，看到的亦很膚淺。不過今天機會非常難得，或可針對國際潮流及對中國可能的影響，提出一些看法，請你指正。今天所談的內容，個人將不對外公開。

最近二十年來國際情況的變化，沿著三個主流發展，每個主流，各產生若干旋渦或逆流。所以這是一個急速變化及動盪的時代，不無令人眼花繚亂之處。

第一個主流是民主化。世界各地人民，都有強烈的要求政治民主化。民主化的支流，就是多元化，社會各階層及各族群都有各自的訴求。民主化與多元化實是二而為一。所以為求民主化的正常發展，國家必須勵行法治，要用法律來規範政府、團體和人民之間的遊戲規則。

第二個主流是科技化。科技發展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國家必須要能發展科技以促進各項建設。所以有富庶天然資源的國家不一定很強盛，如沙烏特阿拉伯、阿根廷；而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不一定會貧窮，如日本、荷蘭。科技及其對經濟的發展，亦產生若干不良的影響，如環境污染、生態敗壞等，所以亦引發了回歸自然的逆流。

因此國家科技發展應要能整體性的作先期規劃，以兼顧自然生態的均衡。

第三個主流是國際化。民主化與科技化的結果，逐漸消除世界上天然的和人為的障礙，所以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文明洪流。但是國際化亦引起了區域個體的警醒，為了保護個體的利益，區域性的壁壘紛紛成立，遠的如歐洲共同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近的如兩岸經貿關係的分合與對立等。兩岸雙方都有合則兩利的共識，但亦各有堅持，如何突破瓶頸，必須有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的基本善意。

具體來說，個人願就這三方面，提出一些建議。第一在政治方面，國內除了應持續推行政治民主化外，應盡速建立法治。應在近期內訂定法律，確保產業、財稅、土地、勞動投資、科技發展、環境保護等遊戲規則。時機是很重要的，訂定完善法規的時刻，一瞬即逝，現在正是歷史性的窗口，應予把握。

第二，加強科技的發展，不只是基礎研究，亦要注意工業技術。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光把資源灌溉在基礎研究上，並不一定能得到科技產業的果實。個人認為高科技產業的樹根有很多，基礎研究只是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現代的科技，去建立國家現代

化的基礎建設，包括交通、通訊、電力、人力培訓等；此外亦要有整體性的區域規劃，中國幅員廣大，各區域應可建立各自的特色。否則各地都看到明星項目，見獵心喜，自然會發生重複投資。

第三在國際化方面，遠的不用多說，最切身的是兩岸關係。台灣的科技、產業、國際經貿關係的成長，對促進大陸未來的建設，應有重要的正面的意義。大陸地方廣大，資源豐富，人才眾多，條件比台灣優異多了，實在不應該去限制台灣的發展，不應該壓縮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台灣對大陸不會產生實質的威脅，但是大陸時常擺出武力攻台的姿態，在這種狀態下，如何能促進互信互賴？所以大陸對台灣，希望多些尊重和包容。

江先生熟習中國歷史，自然知道周朝秦伯「以大事小」故能得鄰國的信賴的故事。如果大陸對台灣最近發表的「國家統一綱領」，能有善意的回應，那麼未來兩岸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未來，自然是水到渠成。

**江** 林先生所提出的三點，很有意思。我有話要說。有關第一點民主化，我相信民主化是相對的。我這是套用愛恩思坦  $E = mc^2$  的相對論的「相對」。今天在中國，已經民主得很，馬路上到處都有人批評政府，其實只要不鼓吹以武力推翻政府，我們是讓人民有充分的自由的。美

國、英國的那一套，不見得都適合中國。香港有一個報紙主編查良鏞，平時大肆議論，鼓吹香港民主化。其實香港受英國統治百年，香港總督集行政、司法、立法大權於一身，哪有民主可言，多年來沒聽說他們倡言反對，現在九七要到了，他們就要鼓吹民主了。在電視上我看台灣立法院裡，有打人、罵人的、有年青欺負年老的，這真是民主化嗎？所以我說民主化是相對的。

**林** 江先生，我的意思是民主化要在法律的規範下進行，所以建立法治是很重要的。法律當然會依國情而異，依時空而異。我所說的另一個重點，就是現在是大陸訂立法律的好時機，再過十年，很多事情就晚了。

**江** 我同意你所說的民主化要透過法律達成。我們這次人大會議裡，就會訂定一些和產業、經濟發展等等有關的法律。至於你所說的第二點有關科技與 Infrastructure，我亦很同意，我們正積極進行中。要讓中國十億人口吃得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要改良中國的 Infrastructure，還是遇到很多困難。

至於第三點，兩岸關係。我們的前提是，中國是不可分割 (Inseparable) 的一個國家。我說過我們可以讓台灣有獨立的政府，獨立的作法，甚至有獨立的軍隊，但是，台灣和中國，是不可分割的。我們現在已經不常說以武

力解放台灣的話，但是我們亦不會說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台灣有人要搞獨立，國際上亦有人要分化中國，我們不能不防著些。像李潔明 (James Lilley)，他在這裡說得好好的，回到美國，就說不同的話了，這些人就不願意看到中國統一。

不久以前，美國前任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 為了達賴喇嘛來看我。他說我們壓迫西藏，屠殺西藏人，不讓西藏獨立；藏人只有二百多萬人，但是漢人在西藏的卻有三百萬。我說卡特先生，你錯了，西藏人口約二百一十萬人，漢人在西藏的約三十萬，多從事商貿和各種基建。西藏一直是中國的領土。幾年前我去西藏，看到達賴喇嘛就任時中國政府給他的授權文書，那個文書是當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代表（主席）蔣介石頒給的。西藏早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不可置疑的。你要西藏如何如何，豈不是干涉中國內政。我說得卡特啞口無言，他所要抗議的，亦就不了了之。所以，台灣一定要認同是與中國一體，不可分割的。

**林** 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已多次表明反對台獨的立場。以目前情形來看，台獨在台灣，實際上沒有多少市場。但是我坦白的說，在台灣的同胞，固然認同一個中國，但是這個中國，是叫「中華民國」的中國，是孫中山和革命先烈推翻滿清君主政權後所建立的。同樣的所認同的國旗，

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雖然中華民國以前亦用過不同的國旗，但總不是五星旗。不過這麼多年了，大陸同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以五星旗為國旗，理念的不同，當然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歸根到底，這些情結要如何才能解開呢？

**江** 關於國名、國旗、國歌的問題，我們到現在還沒正式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可以經由雙方共同的、好好的來談。我年輕的時候，每天在學校要升旗，升的就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每個星期的紀念周，都要讀國父遺囑。我對「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是會背誦的。所以對這個旗，我們並不陌生。這個國名，是不是就可叫做「中國」呢？這些都是在中國是不可分割的一個國家前提下，大家可以商談的。

**林** 每個人都不免有歷史的包袱，你這個超然的態度，極為獨到，我很佩服。

**江** 歷史的包袱，我們並不一定都要承擔。毛主席的《沁園春》詞說：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他的本意，原亦沒有前人優於後人，後人要承受歷史包袱的意思。

**林** 所以我們不要老想過去，要往前看。

**江** 對了，要看未來。

這時王兆國插話，海基會有消息來，有一位許處長，希望前來見面，大約明天就要動身（看錶），今天晚上還會有信息。

**林** 希望辜汪會談，能順利進行。

**江** 汪道涵是我做上海市長的前任，我是接他的職務的，他可以完全代表我們的意思。今天很高興能夠和你見面，並交換了這麼多意見，很抱歉我下面還有別的約會，希望以後我們可以再見面，常常聽到你的意見。

**林** 謝謝。謝謝你的款待。（完）

九時十分握手道別後，劉震濤代表送到門口，路上說，今天江總書記有關國名的話，以前沒有這麼清楚說過。

翌日我亦和朱鎔基總理會面，對技術發展問題，交流了許多意見。當晚中科院宴會中，周院長對我說，昨天江總書記關於國旗國名的話，應是第一次這麼說。



## 全球化中看兩岸關係的轉折

我在1993年3月中旬訪問中國大陸，這是我四十多年來首次訪問大陸。到達北京的時候，正逢第八屆中國人代及政協的會期。江澤民就在這次會期中，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名實俱備的國家第一領導人。對任何個人來說，這正是事業的巔峰，自然是躊躇滿志，對未來充滿構想和期待。在兩岸關係上來說，「辜汪會談」正在籌備中，再過一個月的光景，如果一切順利，應會在新加坡揭幕。

我躬逢其盛，自覺要把看到的一些核心敏感的問題，以個人的身份，先搬到檯面上，促使國家領導的注意。先把醜話說在前頭，以後雙方重提的時候，自然較為方便些。我的想法，應從世界大環境說起，所以從「全球化」切入。當時全球化這名詞，在國內仍不很普遍。但是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則已耳熟能詳。

海峽兩岸的未來，是我多年關心的問題。我衷心希望兩岸的糾紛，能够早日和平解決。五十年來，國共雙方經過多次的分合，時而兄弟擁抱、把酒聯歡；時而齟齬成仇、兵戎相見。多少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歷史悲劇，由此造成。兩岸間的恩怨情仇，積重難返，變成了後人的歷史包袱。

自2008年台灣的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三通，逐步實現，兩岸的關係，看來略現曙光，但實際上前途難測，變數仍多。然而可想而知的，未來兩岸問題的解決方式，必須拋棄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鬥爭思維的束縛，而在全球化社會中競爭合作的框架上建立。

今天我們重新檢視江澤民的態度，可以發現在1993年時他對全球化的認知，已相當深入。他引述毛澤東對歷史領袖軟實力的批評，和他看未來的自我期許，亦特別引起我的興趣。可以說，十六年前他對兩岸問題的解決已經有了一個甚為開放的胸懷，甚至對最敏感的國號國旗的徵結，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以客觀的態度等候協商，這是我覺得很可欣慰的事。

然而過去十六年中，兩岸關係仍然在原地踏步，一直要到最近馬英九上台以後，才有顯著解凍的跡象。原因在哪裡？仔細想想，兩岸本身，均有若干預料不及的發展。

在台灣方面，我回台灣後將這個會面經過向總統李登輝報告，很意外的他的反應冷淡。我認識李的時候，他是中華民國副總統，當時我亦新任工研院材料所所長。此時李對以科技進步促進經濟發展的事，非常關心，我和他見面甚為頻仍。十年來李對於科技發展、台灣前途及工研院之關心，令我十分感動，彼此互動融洽。可這次對這個如此重大的問題，他只指派了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宋心濂和我在圓山俱樂部晤面，解釋「國家統一綱領」的背景，及政府全盤考慮的需

要。我的心裡頗為納悶，接著觀察多項事情的發展，對他在兩岸問題心深處的立場，逐漸有了新的感悟。顯然我在兩岸關係上的行動，走得太快了，不是他內心所願意看到的。

李登輝在1993、94年間施政最大的優先是鞏固政權，逐一消除國民黨黨內大老對他的反抗。兩岸問題不是當時的重點，「國家統一綱領」是高層次的一個招數，藉以緩和黨內的壓力。一九九六年他以民選總統的身分，獨攬黨、政、軍大權之後，才著手處理他的重政大計。他逐步將國民黨原有勢力分解重組，並以多種方式，在黨外培養民進黨。到了2000年時，在台灣五十年的國民黨已分崩離析，因將政權拱手交給和他「情同父子」的陳水扁，最後他更乾脆脫離國民黨，成立了極綠的台聯，以方便他在兩黨之外，有一個操控台獨大業的平台。這些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就發生在這十五年中，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和他有較密切來往的十年中，可說是不知不覺。

我和許多人一樣，對李縱橫捭闔、翻雲覆雨的本領在目瞪口呆之餘，當然不能作較客觀的評價。我和江澤民會面時所說李的反台獨立場，實在是犯了書生幼稚病的錯誤。現在看來，台海兩岸問題的冰凍僵持，辜負了十五年的大好的光陰，自然是理所必然！

在大陸方面，十五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固然是值得欣喜的事，但過度膨脹，不免亦帶來了若干併發症，包括自大及表面化。對台灣的問題，最高領導如江澤民所提出「去包

袂、看未來」或胡錦濤所提出「建立互信、共創雙贏」等大格局，顯然未能在黨領導階層裡產生深入的回應。國內到今天，仍有許多人「不願」或「不敢」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歷史事實；對在台灣一個以憲法程序選出的總統馬英九，只能稱呼是「台灣的領導人」。

大陸的領導階層，許多對台灣過去五十年所建立的中華價值觀及軟實力的文化基礎，未能充分的體會，以為台灣的實力，不過科技經濟發展而已，現在大陸的GDP更大，增長率極高，自然可以主宰一切。存著這種皮相的態度，免不了有刻意矮化的鬥爭心態，如何能促進尊重及互信？實際上不敢面對歷史，就是缺乏自信和勇氣的象徵。

無論如何，中華民國是個事實。當年周恩來、鄧小平去歐洲留學時，難道不拿著「中華民國護照」嗎？回想歷史上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斯大林、托洛斯基等逐鹿天下，群雄並立，互有起落。報章雜誌之中，時常有前時之人物相片或被更換，或出天窗，世界讀者引為現代奇觀。諸如此類的小動作，何異於掩耳盜鈴。當時我們笑說：《真理報》(Pravda)沒有消息，《消息報》(Izvestia)沒有真理。此類鴕鳥心態，實甚可笑。嚴肅一些來說，如果我們不敢承認自己的歷史，如何能批評日本人不敢承認南京大屠殺。

其實江澤民引述的毛澤東，是一個充滿自信而欣賞軟實力的人。在毛的心目中，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遠不如他的文采風騷；成吉思汗，只會用蠻力，當然是等而下之

了。所以在毛、在江的心目中，未來的世界中，軟實力自會有決定性的重要。只是我們應如何去看待文采風流或了解軟實力的真正意義呢。

多年來我一方面為尊重和江澤民的會談，一方面因兩岸關係錯綜複雜，認為必須審慎以大局為重。國名、國旗、國歌茲事體大，兩方的堅持，自是必然的事，亦可以說這將是兩岸和談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底線。如在建立共識前把這次會談曝光，自會滋生困擾。所以十多年來，我一直保持緘默。但現在所有當事人都已離開現職有年，兩岸關係已在逐步解凍之中；而全球化的洪流已然成形，社會對創意思維，較能以客觀的立場看待。所以這個時候重溫這個歷史性的啟示，應該是時候了，亦可給關懷中華民族前途的人們，增加一點對前途的信心和克服困難的勇氣。



# 全球化對中國人的機遇

綜觀二千年來歷史演進的軌跡，人類社會上的千變萬化，大都隨著三個主軸發展：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這三類變化交互影響，匯聚成為社會進步的歷史洪流。

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他2003年膾炙人口的《平坦世界》一書裡，指出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導致生活、思維、工作、商貿、個人與社會、國家與國家間行為的變遷。他說這些變化，可以拿三個重要的日子作為里程碑，就是「一一九」，「八九」和「九一一」。

## 社會變化三主軸

「一一九」是指1989年11月9日，那天柏林圍牆被推倒了，這象徵著蘇俄共產國際極權的崩潰。「八九」是指1995年8月9日網景公司(Netscape)在美國公開發行，開啟了全球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的序幕。「九一一」當然就是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大廈的悲劇，這是國際恐怖主義者對全球的宣示。因此弗氏指出，世界上各種人為的樊籬已陸續撤去，世界已是平坦化了。

以我的看法，「一九一」所代表的變化，是民主化；「八九」所代表的，是技術化；「九一一」所代表的，是國際化。這就是人類社會變化三個主流的最好註解。全球化是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三者交叉整合、加速發展的極致。

中國人對於這三種主流變化，已有數千年的經驗。而且時常能因變求通，開創新局面。

## 技術化

技術是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與經濟民生和國防安全，息息相關。中國人在指南針、造紙、火藥、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奠定了世界物質文化進步的基礎，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

其實中國人在人類技術化上的貢獻何止於此，單以秦始皇帝來說，他在政治上縱有千般不是，但在人類技術文明上，他的建樹，是超越時代的。他所推動的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可說是現時知識經濟社會中以「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共同標準」(Common Standards)、「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創造財富的標竿，都是知識經濟社會中國際商貿的基石。

在二十世紀後期，中國人在半導體集成電路及筆記本電腦的製造和流通，都已居世界首位。在人造衛星的發射和控制等領域的成就，亦有傲人的國際水平。這些技術上的發展和貢獻，未來人類文明歷史上將可記上一筆。

## 民主化

從民主化的主軸來看，孔子、孟子的學說，可以說開啓世界民主政治理念的先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都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的宣示。《禮運·大同篇》裡孔子「天下為公」的理念，可說是民主制度的精髓。《大同篇》裡一百零七個字，言簡意賅的闡述了一個民主而公義的社會。涵蓋選舉、立身、家庭、就業、老幼扶養、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安全網等方面的政策目標，塑造了一個「和諧社會」的境界。

民主化的基礎是民意、法治、公義。一個國家究竟是君主政體或民主共和，倒不一定有絕對的影響。譬如英國、瑞典、荷蘭、日本，現在仍有「君王」，然而她們都能尊重全民選舉，以法律保障人民權益，奠定社會公義機制，所以仍是國際公認的民主化國家。反觀歷史上斯大林、希特勒等都自詡民主，而且透過威權的操縱，他們的得票率可達百分之九十九，各自建立了無上的權力。然而他們殘民以逞的作為，層出不窮，最後都為人民所唾棄。東德和北韓，國名都標榜民主，實則不知何謂民主，自取其辱。

孔子、孟子，是民主化的先知先覺，他們的貢獻可說超越時代。可是他們的理想，一直要到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先烈，推翻了二千年的帝皇威權統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體，才有機會在中國實施。中國人對民主共和政體的運行，到現在才不過一百年的經驗，過程非常坎坷和曲折。

在歷史的長河裡，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蔣經國在台灣，鄧小平在大陸，各自推動了政治改革和經濟創新。雖然他們兩人的做法，不盡相同，但各自都得到了輝煌的成果。這些成就，在歷史上自有不可動搖的地位。今天中國人終於可在世界上揚眉吐氣，展開歷史上的新一章了。

## 國際化

從國際化來看，中國西漢初期的張騫、班超遠拓西域，建立了絲綢之路，開闢了亞洲、中亞、歐洲之間的交通幹道。歐、亞大陸之間的經貿文化交流，自此絡繹不絕。唐朝玄奘披星戴月，跋涉千里到印度研修佛學，是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先導。元朝成吉思汗、馬哥孛羅促使中國文化西傳，更是國際化的重大事件。

到了明朝初年，鄭和在二十年中，率領了數萬海員，作了七次海上探險。旅蹤遍及大洋洲、印度洋、中東及南非等地，建立了海上絲路。這些都是中國人拓展國際貿易的重大成就，亦是對「平坦世界」的先期貢獻。

我們現時談到國際化企業，盛稱歐洲菲利浦(Philips)、愛立信(Ericsson)、西門子(Siemens)等等大企業集團。實際上中國人敬天畏神，宗教自由，各種民族之間的容忍，早已建立了國際化的精神條件。二百年來中國人默默的拓展國際商貿活動，卓有成績。閩南人在菲律賓，潮州人在泰國越南，客

家人在印尼馬來，廣州人在北美，浙江人在歐洲等，都是非常卓越的例子。而且他們大都跳出政府主導的窠臼，而以個人企業或中小企業的型態出現，可以說是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先驅。

實際上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這三種變化，是交互影響的。以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崩潰為例，促成它淪亡的原由眾多，醞釀已久，然而，它的導火線可說是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當事件發生的時候，正是資訊技術風行全球的開端。全世界的有識之士，透過電話、傳真、電視，屏息以待，嚴密關注北京的動態。當時在大陸外的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狀況，恐怕比許多大陸內的還要看得多，看得清。當電視熒幕上出現一個瘦小的人兒，手無寸鐵，以血肉之軀，揮手斥責坦克車隊。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中華民族大無畏的氣概，令人熱淚盈眶。一幕幕人性精華的突現，透過電視傳真的播放，遠達全球的各個角落，無形中激發了日耳曼人的民族豪情，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所以不旋踵間柏林圍牆一如摧枯拉朽，在瞬間灰飛煙滅，表面說是民主化重大進展，實際是技術化和國際化相互衝擊的結果。2009年伊朗總統選舉所引起的糾紛，因無線手機及Twitter技術的傳播，火種熠熠不息，遠達全球，看來伊朗崇高無上的神權政體(Theocracy)，已受到嚴厲的全球化洪流所挑戰。可斷言的，伊朗國內的民主化，將會受到技術化發展的推動而向前邁進。

## 全球化時代來臨

全球化是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三者交叉整合、加速發展的極致，在二十世紀的末期，人類社會已進入全球化。所以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不是偶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亦是毋須恐懼的。每種變化，帶來劇烈的挑戰，亦帶來眾多的機會。過去二十年中，世界上許多國家因為能夠把握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發展的時機，而提高了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美國和新加坡是兩個好例子。

以美國來說，她以政治民主化為基礎，今天乃積極在全球新技術領域中，如網絡(Internet)、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納米(Nano technology)、數碼化生活(Digital Life)等，努力耕耘，爭取冠軍；各種企業更是積極向外拓展，以國際化為生存發展的重大策略。今天美國的五百強企業，大部分都靠國際化的營運盈利。所以美國在過去三十年間，可說因全球化而確保她在全球上的領導地位。新加坡小國寡民，但她努力的和印度、中國、東盟、東歐、中南美等國建立務實的國際合作關係，以脫離邊界對小國的束縛，發揮她地理上的樞紐優勢；此外，她亦在若干高新技術領域，力爭上游，並得到了可觀的成績。至於推行全民選舉、崇尚法律政治，新加坡的民主化，自有她的特色，為她的人民所支持。

這兩個國家，一個很大，一個很小；一在北美，一在東亞。她們能以全球化為視野，在技術化、民主化、國際化三

個要素中，培養獨特的競爭優勢，成為全球化中的盟主或巨擘，她們成長軌跡中所建立的典範，足以令人深思。

從古代到今天，中國人是一個能「隨機應變」的民族，多能忍辱負重，乘勢待時；亦能因應變化，創造時勢。三千年人類歷史中，證明了中國人屢創文明的佳績。在未來的全球化時代裡，中國人自應把握種種機會，開拓文明的新高峰。以史為鑑，我們如能了解中華傳統文化對人性、誠信的尊崇及所衍生的軟實力價值觀，將給中華民族舉帶來無可限量的機會。



# 全球化中華企業的建立

在全球化世界經濟發展中，中國人的企業如何取得競爭優勢？這個問題，可從過去二十年台海兩岸科技產業交流合作的成果中，得到重要的啓示。簡單的說，就是要在適當的領域裡，塑造創新型的「全球化中華企業」。

## 科技產業成國際化先鋒

我們且先作一個簡要的回顧。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在1990年初因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已能穩健的發展。1993年高新科技工業產品的輸出，大約是中國大陸工業品總輸出的百分之五左右。到了2003年，這個比例已迅速增長到百分之二十五。造成這種迅速發展的原因很多，包括國內重要科技產業政策的推行，如國家863計劃，高新經濟技術開發區計劃等，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尤其是來自台灣、港澳在製造業方面的投資，持續不斷。許多原來在台灣製造的電腦及關鍵性零組件，包括滑鼠、控制器、電路主機板、平面顯示器、桌面型電腦、筆記本電腦等已經紛紛轉到大陸生產，成為中國大陸高新產業的先行者。

台灣科技產業的西進，不但給大陸帶來資金，亦帶來技術、管理及國際市場。所以台灣科技產業從1995後在中國的擴展，是促成大陸高新產業迅速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現象，可以用台灣電腦工業在大陸生產的比例來表示。以2000年為例，台灣筆記本電腦總產量約為1,460萬台，約佔全世界2,220萬台的三分之二。其中約40%在大陸生產，其總產值約為100億美元。到了2006年，這些產量已分別成長為6,300萬台及7,255萬台，世界市場佔有率達86%。

由於許多關鍵性零組件及半成品的往來，大陸和台灣的雙邊貿易急速增長。今天大陸已取代美國而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伙伴。可斷言，大陸已成為台灣製造業生存發展的重大因素。因為大陸自然環境與經濟條件的提供，包括土地、勞工、政策等，使台灣的工業製品，增加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所以兩岸科技產業的合作，可稱充分發揮兩者的市場條件的優勢。

台灣自從1990年，工業技術研究院與三十二家廠商合作，開發筆記本電腦以後，經過了十年的發展，台灣成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型電腦供應者。許多台灣的業者，因為在產品技術及市場通路上已具基礎，所以逐漸與國際企業形成多種方式的策略聯盟或伙伴關係，而建立其研發、製造、銷售、服務的國際供應鏈。若干台灣企業之營運模式，由原廠組件供應(OEM)或成為原型設計製造(ODM)或擁有自有品牌(OBM)，並與國際著名業者建立上下游合作的關係。最

顯著的例子，為廣達電腦(Quanta)與戴爾電腦(Dell)之設計中心、製造中心及銷售網絡，涵蓋全球。另一例子為富士康(Foxconn)企業以中國為電腦、通訊及網絡器材零組件製造基地，成為全球領先供應者。

這個在二十世紀末期興起的營業模式，可泛稱為「全球化中華企業」(Global Chinese Inc.)。其主要內容，即「國際市場，台灣設計，大陸製造」。這個模式，是台灣與大陸科技產業「強強配合」的結果。今天上海、蘇州、昆山地區一躍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筆記型電腦生產基地，就是「全球化中華企業」的一個主要說明。根據2009年6月1日美國《商業周刊》的報導，全球資訊業的百大中，台灣已有四家企業，列名前十位，分別為英業達( Inventec, 4)、廣達(Quanta, 7)、緯創(Winstron, 8)及宏碁(Acer, 10)，這些企業，都以中國大陸為重要的生產基地。

所以十五年兩岸科技產業的交流合作，促進了大陸高新產業的成長，亦提高了台灣產品的競爭力。台商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在國際商貿的新基地，創造了新的競爭力和生存空間，亦加速了大陸技術化和民主化的步伐，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這亦就是互利合作的結果。這無形中亦提高了亞太地區的安定及安全，可以說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言世界平坦化促進世界和平的一註腳。

如果這種關係能持續發展下去，當是未來中國人以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題、促進全球安定最好的貢獻。

## 泛政治化的衝擊

兩岸之間的科技產業商貿合作，在2004年後受到雙方政治社會環境的壓力，進入了瓶頸地帶。在台灣方面，民進黨陳水扁政府以統獨意識型態為執政的主軸，對兩岸的科技產業合作，形成了行政干擾。民進黨政府很擔心，在全球化浪潮裡，台灣的資本迅速離開本島，人才和技術可能相繼出走。這樣下去，台灣產業可能被空洞化，失業問題將日益嚴重，貧富距離將繼續擴大。最後結果，台灣不止是被邊緣化，民進黨終會失去政權。

台灣的科技產業，在過去二十五的成長歷程中，已成為企業主導型態發展，市場的誘因和全球化競爭，已成企業經營之重要準則，並非政府一紙文書所能更改。台灣的經濟，雖然幸而有高新技術為支柱，但是整體規模仍小，離開全球化，將會難以發展。如果不能與大陸建立一個和諧合作的關係，借重大陸的土地、人力、人才、物料、市場及影響，台灣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中，將會困難重重。陳水扁政府的傲慢無知，背離民意，腐化枉法，喪失民信，未能了解民眾及社會之迫切需求，故在2008年台灣大選中，民進黨終為大多數選民所唾棄，國民黨因之重新執政。一年以來，馬英九政府已與大陸建立和平磋商的管道，實施三通，並放鬆兩岸投資貿易的限制，故由台灣方面產生的變數，逐漸消除。

## 科技產業合作的未來

在大陸方面，因各類製造業的迅速膨脹，擴大了對能源、資源、物料的需求，亦加速了環境及生態的破壞，政府及社會亟望未來「轉製造為創造」，「變製造大國為製造強國」，追求「自主創新」之聲，不絕於耳。這些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不可置疑的使「中國人全球化企業」的成功營業模式，受到了不少衝擊。

中國大陸對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之要求，日為迫切。然而此種要求，實與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策略相符合，兩岸科技產業，應可以此為共同目標。故應可由企業界及專家學者，分析市場機遇，慎選目標產業，重新規劃產業價值鏈，以競爭力為分工之準則，而不拘泥於研發或製造之標籤。近年來大陸、台灣、香港之科技研發，均有長足之進步，在若干領域中，如納米材料應用、中國傳統醫藥、半導體照明等，各佔有相當優勢。兩岸三地如能協調整合，將可促成全球性科技重新出發，塑造創新型之「全球化中華企業」，此為中華崛起之契機。

參考：林垂宙〈台海兩岸科技文流合作的關鍵時刻〉，見宋恩榮、徐揚生主編《海峽兩岸經濟發展——挑戰與機遇》，商務印書館，2008。



# 全球化看人才：世界級大學與軟實力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焉得清若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宋·朱熹

今天很多大學把「世界一流大學」作為發展的目標。但什麼是全球化時代中的「世界一流大學」？恐怕沒有多少人能夠說得清楚。不止如此，大學的使命究竟是什麼，應該培養甚麼樣的人才，恐怕亦是各說各話，人人言殊。

近年來國際上若干文化商貿組織，就某些辦學參數對世界上大學作跨境分析並排序。因為參數的選擇及權重標準極為主觀，排名的結果自然可能造成誤解，甚至滋生爭議。排在前茅的趾高氣揚、沾沾自喜；落在榜尾的氣憤填膺、揮手抗議。目前一個客觀的評比可稱是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它明確陳述各種參數及因子的假設，並提高科技研究的權重，指出排序可以提供為大學科研成就階段性的參考，然而不足代表大學的全貌。所以要從排名中去定義「世界一流」，恐怕還需很多研究。

要界定全球化時代中的「世界一流大學」，我認為可先從基本面去思考，而不要急著去排列某些因子。這個思路是比較宏觀的，是常識性而非技術性的。姑且把他叫做B2B(Back to Basic)或「回歸基礎」吧。

從人的觀點來看，大學應是「以人為本」，它的主體是教師、學生、畢業生。所以站在「人」的立場來說，我認為一個「世界一流大學」，必須符合下列三個條件：第一，能吸引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來任教；第二，能吸引世界一流的青年男女來就讀；第三，能使畢業生有能力到世界各地找到一流的工作、發揮世界性的影響。

符合這三個要件的大學，我認為才能稱之為「世界一流大學」。以美國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MIT)為例，假如它們只接受來自波士頓或新英倫地區的學生，他的教職員大都是兩校校友，他的畢業生只能在波士頓或新英倫地區找到優越的工作，那麼哈佛大學、MIT再優秀，亦不能稱之為「世界一流」大學。

跟隨著這個定義，一個大學，最重要的是先確定它的宗旨、任務、目標、定位、對象、資源，然後從提供環境、創造因素、塑造校園文化來達成上述三個條件。很顯然的這些該做的事，有些是硬件，有些是軟件，兩者須要適當的配合。雖然看來簡單，但在實行方面是需要許多思考的。

## 第一是教授

先說吸引一流人才。社會的芸芸眾生，不是為名，便是為利。但是許多適合在大學工作的一流科學家、工程師或專業人才，並不是芸芸眾生，反可以說是一種「稀有動物」。他們的人生觀裡，不為名不為利，主要的是為理想為興趣。他們對薪資待遇的要求以公平合理為主，但大學必須提供他們適當的環境及條件，讓他們能自由的從事教學及科技研究，以發揮他的興趣及理想。提供給他們創意的空間，就是一種激勵。他們大都能自動自發，每天努力工作，持之以恆，自有成就。

假如大學只能給他厚利，或只會給他盛名，不久他很可能跳槽到能給更厚的利、更盛的名的機構去。在全球化社會，人才流動，各取所需，是不足為奇的。再從另一角度看，一個名利心太重的人，恐怕根本就不適合到大學來，已離開了亦不必過分惋惜。因為名利心太重的教師，會給學生留下甚麼榜樣？

過去許多大學在極端不足的物質條件下，亦能成為崇高學府，就是因為能夠以看待大師、「國士」的心情去尊重和期許學校的教授，使他們心無旁騖。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這是何等崇高的情操，而可以為眾人的楷模。

一流的研究和一流的教學是分不開的。研究的結果是創造知識，研究的過程可以培養思考及反省的能力，這是做人的基本態度。《禮記·大學》篇裡所說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及：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

修身而後才能談到其他。格物就是研究。追求知識可以使人誠懇，使人虛心，這是修身處事的起點；它亦激勵人們去追求至善，這應該是大學教育的宗旨和使命。

大學不要過分強調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分野，但背景不同，自然要有不同的重點和輔導的方法。追求知識是不分年齡的，顏回和子貢比孔子小約三十歲，但常啟發老師的思考；牛頓潛心地心引力、孕育微積分理論時亦不過是慘綠青年。「英雄出少年」，一點不錯。我看中國大學要真正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恐怕要靠現在還是本科生的這一代。

## 第二是學生

有了一流的學生，辦大學自可事半功倍，這是大學辦學的秘訣之一。要吸引一流的學生，必須要有優越的教師及良好的環境，這是相輔相成的。教師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為樂，教師常是學生模倣及激勵的泉源，彼此相得益彰。中外古今，都是如此。

所謂環境不是指蓋滿長春藤的大樓，或鋪著大理石的地板。最重要的是簡樸高潔的門牆內，充滿著濃厚的文化氣

息及溫馨的人文關懷。青年們在這裡相互攻錯、激盪腦力，砌磋琢磨、陶冶心志。學生在學校裡受到同學的影響，不下於教師。學生在校可以擷取嶄新靈動的科技知識，亦體現永恆不變的處世良箴。一個學生可以在許多地方學到物理、化學、英文、歷史等等，但是只有在校園濡沐中才能感受文化傳統的薰陶，而培育他的人生觀，這是人生軟實力的基礎。很有趣的是，在大部分成功人士的記憶裡，大學給他最寶貴的常常不是上過哪一門課，而是老師和同學的人文關懷及品德激勵。

### 第三是畢業生

畢業生要找到一份好職業，需要有幾個因素。首先是專業上的能力，這也是最淺顯、最基本的。但從僱主的角度來看，他不僅希望新人可協助解決今天專業上的問題，更希望這個人能在未來成為機構的領袖。這就要求他在專業能力之外，也要有好的修身能力及領導能力。

專業才能可以說是硬實力，修身及領導能力可以說是軟實力。如果用海洋裡的冰山來作比喻，外人所看到的專業才華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這是硬實力；大部分隱藏在水面之下的，是軟實力。軟實力包括：品格、理念、常識、勤奮、尊重、求知欲、價值觀、世界觀、溝通能力、團隊精神、了解歷史、職業道德、社會責任、領導能力等等。當然

世界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他應是興業的英才、社會的領袖、治國的棟樑；他應具備均衡的軟實力與硬實力的特性。

舉例來說，在全球化的世界裡，他必須要心胸開闊，尊重不同族群，熟悉國家歷史，具備國際知識，及服務天下的理念。他的工作網絡，將超越國界；他必須懂得在平坦世界裡獲取資源，並善盡服務。一個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培育學生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及良好的世界觀，並以世界存續為己任。

今天的大多數大學，都是以提升學生的硬實力為重點，很少能注意學生軟實力的培育。這種情形如不能改善，將來世界一流大學的畢業生，充其量是各種專業裡一流的機器人，而不會是國家社會的領袖。可嘆的是各種排名評比，動輒以論文數量或表面的引述參數為指引，並以此引伸，再作權重運算，最後與大學的宗旨越不相干。

總結來說，今天中國的許多大學，已具有前所未有的優良物質條件；香港、台灣的高等教育，十年來特別有長足的進步。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是不能達到的事，但需要回歸教育基本面，不要捨本逐末。我深深的相信，中國百年來的教育家如唐文治、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胡適之這些前輩，如果能有今天的環境和條件，他們所領導的大學，就會是世界一流大學。這些先進應是有志於「世界一流大學」人士的典範。



# 軟實力

第三章



# 從中國文化看軟實力與硬實力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這是《老子》第十一章，應是「有」與「無」、「實」與「虛」、「硬實力」與「軟實力」共存關係的最早註釋。

天地萬象，有「硬」的一面，亦有「軟」的一面。前者是顯性的，是物質的，看得見亦可量度的。後者是隱性的，是精神的，不能觸摸而需以想像去領會的。當然「軟」、「硬」在自然界的事物裡，並不全然是絕對的涇渭分明。老子哲學及易經理念中太極兩儀所表示的黑白兩分，其實界限彎曲，而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兩者互相依附，自有很高深的哲理。所以「軟」與「硬」，雖然是一體的兩面，然而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兩者互為表裡，相得益彰。

老子指出：研磨陶土以塑作器皿，如果器皿內都填滿了陶土，哪還有空間可以載物？一間房屋，如果沒有門窗，哪還能支持生命？所以「有」與「無」，「實」與「虛」是相互依

存的，這是大自然所給人類最淺顯的啟示。因此老子下了結論：「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我們可以演繹說：「有」界定了使用的範圍，是實體、硬件、載具；「無」提供了使用的價值，是虛擬、軟件、創意。這是「硬」和「軟」，「有」和「無」共存共利，互補互惠最好的解說。從這觀點來看，我敢說老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概念的科學家！

這個古老的有無共存和虛實相生的概念，實際上廣用在現代日常生活中。舉例來說，房屋建築，不論大小，都是先去製造一個空殼。建築師先在天地中營造一個硬「殼」，以定義建築物的範圍，然後再設計這個殼裡的「空」間，以提供使用的價值。無論住宅、酒店、學校、博物館、辦公樓、大商場，都跟隨這個原則。建築師的功力，就看他處理「空」「殼」的均衡，及對藝術、文化、美觀、使用、效率等的考慮。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電腦。所有的電腦，都講求硬件、軟件的配合。工程師製備各種硬件，如處理器的大小，記憶體的容量，計算步的速度等，以定義電腦的性能和品質。同樣重要的是軟件，他要設計適當的軟件，使能處理文字、數據、圖表、繪畫、動漫、文件、聲音、搜索及特定功能等，以發揮電腦的使用價值。

在個人的層次，我們要求有強壯的體魄，靈敏的器官之外，亦要培養個人的品德、知識、理念、合群、負責、判斷等能力，這些都是全人教育的目的。人就是實虛合一和硬軟兼備的極致。

以一個國家來說，國家實力的表現，自有「硬」「軟」兩面。「硬」實力如土地、人口、礦產、公路、鐵道、電力、航空器、建築物、國民所得等，都有實在的數據可以佐證。然而「軟」實力，如文化、學術、美術、價值觀、創造力、法治精神、民族信心、社會公義等，雖然難以量化，但時常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民族延續傳承的標竿。這兩者有着密切的關係。公元2004年美國奈伊教授(Joseph Nye)在Soft Power一書中宣導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蜚聲全球。其實軟實力的概念和重要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自老子開始，以及孔子、孟子，都有重要的闡述。

歷史上有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物，積極追求硬實力的擴張和使用，迷信硬實力的效能。遠的不說，美國的前任總統布殊和副總統切尼兩位在位時，憑着所控制的強大軍事火力，利用紐約「九一一」國際恐怖主義者暴行後美國人氣憤填膺的激情，操作機密情報，冒然進攻伊拉克。他們對Al Queda與伊拉克之間的關連，牽強附會，不顧全球各方人士的質疑，一意孤行，希望可以在伊拉克發現Al Queda或大規模破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ive Destruction)，將之一舉消毀。大軍登陸之後，無論如何刻意搜羅，上窮碧落下黃泉，大型武器終不見。在六年熊熊戰火的炙燃下，可憐伊拉克已成焦土，但是美國國內亦是焦頭爛額，國際威信掃地。今天美國的經濟困難，多少源於政府的赤字預算、債台高築，以至信用泛濫。政府一味要支撐戰局，其他多少與民生有關的重大措

施，如能源開發、醫療改革、生態維護等只有置於腦後而不顧。歷史上窮兵黷武的領袖，不論在哪個國家，都給人民帶來災難。布殊總統治下的美國，是一個爛攤子，有待奧巴馬去收拾，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教訓。

我們再看布殊、切尼執政後，對伊朗發展核子技術多方恐嚇和壓迫，徒然增強反美的聲勢。瘦小精悍的伊朗總統艾哈默廸內賈德，就發展核能技術一事詰問美國，為何「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點燈」，不異惡霸，公理何在？他發揮「威武不能屈」的如虹氣勢，到處和布殊打擂台，又不時展示手中小小的一些「硬件」，如核電廠或火箭，就像揮舞著一枝魔仗，激得布殊撞頭跳腳而無可奈何。所以在新世紀的幾年裡，小艾在國際上的風頭，比小布還要勁。這是四兩撥千斤，「軟實力」勝「硬實力」的例子。

任何個人如果只是四肢發達，華衣美食，而不能克己復禮，明理知恥，充其量是沐猴而冠，富不過三代。一個國家即使金銀滿庫，火箭盈倉，如果不能尊重弱小，濟絕扶傾，終必盛極而衰，無以後繼。用今天的術語來說，一個能崛起的「大國」，不能只靠巨大的國民平均所得，及新穎的殺人武器，還要看他能否確立基本人權，建立社會公義，維持世界和平，保護生態平衡，消弭環球危機。這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相互發揚。

因此可見，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努力創造物質上的硬實力，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當然是正確的。在此同時，

亦必須創造精神上的軟實力，建立一個公義的社會，提升人民的文化素質，這才是可長可久。

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硬實力」的急速發展，引起了全球矚目，亦有不凡的評價。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帶給中國重大的考驗。天災常由於許多事前不可抗拒因素積聚而爆發，但它所造成人禍的傷害，卻是事後所應着力的重點。這件災變發生以後，中國政府迅速動員救濟，規劃善後重建，並資訊公開，歡迎全球人士協助。這是國家信心、決心、組織力、團結力的結合，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表現。兩岸三地的中華同胞，亦表現了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同情心和兄弟愛，自動自發投入多方面的救援重建工作，這種人性的升華，就是國家軟實力的不涸泉源。所以中國人在未來全球化的競賽裡，只要能同步發揮軟實力，應該可以昂首闊步，領袖群倫，這才是中華真正崛起的關鍵。



## 中華文化的實力觀： 軟實力與硬實力孰優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段對話，是《論語·顏淵篇》裏有關政府施政優先次序的闡述，這是孔子對國家軟實力與硬實力最清晰的主張和最扼要的宣示。在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重溫這一段話，仍然具有極大的震撼。

富國強兵，很明顯的，是任何政府所追求的目標。時不分古今，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中外，每一個政府領導人，無不希望把國家發展帶上一個高峰，在歷史上揚名百世。足食是經濟力，足兵是國防力，這是何等明確的硬實力，如何不是最重要？

然而，孔子說「不」。足食足兵，固然是一個政府重要的行政措施，但從長遠來說，政府施政中不可退縮的最後防線是「民信」。民是人民，是全民；信是誠信、信用、信任、信

心。政府對人民的承諾要有誠信，說話要有信用；人民對政府才能信任，對未來國家的前途，才會有信心。誠信就是國家軟實力的根源，這比經濟力、國防力等硬實力，來得更為重要。

我讀《論語》這一段時，心裡有一種難言的顫動，亦非常感謝子貢發問的鍥而不捨、追根到底的態度，所以孔老夫子不得不抽絲剝繭，把立場說個明白。這亦是師生互動和教學相長的好例子。

的確，少食缺兵多是歷史上改朝換代原因的表象。然而溯本清源，歷史上王朝的潰敗大都由於政治敗壞，喪失民心。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歷史上因失「信」而失國的事例，可說比比皆是。

遠的不說，四十年代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乖錯，最後推出片面的貨幣政策，相繼以金元券和銀元券搜羅人民的黃金，不出半年，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蕩然無存。不久解放軍從容渡江，即使槍聲零落，國民黨政府亦不得不如風捲殘雲，黯然出海。再說，五十年代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如果他坦蕩蕩的以政見不合，將異見人士撤職冷藏，大家自然無話可說。然而他不此之圖，偏偏搞出「百花齊放」的把戲，甚至信誓旦旦，聲明言者無罪。不旋踵間，即以反右反修為名，讓許多老戰友鋤鐺入獄，折磨至死。他還洋洋得意自詡此為引蛇出洞的「陽謀」。這種行為，銷蝕了多少忠實共產黨員對他的信任？這是何等慘痛的教訓！看來毛澤東自詡有過人的

文采風流，但是對軟實力領導或國家軟實力的基礎：誠信，沒有真切的認知。

政治人物的權謀，絕不等於軟實力。

若干西方民主國家政制中，國會可以對一個執政的政府投「不信任」票，這是一個頗有創意的制度。一個政府領導人因政策不合或措施錯誤而鞠躬下台，是政壇的常規。在這種情況下台的人物，如果能改弦換轍，東山復出的機會仍然很多。但一個政治人物如因誠信問題而下台，恐怕就是政治生涯的終結。

今天我們檢討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對「信」的主張，覺得它仍有重大的時代意義。其實「信」亦是一個政府建設硬實力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

首先從經濟建設來看，政府法案的推動，需要人民的信賴；經費的籌措，多需要信用貸款，向國民或國際籌借。這一點恐怕是孔子當時亦沒能預見的。當今政府的各種債券或儲蓄券，無不建立在國家的信用上。信用的參數直接與利息掛鈎，反映在計劃的成本上。例如今天美國政府債台高築，負債萬億並急速飛漲。如果債信不能改善，不出十年，它將無法負擔貸款利息，更不要說償還本金了，到時美國政府將有「周轉不靈」，「被迫停業」的危機。目前美國的國民平均負債，已與國民平均所得相類似，名列世界前茅。債信下滑之餘，必將影響美元為國際貨幣的盟主地位。

「信」和國防，亦有密切的關連。「信」透過經濟實力成為國防實力的重要關係，自不必再說；從作戰力量來看，「信」亦是戰鬥力的核心。中國兵學先知孫武子，已有清楚的陳述。孫子的《始計篇》，人人耳熟能詳。他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我們可用近代管理學的語言，來分析一下這五事。

道，就是遠景、任務、理念。這需要上下齊心，互相信賴。所以孫子說：「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民與上同意，是信賴的極致。天，是時間；地，是空間，暫且不說。為將之道，在於智、信、仁、勇、嚴。將是領導力，信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元素；法，就是標準、規範、紀律、制度，這需要上下共同信守。

所以「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孫子的另一結論，是「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歸根到底，軍事力量是以意志力，組織力，策略力為主。所以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見「軟實力」的重要，更在「硬實力」之上。

在今天全球化技術化時代，各種電子、通訊、物理、化學、生物、訊息科技等交互使用，今天的戰爭，遠遠不是體

力的角鬥，而是智力甚至「虛擬現實」的比賽，正可說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軟實力成為國防力的主宰，「信」是「軟實力」的共同凝聚因素，至為明顯。

「信」是孔子所推重的個人立身處事的基本原則。《論語·為政》篇中，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所以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些都成為歷代中國人的價值觀。

老子第十七章對領袖的評價，很可發人深省。他的一個結論說「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領導人的誠信不足，人民當然再不信任他。所以民信如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可不慎乎！孫中山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胡錦濤再三強調「以民為本」，這兩位政治領袖，應是能充分體會「民信之矣」的重要性的。

「軟實力」與「硬實力」孰先，端木賜先生，還有疑問嗎？



# 中華文化的實力觀： 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共生與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老子》

硬和軟是物質和事態的兩個表徵，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兩者互相糅合，相輔相成，形成一種互動共生的狀態，這亦是老子「有」和「無」理念的引伸。兩者的循環相因，是自然現象和人文百態生生不息的常規。

在全球化時代的技術世界裡，有無相生、硬軟相長是科技產業成長的軌跡。試以電腦為例說明。電腦的利用價值，眾所周知，係由電腦的硬體與軟體互相匹配而產生。如從整體電腦產業來看，軟、硬體兩業固然相互依存，但更多的使用價值，已逐步向軟體業傾斜。在1980年代時，電腦業以電腦製造者如IBM、DEC、Sperry-Univac、Honeywell、Wang Lab為主體。但1990年代中，以電腦軟體為主提供各項服務的公司，均有重大創新面世，故微軟(Microsoft)、雅虎(Yahoo)、谷歌(Google)、亞瑪遜(Amazon.com)、以貝(eBay)等電腦軟件服務業的獲利率及增長率，遠較電腦硬件製造業者

為高。上列硬體公司除IBM外，其他四員均已不復存在。即如IBM，數年前也已將硬體製造賣出，目前以提供顧問服務為主。

電腦產業的營運模式，二十年來亦由垂直整合轉為水平分工。至於電腦製造，由寡頭壟斷轉變為全球化供應鏈的管理。一個典型的筆記本電腦，其零組件約由300家之多的供應商合作提供。可想而知的未來歲月裡，由於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技術的成熟，電腦的型態將有重大改變：個人或企業所需的計算，都可由「空中」某處得到。屆時使用者只需插上電源，經簡單的運作，熒幕上便可顯示結果(Plug and Play)。故軟體技術勢將成為電腦技術的主導。即使如此，電腦的使用價值，仍由兩者交互扶持而產生。

老子說「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是實虛互動、有無相生的顯明表述。我們亦可以從兩方面來解讀這句話。從謹慎保守的一面說：不要因「福」而高興得沖昏了頭腦，亦不要因「禍」而沮喪得萎頓悲傷。從積極進取的一面說：在順境時應該居安思危，在逆境時更需創新突破。畢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眼前所看到的，不過是一時的過眼煙雲。

美國林肯總統的一句名言：“All this will come to past”(眼前的種種都會成為過去)，可以說深得《老子》箇中三昧。2001年紐約「九一一」的悲劇，難道不是因美國國家實力強大，國家影響高漲，以致忽略了一些民族間的不平和社會間的矛盾所造成？這是蘇東坡所說的安於逸樂而移患他日，福

中有禍。2008年5月汶川的大地震，死傷十萬，滿地瘡痍，但是激發了民眾的同胞愛和對政府的信賴，未來災區重建，將給當地更美好的開始，豈不是多難興邦，禍中有福？

所以「有無」，「軟硬」，「禍福」，「優劣」，都有它們的空間性和時間性。從國家整體發展來看，從事經濟及國防建設，是確立硬實力為富國強兵的手段；而塑造共信，培養公義，是塑造軟實力為長治久安的坦途。所謂孰優孰先，要從國家發展的長程來看，才能了解他的真諦。

《孟子·梁惠王》篇對國家施政的政策優先，亦有一段很有趣的敘述：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這一段所說的，是孟子對農業經濟與自然生態的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簡要主張，就是國家安定進步發展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政策裡，包涵了環境保護，生態均衡的意義。大自然間的資源，人類只要取得其道，取得其時，環境生態自可持續發展，生生不息。

中國在改革開放二十五年後，能夠使十二億人口得到溫飽，這是人類歷史上何等重大的成就！然而中國在發展過程

中偏重了硬實力，引起了許多環境污染、生態敗壞、貧富不均、公義不振、貪污腐化、災難頻仍的弊病，值得深為檢討。

實際上一個人如衣食富足而背信負義，鮮廉寡恥，則亦與禽獸何異。這樣的個人、企業、國家亦必沒有前途。這和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無信不立」的意義是相輔相成，前後一貫的。所以硬實力與軟實力之間應要互相激勵共生，才是企業發展和國家永續的基本要素。對「中華崛起」有興趣的人，更要好好的思考這個問題。

在實際的運用中，硬實力與軟實力，如能交互配合，便能發揮最大的效果。我們可以舉例說明。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要維護國際領導的地位，當然是一宗艱巨的挑戰。美國布殊總統在2000年執政初期，充滿著貴介公子的姿態，趾高氣揚，以天下盟主自居，對其他國家，自覺可以予取予奪。所以甫上任即宣稱伊拉克、伊朗、北朝鮮為「罪惡軸心」，極盡嘲弄之能事。即如美、中兩國關係，經二十年來兩黨政府的解凍及經營，已培養許多共識，充滿友好積極的氣氛，但布殊亦突如其来地宣稱中國不是美國的策略伙伴而是競爭對手。種種作為，「霸氣」十足。他抓住了「九一一」悲劇後美國人民亢奮的怨氣，一意孤行，出兵伊拉克，結果深陷泥足。他對伊朗及北朝鮮的多方面恫嚇，艾瑪內賈德和金正日亦置之不理，以致美國外交一籌莫展。

2007年12月初美國國家情報評估，指出伊朗在2003年時，已中止核武器的計劃，無形給布殊的外交政策，刮了一

個響亮的耳光，使他不得不冷靜的反思，而警覺以往激揚僵「硬」作法的不是，開始加強低調柔「軟」的溝通。從2008年1月起，美國的外交措施，已經慢慢地發生了路線上的改變。在北朝鮮方面，美國決定靠邊站，由中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多方斡旋後，終於在2008年5月間達成初步共識，使北朝鮮中止核武計劃，同意接受更詳細的國際監察，並開始銷毀一些與核武技術有關的設施。

此外，在中東地區幾個極端的伊斯蘭團體，如哈瑪斯、真主會，以及久不往來的敘利亞，亦陸續建立磋商的平台。美國對於長期盟友以色列，亦施用了一些硬動作督促其維持與巴勒斯坦的停火協定，並進行極密切低姿態的協商。當然亦有觀察家指出，以色列的表面柔軟，其實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為未來武力攻擊伊朗掩護。

「硬實力」與「軟實力」的互動與共生，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這應是國家在全球化中競爭力的關鍵。



# 軟實力的消失：政治人物職業病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春秋 · 左丘明

在君主時代，做官特別是做大官的人，對待君王要必恭必敬、誠惶誠恐，有時更要察言觀色、先意承旨。以這種態度去對待君王，目的是要取得君王的信任，以鞏固權位。這種謙卑折節的行為模式，雖然不無可議之處，實際上亦不無正面的意義。一個人如果不能保住權位，哪裡談得上實行抱負，兼善天下呢？

在民主化的世界裡，君王是手中拿著選票的民眾。要侍候廣大的民眾，其實比侍奉獨夫寡人容易，起碼不用擔心人身的安全，因為每個人都受到法律的保障。在民主政制裡，民眾看重的是尊重民意、了解民瘼的公僕。所以公僕們要把握著「誠信」的原則，信守諾言，為民服務。他能夠這樣，就能善盡職責。做不到這樣，他會失去民心，就像是生了疾病，不能保住權位了。民智越開的國度，越是如此。

過去兩三年的功夫，我們觀察在日本的福田康夫、南韓的李明博、台灣的陳水扁、馬英九、香港的曾蔭權，這些在亞太地區叱咤風雲的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像是有病了。他們似乎受到政治職業症候群的威脅，面臨著職業生涯上嚴厲的考驗。有些看來已經病入膏肓，有些仍在感染的初期。

福田康夫是日本一位老成持重、經驗圓熟的政壇名將。自從2007年9月底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以來，內閣發生了受賄案、獻金案、性醜聞案、政事人事案，接二連三。福田不能及時處理，以致左右支綱，7月份的民意調查中他的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終於在2008年9月1日宣布辭職，距離上任時間，不足一年。可注意的是他的前任安倍晉三，就任時才五十出頭，他的家世顯赫，思維敏捷，社會寄以高度的期待，但從就任總理到鞠躬下台，亦不滿一年。為什麼民眾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對這兩位頂尖政治人物失去信心？

李明博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在漢城市長任內，更以綠色革命、環境建設聞名。2008年2月底就任韓國大統領，躊躇滿志。他對外交上特別是與北韓和談一事，自有獨特的看法，他上任後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馬上受到嚴厲的批評。他對牛肉進口案，民眾認為過分遷就美國，在兩個月之內，街頭發生了激烈的示威。民意支持度下跌至百分之十七，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看到一觸即發的民憤，他不得不虛心的聽取異見，改組內閣，以期站穩陣腳，看來前途變數仍多。為什麼人民對一位甫上任的總統如此不耐？

這兩個事例的發生，的確令人甚為錯愕。日韓兩國，此時國力仍盛，人民生活富足，國家並無重大的變故或憂患，這兩位領導人，在當選現職前顯然亦是社會上的意見領袖，為什麼都在數月之間，民眾對他們發生非常急速的變化？

據我的觀察，政治人物在未登大位前戰戰兢兢，對民眾小心翼翼，極盡兼視並聽之能事。一旦坐上龍椅，志高氣滿，政治職業性症候群自然應機而入，造成領導人與民眾的逐漸疏離。這些症候在全球化時代，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高度壓縮，快速蔓延，甚易一發而不可收拾。「民信」危機，就是政治領導人物軟實力流失的結果。

政治人物的職業性症候，可以說有「三低兩高」。「三低」是低估了人民的知識，低估了社會的變化，低估了時間的緊迫；「兩高」是高估了個人的智慧，高估了權勢的效能。我們如果用極坦白、近乎不禮貌的話來形容，就是傲慢、偏見、無知、權謀。這些症候的綜合結果，就是民信的流失。一個人假如只染上一兩樣徵兆，或許其「迷途之未遠」，假如五味並陳，就成來日之不可追矣！

這些徵兆，其實都可能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我們在許多公私企業的領導高層裡，亦時常可以看到。只不過政治是眾人之事，政治領袖一朝染上這些症候，除了本人之外，民眾都看得清清楚楚。全球化時代生活的一個象徵，是時間與空間的高度壓縮，等到他自覺症候上身時，火山爆發，已近眉睫，恐無轉圜的餘地及時刻了。

全球化時代的特色是技術化、民主化和國際化。這是三個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彼此互相激盪，更創高峯。因為民主化，所以民意高張，人民對政府的要求及期待高升。因為技術化，民意的表達方式多元：報章、雜誌、書籍、電話、電訊、傳真、動漫、快遞、短訊，以至於口語、手勢、Facebook、MySpace、YouTube、Twitter等，政府哪能全數控制。因為國際化，許多傳統的政治界線轉為模糊，天涯一方的不平事可在海角四處相互回應，產生了加乘的效果。

日韓的福田、李明博，本身尚無個人行為瑕疵成為爭端的焦點。台灣的陳水扁，可以說在政治人物品德頻譜的另一端。

陳水扁以「台灣之子」的光環登上總統寶座，用人唯「緣」，用人唯「奴」；枉法營私之放縱及粗劣，真是出乎民眾想像之外。兩三年前社會上所搖頭咋舌的「SOGO禮券案」、「國務機要費案」，令人覺得陳氏夫婦利慾薰心，見財起意的可悲。但是後來揭露了「南港發包案」、「龍潭購地案」、「國際洗錢案」，社會才發現他的真面目，如非神奸巨蠹，精心籌謀，曷克臻此！檢調系統發現的資料中，指出他利用「一妻二秘三師四戚」為中心所羅織的洗錢系統，涵蓋了全球五大洲十幾國，充分的利用了國際化及技術化的工具。但亦由於全球民眾爆料的指引，這個系統，亦會成為陳水扁、吳淑珍的恢恢天網。長達兩年的偵察及審判，陳吳夫婦已被定讞有罪，阿扁本人被判無期徒刑。這個案子目前仍在上訴中，但根據官方資料，他的信譽掃地，人格破產，政治生涯，已成流水。

我們回頭看看馬英九、曾蔭權兩位，他們的民意支持率，在就任後三個月內，亦大幅萎縮近百分之五十，這是令人極端訝異和關切的事。他們兩位的人品操守，民眾並無疑問，為何亦遭受相似的困境？在專家的檢驗分析以前，我們所觀察的是，他們兩位上任之後，不知不覺的已經感染了若干政治人物職業病的症候，多少亦已忽略人民對他的期待。民意看似浮雲，實際更像流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政治人物如果玩忽民心向背，漠視民信流失，必將為民意的浪濤所噬沒，能不慎乎！

2010年6月，日本繼福田康夫為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其民意支持率已自2009年8月大選時的74%，急促下降至不足20%，僅在任八個多月便下台。所以在全球化時代中，社會變遷之大，時間壓迫之急，令人難以想像。東亞是全球化世界中的一大重心，這個現像尤為顯著。



## 實力共生案例： 從北京奧運看中華崛起

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屆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開幕。這是中國歷史上具有特別意義的日子，在這一天，它洗刷了中國人百年來在世界上兩個可耻的標籤：「東亞病夫」和「一盤散沙」！

作為世界奧會的主辦國，不止要有世界級的運動能力，亦必須有世界級的組織能力。從運動能力來說，它不單要能在某一個單項的比賽中奪取金牌，亦必須有全面性或多項的運動水準；它在主要競賽中如足球、籃球、排球、賽跑、跳高、跳遠、游泳、跳水、體操等已有可觀的成績，足以號召群英。在組織能力方面，它必須有合格的競技場所及充分的生活及交通等基本硬體建設；同樣重要的，它必須有大型的規劃、組織、運籌、執行的能力，包括蓬勃的意志力和毅力。簡單的說，這是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結合。

2001年申請舉辦奧運成功後，中國即緊鑼密鼓的籌劃北京奧運。雖然說三千億人民幣只約略是全國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一點五，並非做不到的數目，但在一個非急迫性的項目中做出這樣龐大的投資，實在非同小可，很顯然這和國家的遠

景、目標、決心和信心有重大的關係。實際上當時北京的硬體條件固然不足，為建設多種硬體所需的籌劃、動員及實踐中等待克服的極多困難，恐怕不是八年前所全可預料。

從硬體來看，主體運動場鳥巢和水立方構思的新穎，設計的獨特，結構的宏大，突然間在民眾眼中呈現，不止成為北京市的標竿，亦將是世界級運動場所的典範。配套的機場、地鐵、巴士路線的鋪設，更需得社會的充分溝通和配合。為了改良陰霾污染的空氣，政府必須關閉工廠，遷移民居，勵行多項容易惹起民怨的措施。儘管配合政府的要求，大家心知肚明，懷疑到了開幕那天，北京的空氣污染和交通阻塞，是不是真正能夠改善？

在籌備過程中特別重大而前所未料的變數，是國際恐怖集團和政治異見分子的威脅。「九一一」之後，世界各國可說都談恐色變。試問開幕當天，世界上有近百個國家首長聚集在地球上的一個小小的目標地，他們的安全問題和政治風險，恐怕是誰都會感到寢食難安。2008年春天以後中國政府對簽證實行多項限制，引起了貿易商旅常態交流的不便，已有許多不良的反應，實際是無可奈何的舉措。8月8日當天下午的全國全面航空管制，可以說是一種釜底抽薪的應變手段。其實我們所看不見的，是當天有多少空對空、地對空、海對空的荷槍實彈的全面戒備在實施。

8月8日下午8時，世界奧林匹克第二十九屆運動會，終於在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開幕了。經歷四小時的儀式，對現

場的九萬五千參加者和全球的四十億電視觀眾，產生無可比擬的震撼，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目瞪口呆，嘆為觀止。國際人士對現在的中國人，都覺得是該刮目相看；中國人的新時代，應該來臨了。

奧林匹克的大腳印，從遠到近，一步一步的到達鳥巢，引起觀眾的高潮。所有煙花的放射，卷軸的展開，舞台的升降，五環的升起，聲光電火等的配合，經由精心的工程設計、精密的電腦控制、無縫的人機互動，可以說分秒不差，都是現代化高科技的使用。相對於中國航天科技來說，這亦是牛刀小用。夸父追日的那一幕，構思高超，舞步美妙，展示出人定勝天的氣概，更是奪人心弦。

看了開幕典禮的表演，我個人有很深刻的感觸。我認為中國借著這個機會，向世界傳達了兩個重要的信息。第一是闡述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從造紙、製筆開始，中國人發明了簡易的方法，表達人類複雜的思想，亦建立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接着發明了活版印刷術，成為大眾傳播的重要手段。此外，透過繪畫、詩歌、音樂、舞蹈、戲劇等的創作，充實了人類的生活。更因不斷的學習與思考，開拓了生存的空間。透過陸上絲路與遠洋航海，建立商貿關係，擴展國際交流。因此「禮之用，和為貴」，學而時習，講信修睦，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

第二個信息，是宣揚中國人的智慧，博大精深，遠溯自老子、孔子、孟子。老子的學說，是描述自然運行的道理，有無相生，硬軟互利，實虛並用，剛柔共濟，這是「太極」的至理。老子教導人類學習自然，追求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孔孟的學說，是聚焦在個人與群體的倫理關係上，講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己做起。而一切都求自實踐篤行，自強不息；為政以德，以民為本。在老子孔孟學說的基礎上求發展，將可建立中國人的獨特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我在香港《信報》談硬實力與軟實力，就是從老子、孔子、孟子說起。

參加奧運各代表團隊的進場，亦是獨具一幟。我想對兩岸三地以外的觀眾，好像上了一課。原來世界上的排名次序，除了以英文字母為先後之外，亦可用中國文字的筆劃為順序。我想這一些都深具全球化的教育意義。這亦是民主化社會中多元化因素的一種表達。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精神，所以能從希臘開始，遍行全球，歷經百年，久而彌新的原因，因為他建立了公平合理的競爭規則。我們可讀《論語·八佾》篇中的記載，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這豈不勾劃了運動家應有的風範嗎。

中國人主辦2008世奧的順利開始和圓滿結束，表示中國的國力因為得到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結合，已經達到國際的水平。此後中國人應有充分的信心，和先開發國家並駕齊驅。

我們除了應感謝中國政府兩代領導人的遠見和決心，為國家爭取機會，並督促美夢成真外，亦應感謝所有參與規劃籌備執行的每一分子的辛勤毅力和盡忠職守。

展望未來，中國人應該用信心、誠心、虛心去成為全球化中的世界公民。我們應使運動的習慣與運動家精神，不再是國家行為，而是國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培養健康完善知信守禮的國民，就是建立國家可遠可久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重要元素。



## 實力崩潰案例： 卡特里娜巨颶天災變人禍

發生在人類社會上的重大災患，時常由於天然與人為因素交會影響而造成，2005年美國紐奧良的卡特里娜颶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久以前美國《紐約時報》頭版有一個報道，敘述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後已近四年，但逃離的人民，許多不願回紐奧良故鄉去。紐市本來風光明媚，人口百萬，是美國南方的商貿重鎮。它星光熠熠、富有傳奇性，洋溢著浪漫氣氛，一向是詩人、墨客、音樂家、藝術家流連的樂園，亦是美國非裔、法裔、德裔、西班牙裔多種族群交融的會所。卡颶襲擊當時，奪去了一千多無辜的生命，毀壞了約近三百億美元的財產。四年後的紐奧良，人口減少近半，市區仍是傷痕累累，殊堪嘆惜！

以美國國家的富庶、軍力的強大、科技的進步、安全的重視，面對這種天然巨颶的來臨，居然束手無策，任憑蹂躪，這豈不是人間怪事！究竟這個天災轉成人禍的原因何在？付出這種慘痛代價，人類究竟可以學到什麼樣的教訓？我們應如何看待自然災害和人為過失，如何評價重大工程的風險，以保障社會安全及人民福祉？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校長丹尼教授2007年9月底在「南沙科技論壇」中，對卡颶事件，提出了扼要的報告。美國土木工程學會在卡颶發生後數月，受美國陸軍工程團的委託，組織一個外部專家委員會，對事件的前因後果，進行客觀的調查，丹尼教授是專家委員會的主席。

回述2005年8月29日清晨，卡特里娜經過一星期在加勒比海上空聚集和醞釀，已形成巨無霸型的亞熱帶氣旋。它以每小時二百公里的速度，挾著排山倒海似的狂風暴雨，向紐奧良進逼。詭譎洶湧的巨浪，使環繞著紐奧良市的防洪堤壩柔腸寸斷，潰裂了五十多個缺口。一時間墨西哥灣、龐湖及波湖的萬頃怒水，衝向紐市，終於淹沒了百分之八十的市區。可憐許多紐奧良居民，措手不及，瞬息間為洪流所噬沒。許多老殘弱病的弱勢人士，無從走避，活活的被淹死。許多人跳出窗外，擊破閣樓，在屋頂上佇候援手，坐看時益高漲的洪水，掙扎不得而死。還有一些人被歹徒趁亂打劫，一些人受到細菌無所忌憚的感染。一幕幕的人間悲劇的出現，宛如人世末日的來臨。現在的統計，確定死亡的1,118人外，尚有135人長期失蹤。

專家調查委員會調查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防洪工程設施的規劃，缺乏全面而確實的風險評估。中央與地方權利義務的分攤、預算的限制、社會團體的制衡等因素，影響長期可接受風險及安全限度代價的評估。

第二：堤壩工程設計錯誤。主要的工程，是美國陸軍工程團在1960年代所設計。美國陸軍工程團雖然素負盛名，但並不能免於犯錯。例如防洪設施主要的設計是以「標準性颱風」而非「最大可能颱風」為基礎。前者適合「百年一遇」的颱風，但據海灣地區歷史性氣象資料來看，像卡颱這樣「四百年一遇」的颱風，發生的機率雖屬「萬一」，但發生的可能性是一定的。其他若干工程估計，亦有錯誤。

第三：未能考慮環境因素（如滲水現象）對防洪堤壩的潛在腐耗效應。

第四：未能維修機電設備如抽水泵等，以確保防洪堤壩的正常效能。

第五：各處防洪堤壩，常因單獨的設計，零碎的施工，接口處參差不一，缺乏一致性配合，降低了總體效果。

第六：防洪堤壩設施管理系統有名無實。

第七：沒有合格的專業人士為防洪堤壩負責。聯邦與州及地方之間防洪及應變體系分歧，結構層床疊屋，各自為政。所謂危機處理，各方不能配合。

第八：各項工程設施，沒有合格的外部專家審核機制。

痛定思痛，委員會及丹尼教授認為，過去的一二十年中，如能對防洪堤壩的設施有周期性及客觀的評估和檢討，許多潛在的問題，應可一一改良。如果能定時實施適當的改良及補強方案，即使巨颱如卡特里娜來襲，最少有三分之二的無辜性命可以保存。

委員會的調查結論前四項，固然是技術性為主，但都屬於領導人的判斷力和執行力範疇。後四項涉及經營理念及領導方式，更和軟實力息息相關。任何硬體工程在設計的時刻，即使每個環節都已盡了努力，利用了最好的技術，然而再真再善的專家都可能有盲點，再合格的工程亦可能在變遷的環境中蛻化。工程設施愈大，可能的變數愈多。

卡颶的慘痛教訓，應該使我們對天災與人禍的關係，有進一步的體會。自然災害的發生，與人謀不臧，其實有連帶的關係，可以說是國家實力崩潰的表示。

上面所提出的幾點技術性結論，其實有其國際性。它對任何國家重大規模的工程設施，應有通用性。試想把結論中的防洪堤壩四字改成大水壩、核電廠、大機場、運動館、摩天大樓等，豈非一體適用？所以它應該有啟發性的意義。

自然災害的爆發，常有幾個現象是我們特別關心的：一是這些災害的發生，時常是幾種一起來，正如俗語說的禍不單行。看記載中黃河大水成災的時候，泥沙所帶來的災害比洪水更慘重。台灣在1999年發生「九二一」地震，除了地震還有伴隨而來的山崩、泥石流等。第二個現象是這些災害發生的過程如「疾風驟雨」，終究時間有限，但造成的傷害，餘毒時間卻很長。不要說卡颶三年後，紐奧良仍然傷痕歷歷；台灣「九二一」地震已經七年了，災區尚未能復原。汶川地震後的災區重建工作固然已有極大的進展，看來仍需許多年的努力，才能重現新機。第三個現象是自然災害發生時最大的受

害者，通常都是社會上最貧窮最無助的族群。第四個現象是災區重建的困難，往往不限於技術問題。當地震、洪水、火災發生時，房屋倒塌了，文物損壞了，原來的記錄、地契、證明，通通毀之一旦。面對許多保險、醫護、賠償、重建等的舉證，災民更是欲哭無淚了。

自然災害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災難，在未來的歲月裡，恐怕會是有增無減。這裡有三個因素應該說明。第一：隨著人口增加，人類不斷與山海爭地，人類的生活空間，常常是在地質、生態或氣象條件不穩定不安全的區域，因此暴露於更多的自然災害中。第二：大規模的建築，如機場、商場、運動場、遊樂場越來越多，人為引發的火災，其禍害與天災無異。第三，自然環境的變遷，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溫室效應等，對自然造成多種的顯性與隱性的影響，加速或擴大地震、水災、颱風等的禍害。因此，如何利用現代科技去抵禦或預防這些災害，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變得越為重要。

最近國內有科技專家及政府領導，對長江三峽的大壩的未來安全性及對環境的衝擊，開始有了一些全面的討論，我認為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長江三峽大壩的建立，早年已在孫中山的建國藍圖中出現，歷代國家領導，都表示熱烈的支持。經過多年的評估及論證，終於付諸實施。長江三峽工程十多年來的執行，無論是濬深、改直、遷移、築堤、蓄水、建壩、發電等等均按照計劃，循序達成。大壩完工以來，許多預期的功能如蓄水、

防洪、發電、航運等，都已一一體現。原來的技術項目及政策目標，亦都得到了驗證。以現在的資料知識為基準來說，長江三峽大壩水力發電廠的順利完工及運轉，是這一代中國人的一大盛事！

但是隨著三峽以新貌出現及大壩電廠的常規使用，許多環境因素，不免亦會隨之改變。例如江水對堤坡基礎的長期腐耗，或江水震動對堤坡安定度的衝擊等，多年以後，會不會增加坡堤安定性的風險？這一類的課題，都有定期檢討的意義。

其實現時的安全科技，自比二十年前有長足的進步。國內人才濟濟，國際網絡暢通，現在對長江三峽大壩去做客觀深入的追蹤和分析，正是最適當的時機。美國陸軍工程團對卡颶事件所作的調查，是一宗負責任有承擔的作為。殷鑑不遠，政府聘請有公信力的專家學者，對長江三峽及大壩發電廠作客觀、全面、積極的風險評估及維護建議，正是時候。決心、科技力、組織力、執行力、公信力，都是國家軟實力的表現。

# 香港



# 全球化中香港的競爭優勢： 歷史特色

香港是一個對中國全球化具有全面影響的都市。滿清皇朝在1842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把香港割讓為英國殖民地，不自覺的開啓了現代國際化的序幕。緊跟在國際化後面的是民主化和技術化，清朝面對這三股歷史洪流的滙集衝擊，左右支絀，應對無方，終於被洪流淹沒。香港因此成為中國國際化的最早窗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一百五十年來，香港是國際貿易、經濟、社會、宗教、教育、文化互相交融激盪的好地方。

## 特殊的歷史文化

香港最早對中國的具體貢獻是民主化。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以香港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民主革命活動。終於在1911年的10月，推翻了清朝皇權統治，成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五千年來中國民主化的重大事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後，本可一鼓作氣，收回香港。但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另有考慮，無意於此。

他們讓香港繼續作為中國與國際往來的窗口，一方面可以拉穩英國政府，一方面亦安定社會人心。在其後的五十年間，港英政府審時度勢，致力於香港的基礎建設，使她發揮國際連接港的功能。多年來香港在引入資金、人才、技術、知識各方面，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着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成長，香港的經濟日為蓬勃，終於躋身於「亞洲四小龍」的行列。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則。香港人受到「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鼓舞，在保持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前提下，發揮在金融、服務、運輸、旅遊的一貫優勢，繼續吸引全球投資者的興趣。十年以來，香港歷經禽流感、SARS、水災、股災、防恐等的多種打擊，但時至今日，香港仍保持她在國際市場上高度的競爭力，並連續名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首位。

## 推動中國進步

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香港不應該以成為亞洲的國際都市為滿足，她應該是一個推動中國開放進步的動力。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她不只是中國大陸與國際貿易的橋樑，更應是中國社會文化傳承與轉型的推手。這種任務和功能，不是任何國內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所能取代的。香

港的歷史地位，就是她的特色；香港的國際信心，就是她的軟實力。這些都是未來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其實每個地區和都市，都應檢討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作為前程規劃的基礎。以北京為例，其他城市發展再快，亦不可能有故宮、天壇、清華、北大、王府井、萬里長城。以珠三角為例，孫中山、黃花崗、南越王、十三行街、虎門炮台就是她的特色。

所以香港一百五十年的特殊歷史，與珠三角的地理連貫，在中國國際化及民主化中的地位，東西文化交匯的基礎，是一種無可匹敵的寶貴資產。香港人應以本身歷史為榮，以建立一個民主、法治、開放、創新的全球化都會為長程發展的願景。能夠這樣，香港就能夠獨出於其他中國城市。反過來說，如果香港不能採取積極的態度，一味以保持國際商貿優勢為滿足，不出十年，她的競爭地位，將逐漸因上海、深圳等地的崛起而被邊緣化。

許多香港人富有創業家的刻苦和冒險精神，在長期積累的法治規範，以自由經濟為主體的國際商貿環境上，如能建立共識，塑造遠景，並善用與珠三角和台灣的關係，將可開創新的局面，而拓廣新的競爭優勢，並可成為二十一世紀新中國的表率，這將是香港的歷史使命。

## 國際化的地位

從國際化的立場看，一般來說，香港的成績可說是可圈可點。香港仍是亞洲以至世界的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旅遊中心，這除了香港人自己努力不懈以外，還有中國中央政府的高度支持。世界人士都可看到「一國兩制」不是一個口號，而是實際政經運作的原則。香港的法治規範和財政管理，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了信心，使他們繼續在香港投資經營。香港是外商跨入中國大陸最好的跳板，亦是國內企業股票上市吸引外資最好的橋梁，這種國際信心，是香港軟實力的一個重要因素。

近年來，許多有識之士鼓吹香港「本土化」，主張學中文，講普通話，認識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文化，使對中國有更多的歸屬感。過去一百五十年中，英文是唯一的官方文字，廣東白話亦是獨特的地方語言。所以政府及企業間溝通的媒介，不是英文，便是廣東話。無怪乎許多大陸人士初次來港，會覺得香港比歐美更像外國。在《基本法》的精神下，中文與英文已並列為官方語言。近十年來，學中文和講普通話已變成國際化企業風尚，所以香港本土化，就是中文化，實際上更促進了她的國際化地位。

在全球化的競賽中，競爭者將來自多方面，以多種方式出現，且多為以前想像中所未及者。香港未來的國際地位，即在中國本土，亦並不是沒有威脅的。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

開放，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杭州、廣州、深圳以及內陸的成都、西安、重慶、武漢等，他們以不同的地區資源為支撐，迅速發展，並致力於與國際接軌。香港是中國門戶港的特殊地位已經面臨多方的挑戰。

但是有挑戰並不表示不能有進步，香港自有她獨特而可貴的優勢，問題是香港的領導階層是否能真正了解香港的軟實力，是否有能力帶領港人確保並發揮她在天時、地利、人和上的環境優勢。

香港在國際化上超越於其他競爭者的是她的軟實力，亦是國際企業對香港的信心之所在。這個信心，是建立在她以法律為基礎、執法為規範的管治機制上，並以自由經濟、市場規則為運行的指南。這和一個執政黨派的領導，一時政商團隊的勾結是絕不相同的。香港的政府，應該以持續得到國際信心為一個重要的施政方針。在這軟實力的基礎上，香港應調整硬體的建設，建立更人性化、人與自然和諧的環境，並且彰顯它的軟實力。

以生態環境為例：香港原是一個美麗的海港，藍天白雲，風光明艷。許多過客到香港，都為她的美麗、開放、自在、調和的風韻所吸引，並認為這是安身立業、頤養天年的好地方。但是回歸十多年來，天空常灰霾晦暗，水天共迷濛一色，香港似乎已成為典型的大陸城市。最近的報導指出，因為空氣質素日益惡劣，形成下一代健康的威脅，影響了專業人士留港的意願。若干國際企業已有遷地為良的念頭，

考慮另覓公司的營運中心，以避免高級人才流失。這對香港應是一個重大的警訊。一個有為、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些什麼？

但是許多官方的宣示，常把空氣的敗壞譏之為區域性問題，而指出在兩制的情況下，不是單一城市所能為功。其實維護環境，處處有責。大氣污染的流動，固然不受邊界的限制，但香港本身在交通控制、排放源頭、城鄉配合、建築規劃等可以改進而維護環境生態的實在很多。國際大都市如東京、新加坡、倫敦等在減少都市空氣污染的措施，應該可以借鏡。保持良好的環境，還我美麗的天空，香港維護她在國際化上的地位，是她在全球化下競爭的重要因素。

毋以善小而不為，是追求卓越的起點。塑造優良的生活環境，對這能夠掉以輕心嗎？這不是坐而論道，而應是起而篤行的時刻了。



# 回歸十二年看香港： 技術化與人才培育

## 高等教育發展的異數

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力，主要在人才與技術。世界上有前瞻有遠見的政府，莫不以發展高等教育及科技研發為重要施政措施。過去十二年來，香港在科技方面的發展，雖然有不少進步，但仍缺乏指標性的成就。所以從整體來說，香港在技術化上的成績只能說是中平。但在過去十二年中，香港的高等教育可說有相當突出的成就。

目前全港政府資助的八所高校中，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在多種國際性的評比，可說已名列世界優良高校之林。香港科技大學，創校不過十七年，居然揚名全球，令國際人士對香港刮目相看，引為盛事。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這兩所在回歸前升格的學校，十年中力爭上游，蜚聲國際。

根據目前大學調查比較最全面的機構英國QS-Top Universities的排名，大中華地區列名在前250者如下表：

|             | 全球排名<br>2009 | 全球排名<br>2008 | 亞洲排名<br>2009 |
|-------------|--------------|--------------|--------------|
| 香港大學        | 24           | 26           | 1            |
| 香港科技大學      | 35           | 39           | 4            |
| 香港中文大學      | 46           | 42           | 2            |
| 清華大學        | 49           | 56           | 15           |
| 北京大學        | 52           | 50           | 10           |
| 國立台灣大學      | 95           | 124          | 22           |
| 復旦大學        | 103          | 113          | 26           |
| 香港城市大學      | 124          | 147          | 18           |
| 上海交通大學      | 153          | 144          | 29           |
| 中國科技大學      | 154          | 141          | 24           |
| 南京大學        | 168          | 143          | 27           |
| 香港理工大學      | 195          | 224          | 38           |
| 國立清華大學 (新竹) | 223          | 281          | 40           |
| 浙江大學        | 247          | 229          | 32           |
| 國立成功大學      | 281          |              | 43           |
| 國立陽明大學      |              |              | 47           |

全球大學調查排名，當然是相當複雜、爭議性甚高的工作。在眾多機構之中，QS著重於調查同行學術評估(40%)、教師 / 學生比例(20%)、人均論著引述數(20%)、僱主評估(10%)、國際教師與學生(10%)等，對學校的教學、研究、畢業生、國際化、校務管理等各項，作出較全面的分析和評比，其結果廣為教育界注意。

從上表看來，在近兩年中，排名在全球大學前50位的，大中華地區佔有五名，計香港3（港大、科大、中大）、大陸2（清華、北大）；排名在全亞洲大學前50位的，大中華地區佔十六位，計香港5、大陸7、台灣4。

香港彈丸之地，儼然形成亞太地區新興的高等教育中心，不可以不說是一個異數。近年來許多國際和中國內地的優秀學生，對於來港留學進修，已有高度的興趣。

實際上香港的高等教育，可說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殖民地時代，教育一直不是港英政府的重點。久而久之，香港人對自己的潛能失去信心，事事仰仗外國，淪入典型的殖民地運營模式。多年來香港以OECD層次的經濟力，在教育上的投資，屢次排名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之後。香港許多富有的家庭，紛紛把子女送往英倫、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地就學。中等家庭以下，如果子女勤奮成績好，父母又能支持，可望考入港大、中大。如果家計拮据，而子女好學心切，可以僑生身份，前赴台灣，接受大專教育。回歸前不久，港英政府或者因內疚神明，或者因外慚清議，不得不加強高等教育，乃將兩座技術學院升格為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並開始籌辦香港科技大學，而以建立成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

回歸十年內，特區政府受多方督促，開始加強高等教育的投入。但政府領導與社會各界共識不足，大學教育常成為政治皮球。教統局常是各局署間的弱勢分子，每年經費之籌

措，煞費苦心，備受壓力。而各校嗷嗷待哺，時怨不足。無論如何，十年來預算之驚險時刻甚多，教育經費勉能保持一定水平，已是難能可貴。

在此情況下，各高校必須靠各自的努力，爭取社會的支援及企業的合作，並廣設各式企業管理之教育及訓練（如MBA、EMBA、iMBA等），以求財務上之挹注。總之在資源短絀的情況下，各校發揮創意和手段，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專家，同為建設未來香港及中國而貢獻。今天的香港，在科教方面，可以說是濟濟多士。所以十年中香港高等教育的成就，應是香港人的驕傲。

## 科研投資落後

香港政府對科技研發及人才培育的投資，如以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標準來衡量，是不夠的。舉例來說，研發方面的投資，在OECD成員國中，通常為GDP的3%左右，即使是中國、新加坡和台灣，分別是1.44%、2.52%、2.62%。但是同年(2007)香港政府在研發上的投入，約為GDP的0.77%，可說是落後了一大截！

大學肩負着傳播知識、創造知識、服務社會的責任。創造知識與傳播知識是相輔相成的。在全球化的競爭裡，大學如果沒有創造知識的能力，就不能充分傳播新知、培養創新。大學要創造知識和傳播知識，需要政府積極的投入和社會普遍的支持。

香港常以世界級城市(World City)為標榜。其實任何世界級的城市必以世界級的大學為支撐。例如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和紐大，波士頓的哈佛和麻省理工，三藩市的加州大學及史丹福，倫敦的帝大及劍橋等。

人才是社會發展的主宰，大學是人才匯集的表徵。培養高級人才，是百年大計。政府不能為節省成本或加速表象，把學生放逐去國外上學，那是落後地區或殖民地的概念。大有為的政府應該有決心塑造世界級的高校，培養自己的子民，並吸引更多國際優秀人才前來。人才的交流，智慧的激盪，可使香港的未來，進入更高一層樓。

未來的香港應該不僅是金融業、服務業、旅遊業及運輸業的中心，更可能發展成為高等教育、科技研究、企業管理、創意設計、文化交流的中心。它需要不斷的探索、研究、創新、發展，才能發揮功效。沒有世界級的高校為基地，這些都是無法達成的。世界級的城市和世界級的科研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

## 發展科技人為不臧

香港過去十年在技術化上沒有重大的成就，除了政府策略性投資不足之外，官僚的短視和落後的管理，窒息了科技的發展，亦是一個因素。我們可以從幾個實例，去了解香港科技化中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香港科技園和香港應用技術研究院的首長，自成立以來更換頻仍，以致政策搖曳，士氣不振。這兩個機構都由政府操盤運營，到現在成效如何，未聞有客觀的檢討。開創時政府有沒有善盡問責的責任，其後如何改弦更張？前特首董建華在1998年提出的50億創新技術基金，多年後過半仍沒有動用，是香港沒有科技人才嗎？科技人才不願努力嗎？還是官僚化的程序，堵塞了流程，使這些可貴的資源，不能灌溉到乾枯的幼苗上？大學裡科研人員對於政府手續的繁苛，以致有能而無為，大都搖頭太息。

從科技行政實務舉例，香港政府的經費，可以自由的去英倫、歐洲、美國、日本各地購買設備、材料和勞務，但是不能用在珠三角及中國大陸。這不是崇洋媚外的殖民地心態作祟嗎，還是政府真是缺乏企業管理常識？再一個實例是應用科技院經過多時的規劃，但成立之後政府以微細管理(Micro-management)及財務稽核把關，卻不能防範在本地看風水，以致產生社會笑柄。此種不幸事件的造成，是完全不必要的，此真所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政府以問責政制自許，但事後草草了事。

就較宏觀的行政規劃而言，過去三十年香港和珠三角形成了「前店後廠」的關係，各取所需，相安互惠，但是這個模式已經不能持續。因為珠三角的城市，已不能以「後廠」為滿足，而香港「前店」的條件，亦已不能獨佔。所以香港和珠三角之間，如何虛心定位而建立新的互惠關係，喧嚷已久，

動作不少，但政府都是被動姿態，不見有整體藍圖。即使有CEPA為保護，亦不能作根本的調理。

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民眾得益於台灣的科教和商貿的交流者極多，但近十年來特區政府對台灣卻採取敵視或漠視的態度。很可笑的，中國政府許多中央及地方的領導，紛紛設法以各種名義去台灣訪問，希望增加了解並尋找合作機會。香港特區政府，雖然近在咫尺，卻視而不見，裹足不前，無形中畫地自限。冬眠多年後，最近凜於「兩岸三通」對香港的威脅，才有若干高官去台灣訪問，不知何時才能真正做些雙贏的計劃。

這些不過是特區政府十年來在政策上或執行上的一些盲點，但直接影響香港在技術化上發展的速度，亦降低香港未來在全球化中的競爭力。

香港產業界人士對全球化競爭的壓力，較有真切的了解；然而，政府領導好整以暇，看不出有危機感。輿薪之不見，善小而不為，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2008年10月10日曾特首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引人注目的提出將投資千億元，致力於十項基本建設，並預言將可增加若干就業機會。但對於高等教育、科技研發方面，似乎無話可說。領導高層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如此，不禁令人失望。無怪乎有大陸學者說香港施政方向，已與典型內地城市無異。不出十年，香港在技術化上之競爭優勢喪失殆盡，可能更為邊緣化。「五十年不變」云夫哉！



## 回歸十二年看香港：民主化

從民主化的角度來說，過去十二年來，香港政府並沒有太大的進展。平心而論，董建華最大的任務在「平穩過渡」，而非推進香港民主化。董能把主權回歸一件大事做好，對中國及香港來說，已是貢獻良多。他在任期內為禽流感、SARS、水災、股災等所苦，這些災難的起因不應歸咎於他，但他對危機管理和應變措施不如理想，主要是沒有建立有效的領導系統，不能順心指揮他的班子。董建華富國家意識，具國際視野，有政商人脈。可惜雖有理想，未能建立執行的團隊；推動政策，仍待原港英政府官僚的配合。後期推出「問責制」，但有名無實，終於草草收場。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最後二十三條的輕率登場，使港人失去信心，「民無信不立」，軟實力既去，只有鞠躬下台。

曾蔭權是港英政府傳統官僚出身，熟習政事，人情圓熟。看來他心無旁騖，只要「做好呢份工」，極合北京心緒。社會人士對他能否帶領香港，在民主化道路上更上一層樓，不無疑問。各方雖然憂心忡忡，但北京既然屬意於他，只好給他機會試試。

目前人民在香港比在中國大陸擁有更多的政治自由，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香港廣大民眾對「獨立」沒有興趣，亦是不爭的事實。眼看全球化洪流的推進，民眾關心未來的發展，期待在全球化競爭上力爭上游，對特區政府，自有深切的要求。他們希望能選出一個大有為、負責任(Accountable)的政府，並能接受市民的監督。所以對全民選舉遲遲未能達成，覺得無奈。全民普選不是政治現代化的萬靈丹，但它看來是最可靠的。普選時亦產生錯誤的人選，但它自有和平的自行調整(Self-Correcting)的機制，亦是民主化的重要特色。

香港人民對民主化的要求，不外兩點。一是特區行政首長由全體選民依法直接票選，一是廢除立法局議員的功能組別。

## 異哉，香港特色政制

根據香港特區的基本法，特區行政首長是由一個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任期五年，連選可以連任一次。這個選舉委員會的成員來源有四類：工商金融界、勞工社會宗教、職業專業人員，及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香港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全國政協委員)等。全港居民中大約有180,000幸運者，可以有機會參加這800人的委員會，隨之可以參加特區首長的選出。這種選舉方式，既非直接選舉，亦非間接選舉，非驢非馬，姑稱之為「香港特色」。它的理論基

礎薄弱，實際運作亦少透明化，所以為普遍民眾所詬病，回歸後一直是社會爭論的焦點。

2005年董建華在期滿兩年前辭去特首職位，繼任特首的任期問題，引發了憲法危機，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拍板定案。港人要求盡早由全民普選特首，以符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北京一直堅持考慮「實際狀況」及「循序漸進」，說穿了就是不希望選出一個「港獨」，或一個不易指揮的人。港人要求有「時間表」及「路線圖」，說穿了就是怕北京無限期的拖延，希望北京能對「序」及「漸」有個清楚的定義。

香港立法局亦是一個怪異的香港特色組織，它由60名議員組成。其中一半透過全民普選產生，即香港有合法選舉權的選民共約300萬人，可以在住宅區域選出共30名議員。另一半議員由功能性團體及個人選舉產生，全港可以參加功能組投票的約為22萬人，自然亦是特權階級。這功能組別的名額，分配到28個職業團體及若干個人，他們所代表的是企業界、特定社會團體或豪商巨賈的利益。這個四不像的結合體，實際上是1985年時港英政府所提出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給商貿、金融、企業等優越的政治待遇，留住他們在香港，給回歸後的香港社會，提供安定的力量。這當然是在全民直接選舉前，一個過渡性的安排。很明顯的除了既得利益的個人及團體外，絕大多數的香港民眾，在平安回歸十多年來，都不喜歡這種安排。

在廣大的民眾呼聲下，北京終於作出了一些決定。2007年冬全國人大常委，裁定香港特首人選，可以在2017年由香港人民普選產生；但立法局的功能組別，則維持原狀。香港民眾對2017普選特首的目標，雖然不很滿意，但一般都了解現實，自可接受這個決定。但對立法會功能組的存在，一拖再拖，反彈甚大。2010年初有五個泛民主黨派的議員，為表示抗議，提出辭職。他們預備在補選時重新參選，或推薦特定人士參選，以此視為一種「公民投票」(Public Referendum)，言詞激烈，頗受社會重視。

北京堅持維持立法會功能組別，是令人相當訝異不解的。難道北京覺得少數利益團體，比普羅大眾更能代表民意？或更易控制？這將如何面對鄧小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北京如何回應人民爭取民主化的要求呢？

## 一國兩制不會有失

百年前滿清政府的失敗，是由於他們骨子裡的封建思想及威權意識，不能適應民主化的歷史洪流，以致閉關自守、故步自封。他們對民主化有高度的恐懼感，因恐懼而排斥，不知道這種全球化的潮流，是無能拒絕的，所以最後在民主洪流中葬身。

現時來說這些歷史教訓，似乎是危言聳聽。但是，香港特區680萬民眾中，只有約百分之三以下的少數人可以參與選

出800個特權選舉人，再間接去選舉特區首長這宗事，無論怎麼看都是可笑和可悲的，香港何能自稱為亞洲的國際城市呢？這種現象能持久嗎？

當年鄧小平提出香港回歸以後，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指導原則。他的決定是超越時代的，是革命性的。他知道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環境複雜，許多民主化的條件還未普遍成熟。但是香港的歷史背景特殊，國際接觸頻繁，國民教育平均，通訊工具普及，因此可以去嘗試一個新的政治體制，亦可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參考。其實香港九龍，都不過米粒之珠，中央政府自應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去帶領她。所以鄧小平力排眾議，確定推行「一國兩制」這個實驗。他深信香港與北京在香港民主化的最終利益，應該是完全一致的。

香港回歸中國，轉瞬十年，十年來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可以說已有完全的認同。中國的領導人，從以前的江澤民、朱鎔基到今天的胡錦濤、溫家寶，都是香港人崇敬的對像。香港人對救助長江水災、汶川地震，或慶祝北京奧運，就像是自家的事。回歸十年後，雙方更了解彼此的理念和規範。雙方如果有任何差異，那是在民主化及推行民主選舉的認知上。

## 解鈴還需繫鈴人

香港人認為「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宗旨，已經賦予香港人實行民主化的權利；而目前產生特首、議員的機制是落伍、可笑的，必須盡速修正，盡快雙普選。中央的看法，根據《基本法》的護法大老們所傳達的似乎是：「非也，非也。我們要給你多少就是多少，要什麼時候給你就什麼時候給你。」香港人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有極大的挫折感。這些大老能夠代表黨的意思嗎？能夠代表人民的最大利益嗎？

其實在八十年代研商《基本法》時，採用這個選舉機制，實有相當自然的歷史背景。因為當時北京對香港人對回歸的調適，不是十分肯定，所以不可諱言的總要留個彈性的機制，以防萬一。但十年後的今天，香港重返中國懷抱，受到港人的衷心歡迎，是毫無疑義的。香港民眾只要求一個有尊嚴的民主化，並透過民主程序選出真正能代表他們的自治政府。

北京應明白香港和台灣、西藏是不一樣的，這裡並沒有「港獨」要求香港獨立。其實給予香港名副其實的「高度自治」，不亦是中央對付台獨藏獨的良方嗎！

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現在哪裡去找？如果「一國兩制」的政治實驗在香港不能徹底推行，會給台灣一個什麼榜樣？歷史將如何評價鄧小平，如何評價他的繼承班子及當代領導？解鈴還需繫鈴人，現在是當代領導展現政治智慧和勇氣的時候了。

許多西方人說東方人不需要民主，只需要經濟；中國人能吃飽肚子就好了，政治管他的！其實這是對東方民族的藐視。我相信這種扭曲的民族優越感或卑劣的政治短視，大大損傷了孫中山及鄧小平的民族情懷。他們要中國人有尊嚴的站起來，和世界列強平起平坐。所以未來的香港人、中國人能否真正崛起，而走在全球化發展的前列，民主化應當是重要一環。



## 曾蔭權的煩惱：軟實力的消失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  
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  
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

宋 · 蘇軾

曾蔭權自從在2005年6月出任香港特區行政首長以來，香港的經濟增長相當穩定，社會秩序亦甚為平和。這樣的整體表現，對一個地區的領導來說，應是值得欣慰的。但是我們所觀察到的曾特首，似乎時常悶悶不樂，若有所失焉。

曾特首先所關心的是民意支持的滑落。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中，曾蔭權在剛就任特首的時候，民眾對他的評分高達72.3，這亦就是他評分的最高點，從此以後，評分一直在65左右徘徊。這種民意反映，一般來說，是政治領袖蜜月期的常態。然而，到2008年5月以後，江河日下，9月初的調查中，評分已下降到51.8，在2009年中，亦數度跌至50分以下。對曾蔭權出任特首的支持率及反對率，過去數年，大部分時間成為拉鋸狀態。

在2008年的預算中，曾特首推出若干行政措施，向許多族群額外施惠，預算高達一百多億元，社會多稱之為「派糖」。似乎這種選擇性及短期性示惠行為，在民眾觀感中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果。從調查的資料來分析，民眾對曾特首政府施政的支持率，自2008年6月中的百分之五十四，下滑到8月中的百分之三十九，而不支持的卻相對增加，8月中已達百分之四十一。其他的民意調查機構亦有相似的結論，例如在香港研究協會的調查中，民眾對曾特首多項管治能力，如遠見、執行等等，表示不予認同，無怪乎他看來憂心忡忡。

## 民意像流水而非浮雲

然而，曾特首的鬥志是相當高昂的。在一個公開場合中，面對着許多有關民意下滑的詢問，他倔強的表示「民意於我如浮雲」！這種微酸性的發作，正反映了他心靈深處的傷感。對於關心香港政治前途的人來說，是相當吃驚的。因為從歷史、從中外國家大局的發展來看，民意不是浮雲，民意更像流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希望曾特首還是用審慎戒懼的心情去看待民意吧。

筆者根據對亞太地區政治人物的觀察，曾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說，指出政治人物在登上大位以後，時常患上了某些職業性的症候群，姑稱之為「三低兩高」：低估了人民的知識，低估了社會的變化，低估了時間的緊迫；高估了自身的智

慧，高估了權勢的功能。用坦白得近乎不禮貌的話來形容，就是傲慢、偏見、無知、權謀。從這個觀點上來演繹，可以了解日本福田康夫、韓國李明博、台灣馬英九所面臨的民意困境。我們的曾蔭權特首，是不是亦可能感染了類似的症候呢？說不定一個虛心的檢討，可以作為未來施政的參考。

## 經濟背景得天獨厚

香港其實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別的不說，它以彈丸之地，產生了驕人的經濟實力。以GDP而言，在2007年高達2,067億美元，相當於世界國家排名的第三十五位。它的人均GDP，接近3萬美元，與OECD國家相當。在這龐大的財務收入之中，它不需要支付國防費用，亦不必向中央政府上繳稅款。它已有合理的基礎建設，足以支撑當前的經濟活動。它的國民教育普及，法治基礎良好，資訊技術利用率高，市場經濟經驗厚，它可用的資源遠比面對的困難為大。九七回歸後，每當香港經濟發生警號，中央政府馬上伸手援手，可稱無微不至。自由行、CEPA、國企股上市等，不過是犖犖大者。

一個政治人物能夠在香港擔任行政首長，應可以說是機會難得，只要敬事而謹，以民為本；唯精唯誠，厚植民信，自應是得心應手，還有什麼可說的？

曾蔭權在競選特首位子時候，提出了一句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這個口號是很平實的，每一個政府官員，每一個企業人士，不論性質，不論職位，應該如此，這是「理所當然的」。曾蔭權以此為標竿，正突顯他「踏實」、「穩健」的作風。然而，香港是一個世界性的重要經濟實體，亦處身全球化、民主化的前沿；民眾對特首，自有一種特殊的期待，希望他有深邁的遠景，恢宏的世界觀，把香港帶上更高一層樓。民眾希望特首不止能做好「呢份工」，更可領導香港往前衝，在全球激烈的競爭中，為香港創造更多更好的優勢。但是從這個標誌性的宣示中，看不出他對前景有任何理想、期待或策略，他只要做好這份工便是。對一個堂堂的特首，提出這種泛泛的理念，香港民眾普遍都相當失望。

如果不是梁家傑下海競選，為民主政治做一個詮述，許多人在選舉當日，寧願留在家裡看老電影重播。

再進一步說，如何才算「做好」這份工，那更是一個令人困擾的課題，實際上亦是香港特首真正困難所在。簡單的說，特首的主人是誰，誰說了才算？要真正回答這個問題，是相當複雜的。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前提下，特首當要伺服兩個主人：一是北京的中央領導，一是香港的700萬市民。他的被提名及當選，都是聽北京的；然而，他為香港市民服務，應接受市民的評估。如何在這兩個極端中，取得平衡，而贏得雙方的共同支持，這需要極大的智慧及極大的毅力。

## 審時度勢創造新境

當前香港面臨許多重大的環境挑戰，珠三角的崛起和台海兩岸的解凍，對香港未來的競爭力，又有切身的關係。然而，對香港社會的和諧和政事的推動具有重大影響的，莫過於政治改革方案。2012年立法會選舉轉瞬來臨，如何改變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建制及其選舉方法，使香港能早日實現全民普選，這是特區首長的職責。能真正了解背景、各方人士的潛在利益，及方案對香港民主化前途的影響的，捨曾蔭權外，還有第二人嗎？這應是曾特首展現積極企圖心及領袖風範，去了解、溝通，異中求同的好機會。

除了政制以外，香港的內政積留著許多年未能解決的問題，是相當令人憂心的。香港因緣際會，已有西歐國家的人均GDP，但距離一個有品質的現代化社會，仍然很遠。香港貧富懸殊，是有錢人的天堂，乃眾所周知。但中等收入以下民眾的生活環境品質，很多是不及格的。令人詬病的問題很多，一個例子，是公共醫療服務系統奇差。目前普通市民如需進入公立醫院診治，除緊急狀況外，通常要等待半年或九個月之久，這已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在居住環境來說，在幽雅的半山區或高聳入雲的大廈附近，四五十年殘舊不堪的危樓比比皆是，目前仍是近百萬市民的棲身之所。無怪乎近年來多次的民意調查顯示，60%以上的市民，都關心香港的貧富對立、官商勾結、官民衝突的問題。現時認同香港是

和諧社會的，只有25%左右。但是在政府收入短少時候要緊縮，政府預算有盈餘時只會「派糖」，這樣的政府，如何令人信服？

二十年來全球化浪潮所引起的社會快速變化，不是八十年代的思維所能想像的。所以加速直選與普選的來臨，是今天絕大多數香港人的共同希望，因為香港人渴望有一個大有為、負責任的政府。曾特首似乎並未充分了解這些社會環境和民心知識的快速變化，未能充分調整自己的定位和職責。未來三年，他必須有更好的策略，以領導民眾，並反映民意。這豈不亦是中央領導人再三強調「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嗎？若非如此，他所遭遇到民望下滑的煩惱，自會是事所必至。孔子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這句話是很有啟發性的。



# 曾蔭權的民望轉機：重建軟實力

香港追求民主化，在回歸十年後特別殷切。一個地區生態的發展可以用個人來比方：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中國幅員廣大，地區環境迥異：有些地方特別需要用水，有些地方特別需要電，有些地方特別需要公路，有些地方特別需要人才。香港處於東西文化交匯的要衝，這裡特別需要「民主」。而直選普選是民主政治的要素，所以回歸以後，香港人民最重要的訴求就是雙普選：特首和議會。香港是全中國最具民主化條件的城市，香港人有這個信心，希望中央體會他們的信心。

香港人民其實亦是很現實的，他們並不奢求明天就能達成雙普選，只希望中央答應一個明確合理的時程。中央可以劃下「道」來，說清楚什麼是「循序漸進」。

幾年來，許多北京來的護法大老說，香港最重要的是經濟，不是民主。他們指出中央放寬旅遊自由行及CEPA等對香港經濟景氣的重要協助，覺得香港人現在就像手上拿看一個，眼睛瞄着另外一個一樣，未免貪多無厭。這話並不是完全沒道理的，但香港人亦記得上世紀初許多西方強權和帝國主義者，包括英國、蘇俄、日本等說：中國人只要有飯吃就夠了，政治上怎麼處理都不要緊。

香港有世界上前四十名的經濟力量，中央要幫助香港的，應是積極輔助香港人自治，以脫離百年殖民地的陰影，使它在全球化社會中真正能夠站立起來。以香港具有的中國的特殊歷史背景和西方的市場經濟經驗，將來可對中國的持續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鄧小平超時代性的政治智慧，是透過「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架構，在香港採用一個特殊的機制，讓它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試驗場」，這對中國長遠的發展，應該更有積極性的意義。所以「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更好」不是一句空話，而應是中國長期發展的策略。

現在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已對香港有充分的影響，香港對中國經濟、貿易、文化已建立了高度的依存關係，彼此的前途，自然會更緊密的融合在一起。中國需要一個有效能有民意基礎的香港特區政府，使它能為香港人民服務而不事事仰賴中央的支撐。

一個充分民選的特首及議會，可以對香港的今天及未來，負起全部的責任。如果以現有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他們仍不能解決水災、颱風、雞瘟、流感、金融危機等的衝擊，並奠定未來的競爭力的話，這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活該被人民趕下台，中央不必過分的袒護他們。

香港雖說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城市，但在政治體制及政事管理的理念上，需要積極改善的還確實不少。一些不合理不合時、非驢非馬的制度及運行仍然存在，許多是殖民地時

代所遺留的怪物。民主化如不能真正推動，「一國兩制」反而變成官僚消極辦事的遁詞，民眾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失去信心，其實是不難了解的。

曾蔭權在執政三年中，民意支持下滑的一個基本原因，是他先不敢公開提出「民主化」的理想，後不能積極的為香港爭取「民主化」。前者情有可原，後者是民眾所不能諒解的。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民眾和泛民黨派等對某些施政方案的反對或支持沒有關連。曾特首必須努力去了解現時民眾的知識成長、民眾的內心要求、社會的迅速變化和時間的急迫壓力。他如明白民心向背和時代潮流，兩年來民意對他支持的下滑，才會有轉機。

曾蔭權民望下降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他的管治能力或領導風格，這和特區政府本身的組織及運作有關。曾本人在香港政府服務，從1967年起到現在已逾四十年，歷經多個部門，最後二十年又是重要的局司領導，對於香港政府政事的運作及人事的圓熟，在公務員系統中，不作第二人想，這當然亦是中央政府屬意他繼董建華為特首的原因。其實董政府最後的三五年中，重要的政務，曾蔭權都有直接或參贊的責任，但好好先生董建華成為所有責任的箭靶，不可不說是一個異數。

然而，曾出任特首之後，香港就發生毒海鮮、西九龍開發、政府總部與填海、銷售稅、特設副級首長、退任首長轉職等爭議。雖然這些事件沒有惡化成為五年前二十三條產生

的重大負面影響，但政府的行動遲鈍，各部門步調不一，令人質疑政府的效能，引起社會對曾本人管治能力的懷疑：他究竟能否做好這份工？

令民眾及國際人士不滿的特別是政府坐視自然環境的敗壞，而沒能採取有效的措施，空氣污染已成為香港最明顯的困難。香港十年前引以為傲的晴空碧水明麗風華，近年來已逐漸看到昏天暗地迷塵陰霾。雖然香港的環境污染和珠三角的龐大工業發展不可分，但實在亦有許多工作，是香港本身該做而未做，或做而不徹底的。

環境敗壞的問題，盤根錯節，牽涉多門，舉凡交通、衛生、工業、商貿、航運、基建、規劃等多個部門的職司，互相重疊。各方領導每次在公共場合，對環境的重要性侃侃而談，而遺憾的大都是人云亦云，口下雖有千言，心中實無一策，終究都是別人的責任。要克服官僚間的本位主義，談何容易，必需特首劍及履及的率先領導及協調溝通，方能略見功效。捨此以外，別無他途

但香港陰霾的日子，十年來迅速增加，現時超過二分之一，變成國際企業設置總部的關心課題。去年曾特首的施政報告出爐後，一位大陸來的朋友說，看來香港和許多國內大城市一樣，只會倒水泥！

曾特首上任後，以極迅速的手段，任命了許多位高薪的權貴，但人事每出嶢崎，如梁展文轉職案的曝光，充滿了官官相護、官商勾結的氣氛，雖說媒體不無捕風捉影，但政

府亦可說愈描愈黑。許多案件固然是有職司的局長的直接責任，但香港方圓極小，這些遊走於法律邊緣的事件，那能逃出曾特首的法眼。所以他不能挺身而出，適時解答疑竇，民眾總覺得是相當遺憾的事。理論上，沒有一個特首是全能的，但對一個有完整經歷，精明強幹，而矢志要「做好這份工」的曾蔭權，民眾有「超值」的期待，是應該可以理解的。

香港的立法會是一個很有趣的機構，因為天生的組成，議員或代表區域民眾或職業團體及大企業主，各自表述，自然是形形色色；有些黨派心無旁騖，各有服務的優先，引起特首「親疏有別」的宣示。無論如何，議員們本身大多數仍是有理想、有抱負的菁英人士。但在立法會內，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自然力不從心。

議員們雖能叫，但不能咬，所以許多有志之士，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意興闌珊。儘管如此，民眾仍然透過立法會的運作，給曾特首不斷的訊息。2008年9月初的立法會選舉，就是這樣。新一屆立法會的組成，各黨派之間雖然沒有重大變化，但許多年輕的、有專業訓練的、有民主化理想的議員，脫穎而出，他們代表市民，已給特首嶄新的挑戰。

今天全球的社會都已遭受美國及國際金融風暴的危害，變數極為繁雜。曾蔭權面臨的新挑戰，是非常嚴峻而不可掉以輕心的。然而他必需在香港的民主化上有真的奉獻，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提出新的願景，才能帶領香港人衝破困難，向未來著眼高處發展，香港民眾對他才能重建信心，他的民望

支持和歷史地位，才會有新的轉機。這些都是軟實力的範疇，民眾當拭目以待。

在本書定稿之際，曾蔭權特首公開邀請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議員，就政制改革問題，進行一小時的電視辯論。定期為2010年6月17日，即立法會表決政府所提出改革方案一週以前。苟不論此辯論結果如何，對立法的表決有何影響。但曾特首敢於面對異見份子的決心和勇氣，是值得稱許的。這是曾特首對重大問題，直接向民眾尋求共識的首次。看來他對強大的民意壓力，已有警惕之心。他要能虛心的建立民眾對他的信心，對他個人的歷史地位和香港的民主化，當有積極的意義，筆者對此，表示誠懇的祝福。



# 香港與珠三角在全球化中的新定位

大珠三角是過去二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經濟支柱，它約略以中國百分之零點三的土地，百分之三的人口，提供了全國約百分之三十的出口值。它的總體經濟，十年來都以雙位數字增長，比全國的目標增長率超前三個百分點。十年來中國成為世界的製造大國，而珠三角是中國最大的製造基地，在這裡產出了全世界約百分之五的工業產品。然而從最近的徵兆看來，珠三角在未來的幾年中的經濟發展，將充滿了變數。它能否保持以往二十年的光輝，必須看他能否克服時代的挑戰。

## 油價帶動通脹

作為一個製造業中心，它的發展空間取決於產品對社會的使用價值及在市場上的接受度。與這兩者有直接關係的，是市場價格與成本之間的差距。過去幾年來，成本中的重要元素如能源、物料、勞工都不斷上漲。以石油為例，世界石油平均價格每桶由2002年的22.8美元向上飛騰，到2008年2月29日終於穿破了百元大關，4月22日已直搗120美元。這種

狂飈，實在是十年前不可思議的事。高昂的油價帶動所有型態的能源及各種進口物料價格升高，自是理所必然。至於勞工薪資，原來已隨著國民平均所得的增加而水漲船高，珠三角的幾個工業區內，在2002到2007年五年中，最低工資的提升，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的，比比皆是，所以珠三角的製造成本，發生了震撼性的膨脹（可參考2007年11月《香港工業總會月刊》）。

當然製造成本高升的趨勢，對全國各地，都是相同的。珠三角之所以有特殊的壓力，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多年來需求面持續增長時，生產要素的供應面並不能同步增長，因而造成了供應的短缺。每年的營運周期中，都會有「電荒」、「油荒」、「工荒」的時段，更加強了成本上升的尖銳性。另一方面是「環保」成本，十餘年來因為產業的急速成長，珠三角的生態污染已經非常嚴重。大部分都市市區，每年陰霾的日數超過三分之二，許多城區鄉鎮的髒亂和河川的惡臭，已到令人不忍看不敢聞的地步。所以廢氣廢水廢料的排除和清理，日為迫切。現在排放終端的處理以及製造方法的革新和製造程式的改良，已成為企業經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凡此種種，都大大的提高了製造業者的成本。

然而，過去一年來對珠三角製造業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意外因素，可以說是中國政府法規的變動，主要可說的有兩項。第一是2007年7月商務部及海關總署為調整外貿結構，改變了對若干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受到影響的約有二千四百

種產品，大部分都和珠三角有關。其次是2008年1月公布的《勞動合同法》，規定保障勞動者的僱用、工資、工時、休假、保險、福利等，尤有廣泛的影響。實際上《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是對勞動者的保護及福利的關懷，這對保障勞工權益，促進社會和諧，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過去數年中國國內所發生的煤爆、化災、黑礦、童工事件，接二連三，這是文明國家的恥辱。所以新勞動法的法意是絕對正確的。

## 人民幣升值削弱競爭力

從價格面來看，珠三角的傳統主流產品，如傢俬、衣物、玩具、工具、家庭電器、塑膠用品，以至於商務機器、資訊產品等，由於技術已經日趨成熟，價格自然逐年走低。許多第三世界如印度、巴西、東歐、中南美等的競爭者挾著低成本的優勢，在甚多國際市場中，嶄露頭角，形成對手，使價格節節下降。而過去兩年來人民幣的升值，對產品價格的殺傷力非常顯著，當然更壓縮了利潤的空間。

新勞動法在這個關鍵時刻實施，對製造業者的經營，近期看來，不可諱言的是雪上加霜。最近香港產業界估計，珠三角內面臨停工、關廠或遷移的，可能有二萬家以上，許多是港資、台資、外資或中外合資的產業。

環境保護、勞工福利、關稅調整、匯率波動，這四者都可說是全球化潮流下所不可避免的，它對世界各地的產業，

都有明顯的影響。短期來說，它壓縮了利潤的空間，減少了營運的彈性。長遠來說，它們是中國產業晉身世界一流、能在全球化潮流中競爭必須通過的關卡，也是未來中國產業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產業競爭的優勢所在。

所以我們一方面欣慶大珠三角製造業的強大，一方面亦驚訝它的脆弱。為什麼它會在兩年全球化的衝擊下，表現得如此無力。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多年來珠三角的發展，在企業方面，忽略了長遠的思維去提升產品的使用價值，而過分依賴低成本的策略所造成。同樣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的短視，沒有真正建立地區的軟實力。

## 兩個營運模式交互使用

回顧珠三角的發展，在八〇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它經濟的起飛，主要由於兩個營運模式的交互使用。一是製造業上的「三來一補」，一是市場運作中「前店後廠」。所謂「三來一補」，就是：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複製、補償外銷。這是珠三角製造業的競爭模式，它的主要動力，是來自低廉的勞工。「前店後廠」的商業模式，是地區合作互補的結果，就是利用香港在國際市場、財務、金融、貿易、物流、服務上等的網絡和專長，成為珠三角地區製造業的店面和經理。這種模式，從八〇年代開始到香港回歸的近二十年中被圓熟運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它促成了大珠三角的經濟繁榮，亦造了許多國際知名的企業家和富豪。

在這個雙重模式之下，珠三角產業界的經營理念主要是不斷降低成本，自然把勞工權益、環境保護、科技創新放在第二線。地方政府亦只要能擴大現狀，不斷的「擠牛奶」(Milking the Cow)，自然亦最適合「政績工程」的考慮。無怪乎地區內經濟的升級，大都以近期有效果的硬體為重點，這亦是典型「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心態。所以我們看到了一番廠房擴大、高樓林立、公路拓寬、「虛擬校園」、「超大校園」等非凡景象。

歸根到底，我們必需自心底處從這兩個營運模式解放出來。今後如何從基本面塑造大珠三角在知識經濟社會的價值觀和競爭力，以接受未來的新挑戰，應是策略思維的重點。這將包括：高素質的教育、創業的精神、科技創新的能力、崇法務實的理念、落實的粵港規劃等。重讀蘇軾在《教戰守策》裡所說的警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可見坡公當時居安思危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我們對大珠三角的未來，亦不得不有相似的看法。



# 香港與珠三角發展的關鍵：軟實力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這是引自《孟子·梁惠王》篇的話。梁惠王是春秋各國君主中的佼佼者，勤政勵治，有「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的「大欲」。就是說他有擴大領域，領導全國的重大志向。他所詰問孟子的，實在可以說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問題：河內的年成不好，我把人民遷移到河東，又用糧食去支援無法遷移的人。河東收成不好，我亦一視同仁去協助。我這樣的關心民困，為什麼還沒能得到百姓行動的擁護呢？這是《孟子》中膾炙人口的「以五十步笑百步」故事的背景。

## 遷移企業無助解困

珠三角的產業這兩年遭遇到特殊艱難的困境，油價、電價、物料、人工、環保各種成本高漲，而2007、08年關稅及

勞動法的改變、人民幣的升值、美國市場的萎縮，重重壓縮了企業營運的空間。據最近的一些報告顯示，一兩年內將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小企業因為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被迫關閉；未來受到失業影響的人口，恐怕不下百萬。

為了減少這些後果及影響，根據新聞報道，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將斥資500億人民幣，協助產業界遷移，希望在三年內把珠三角的一些企業轉移到粵西粵北等地區。這樣一方面可以解除珠三角產業成本高漲的困境，一方面亦為落後地區奠定工業經濟的基礎。看來這是「一石兩鳥」的妙計，已贏得了不少掌聲。

這個時刻讀《孟子·梁惠王》，加深我內心不甚落實的感覺。遷移企業，能夠解決珠三角產業及區域發展的基本困難嗎？上面所提到的大環境改變，對全國工業都產生重大壓力，珠三角為何特別脆弱，以至於應變維艱？

對廣東的計劃，因為手上沒有詳細資料，無法加以分析。從報紙所描述的來看，它的政策動機及目標非常崇高，值得讚賞，是理所當然的。我所擔心的是政策實行的效果，恐怕是很有限度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往往以硬實力為發展的目標，忽略了軟實力的影響和配套。樂觀的估計，可從短程來說，這個計劃應可使受到影響的企業及勞工，得到一些財務上的紓解，使災害延遲一段時間爆發。

悲觀的預測，是從長程來看，它可能把沒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系蔓延到其他地區，降低了未來廣東全省的競爭力，並破壞環境，形成更多的工業災難區。

遷移企業，是要叫業主連根拔起，重起爐灶，這是何等重大的決定。有實際操作經驗的企業主應反省，他的企業失去競爭力的主要癥結是甚麼？遷移能否解開這個結？他會問：政府鼓勵企業搬去的地方，有沒有可用的人才力、支撐的技術、集聚的上下游、暢通的運輸、配套的服務、簡便而有規範的政府行為。這些實際上都是企業成本及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對期待產業遷入的社區來說，這是上級替他們招商引資，喜出望外之餘，應好好考慮如何處理這些工廠所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料，及其帶來的工業安全災害、地方交通擁塞及外來人口的衝擊等。他們的藍天綠水生活環境，可能一去不返，這將如何因應？能具體檢討這些問題，才能了解企業遷移的困難並期待實際的效果。

## 長三角後來居上

珠三角是中國工業、經濟、外貿發展最早的地區，又有香港伙伴關係的協助，國際市場經驗豐富，可以說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經濟區域。但是最近十年來，昔日的光輝，已經慢慢地褪色。許多經營高新產業的外商到中國投資，最吸引的並不是珠三角。台灣的企業家，許多喜歡去長三角的上海、崑山、杭州；新加坡、日本的投資者，許多到了蘇州、南京。天津、北京更是韓日歐美跨國科技公司的最愛。珠三角的問題在哪裡？

珠三角的困境，其實是長期以來忽略了軟實力所形成的。所謂軟實力，包括好學開拓的人才、獨特創意的技術、高效落實的創新、崇法可信的政府、公義簡明的法規、清潔和諧的環境等。

我個人去訪問過許多區內的城市，書記市長們大都積極的說這裡有多少電力，多少公路，創造了多少出口，繳納了多少稅金；他們要給廠商多少優惠亦可以商量。但是招商引資的工作，老是不如年度的目標，所以紛紛希望加強實績。縱然這些領導們，都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對科學發展觀，保持先進精神，經濟不忘環保，發展以人為本等等，都能倒背如流。但他們更都知道，到了年終算賬時刻，經濟增長和繳稅金額仍然是高於一切。戳力政績工程，實為第一優先，其他的先放一邊吧。

我常問領導這區內及齡青年就學率多少、升學率多少、高等院校的成績、科教文經費在預算中的比重等等，領導們常是瞠目以對，不知所云。我對領導們建議，他們首先應塑造地區的願景、商訂長程發展的目標，然後規劃高增值、有未來性、適合地區發展的產業，進而了解企業者真正的需要而採取吸引投資的措施。這是地區長程發展三部曲，可惜多數領導沒有耐心聽完。

以我個人的觀察，有前瞻性的企業家，不論投資的是衣、食、住、行哪一行業，或者是納米、無線網絡哪種技術，他們所最注意的是目標地區的人才、技術及社會精神。

水、電、路、房，那些看得見的硬體，只是必要的條件，不是充分的條件。而模稜兩可的優惠諾言，常常變成未來掣肘的圈套，反而令真正企業家望而卻步。歸根到底，有宏觀思維的大企業家所關心的，是地區的軟實力。

大珠三角的人才不盛嗎？說到人才，評論家常提到北京、天津，是皇庭所在，北大、清華，是學界泰斗。長三角的滬蘇杭，文風鼎盛，全國明清以來的狀元魁甲大半出自這裡。珠三角不過化外南蠻之地，自然相形見绌！這種說法，不無坐井觀天之誤。

大珠三角的人才其實是中國的翹楚。遠的不說，我們且從清末看起，在政治上，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圖強，是結束滿清王朝的晴天霹靂。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開啓了中國的民主共和政體。民國初年政壇上的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薛岳、張發奎，都是叱吒風雲，不可一世。中國共產黨的前期領袖，如葉挺、彭湃、李立三、葉劍英，都是大開風氣之先。在實業家方面，容閔、詹天佑有不世貢獻；科學家如吳大猷、鄭觀應；藝術家如馬思聰、冼星海等，四海聞名。至於急公好義的社會領袖，如前年去世的霍英東，給社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勳業。大珠三角，實在可以說地靈人傑，自古而然。要能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才能體會大珠三角人才的突出，他們大都是能開創卓立，對全國有宏觀影響的人，並非只擅吟詩作賦的騷人墨客可比。

## 從軟實力做起

然而，十多年來大珠三角的人才逐漸式微，技術進展緩慢，行政效率落後，環境品質衰退，這些都是我們所應虛心探討的。能够這樣，才能正本清源，對症下藥，以解決珠江三角的困境，振興它的未來。孟子再三強調要從人民「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做起。這些都應是將來的課題，容許我暫時打住。不過《梁惠王》中的另外一段話，應可發人深省。孟子說：

「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孟子所勾劃的願景，不只是一個知識分子喜愛的國度，亦是一個農業、商貿、旅遊各業蓬勃，容納政治異見的天地，多麼令人嚮往。有為者當如是，不亦宜乎！

參考：林垂宙〈軟實力是珠三角未來發展的關鍵〉，見王力行主編《贏在軟實力：華人企業領袖的二十堂課》，天下文化出版社，台北，2009。

# 台灣



# 台灣領導文化軟實力的培養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春秋・管仲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

…民國・蔣中正

台灣在二十世紀中葉後的崛起，無疑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奇蹟，但它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衰退，亦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異事。要了解這些演變，必須先了解它的六代領導人：蔣中正、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領導風格和他們對台灣賴以在全球化中競爭的軟實力的影響。這六位領導人的志業，可以分成兩組，前三位代表軟實力的培養，是多難興邦的時代；後三位代表軟實力的式微，無以名之，果「泰山其崩夫」！

## 蔣中正

1948年間，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大陸遭受重大挫折，於驚濤駭浪中撤退到台灣。不久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持續巡弋，以嚇阻任何軍事行動或敵意挑釁。此時毛澤東先忙於「抗美援朝」，隨發動「大躍進」、「反右」等接二連三的政治鬥爭，一時無暇他顧。蔣政府在台灣，因而得到了喘息的機會。1958年8月金門炮戰開始，蔣的鬥志並不因在大陸戰場的失敗而瓦解，所以他堅強的發動抵抗，終於把準備渡海的大軍擋住在台灣海峽的西岸。其後兩岸炮戰轉為「單打雙停」，終於息火停兵。蔣因而可在台灣實施他在大陸所不能推行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造等。

在震撼危疑的環境下，蔣的施政自然是以鞏固政權為前提，凡被認定有害於「領導中心」的人士，不論是台灣籍，或外省籍，都可能在整肅之列。這時期前已發生了「二二八」的街頭流血事變，但若干政治性迫害事件，仍在進行。精英人士如孫立人、雷震及許多百姓，不幸成了受害者。這些時代悲劇，到現在仍然是社會的傷痛。

蔣中正一生征戰，領導北伐，統一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爭取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他是一個民族英雄，他的價值觀很簡單，就是「國家第一、民族至上」。他個人的行為是以「矢勤矢勇、鞠躬盡瘁」為標準。因為長期爭戰，掌握威

權，許多施政措施，以此時此地觀察，爭議性甚多。他對國家人民的功過是非及後世的影響，在歷史上自然是一個重要而需檢討的課題。

不論歷史如何評判，蔣中正對台灣的三點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其一、在風雨飄搖的狀況下，有效的把毛澤東的龐大部隊，截留在海峽天塹的另一方，奠定了台灣此後五十年安定的基礎。其二、他堅持一個中國的理念及孫中山所領導締造的「中華民國」的合法性，給台灣法理上長治久安的正統性。若非如此，台灣早已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哪有今天的「一中各表」、「一中一台」、「一邊一國」及種種統獨意識的爭議。其三、他尊崇中國的歷史文化及教育的重要性。在國家財政極端窘迫的情況下，亦推動國民義務教育，並宣揚中國的倫理道德。人才成為台灣此後五十年中最重要的資源。

## 嚴家淦

1979年蔣中正逝世，繼任總統的是嚴家淦。嚴是工程師出身，來台後是從事財經實務的後起之秀，著有成績。他篤事謹言，圓融通達，極得蔣的信賴。蔣的原定接班人副總統陳誠因病逝世後，原在大陸的領導團隊逐漸閒置，嚴即脫穎而出。這時蔣經國承繼父任的趨勢雖很明顯，然而他的正式職務是副部長、部長，接受嚴的領導，並互為標榜。嚴出任總統後，蔣經國才升任為行政院長。

實際上嚴可說是繼續俞鴻鈞、俞大維後，成為「技術官員」(Technocrats)的代表。其時一群在國內外有歷練的學者專家，以他們的專業知識及貞廉操守，受知於蔣氏父子，而在政府各崗位中服務。這一群專家，從蔣夢麟（教育、農業）、葉公超（外交）起，年輕一輩如尹仲容（財經、產業）、沈宗瀚（農業）、梅貽琦（教育）、嚴演存、金開英、胡新南（石油、石化）、徐柏園、李國鼎、陶聲洋（財稅）、費暉（交通）、孫運璿（電力、交通、工業）、吳大猷（科學、教育）、徐賢修（科技、工業）、趙耀東（鋼鐵）、董世芬（石化）等，得到政府的授權，各司其職。在慘淡經營下，合力建設台灣，終使台灣在風雨飄搖中站穩陣腳。台灣此時因土地改革成功，國民教育普及，工業基礎穩當，漸為世界所稱道。

## 蔣經國

1982年蔣經國當選總統，可謂實至名歸。此時台灣的重大經建計劃如十大建設等，已逐步進行。蔣因加速發展工業技術，以科技為載具，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促使台灣工業的脫胎換骨。若干科技產品，因之在世界市場上逐漸取得樞紐地位。十年之間，各種力量匯集，使台灣由海上一孤島進身為亞洲四小龍。

在經濟起飛及社會安定的條件下，蔣因極力推行民主憲政，並培植台籍青年才俊進入政府和議會。所以在八〇年代

中，全球所看到的台灣是：國民所得躍升，國民教育普及，生活品質改善，中小企業抬頭，地方自治圓熟，全民普選成型。這種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平行的改革和升級，為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所罕見，所以被廣稱為「台灣奇蹟」。

蔣經國盱衡大局，在1987年底，毅然廢除戒嚴令，將總統在非常時期之權力，回歸憲法範疇。並開放黨禁、報禁、海禁：准許政治團體成立，放寬出版法，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民進黨，因之從地下組織變成合法政黨，受到法律的保障。這些重大的措施，對此後台灣政治民主化及兩岸關係的發展，都有時代性及前瞻性的影響。

蔣經國一生經過多次時代性轉折，從威權走入民主。特別是在蔣中正時代，他長期沉潛幕後，而力圖貢獻，在職分與權力不符的情況下，難免產生許多體制外的法理糾纏，亦產生了若干政治悲劇。他的領導風格，自有許多爭議處。但蔣經國對台灣現代化及全球化的積極貢獻，在近半個世紀中，可以說無人可及。

綜觀在1948年後五十年內台灣的成功因素，主要是：崇尚中華文化，注重教育科技，實施民主政治，追求國際合作。這些因素，塑造了有台灣標誌的價值觀。這價值觀的表率，就是蔣氏父子及嚴家淦，和各部門的領導人物。他們遵守共同的行為規範，簡單的說，就是明禮、公義、廉潔、知恥。



# 台灣領導文化軟實力的式微

李登輝

蔣經國在1988年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李原是學者出身，黨政新手，但因出生在台灣本土，受到蔣經國的優先拔擢，數年間扶搖直上。蔣遽爾去世，李近水樓台，因緣際會而登大位。此時國民黨黨內各方，對李甚有憂疑，但因利害矛盾關係，意見分歧。李溫恭下士，以繼承蔣氏遺志為名，並推出「國家統一綱領」，以緩和黨內壓力。同時操作黨內派系及運用黨外台獨分子言論，縱橫捭闔，以鞏固地位。此時台灣民望極盛的前副總統謝東閔已年邁退休，公忠廉能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因病重休養，黨內諸公，群龍無首。四五年間，李終將國民黨大老如俞國華、李煥、郝柏村、林洋港、邱創煥、蔣緯國、梁肅戎、許歷農等各系統功力一體吸收。復因宋楚瑜統領之黨工及新科民意代表之助，成功修改「中華民國憲法」，旋於1996年經由公民直接選舉為總統。自此以後，台灣政壇，為李登輝一人之天下。

李登輝以民選總統的身份，獨攬黨、政、軍大權之後，積極部署他理想中的台灣未來。此時國民黨原來勢力已經分

崩離析，對李而言，黨之利用價值已日益減少，因之他著手將國民黨逐步分解，並以多種方式，在黨外協助民進黨，使其勢力日為壯大，以之牽掣國民黨之剩餘影響。李在清除傳統派最後防線郝柏村之權力後，由連戰繼任行政院長，但國民黨在行政系統的影響，已然式微。此期間內，原親信宋楚瑜被攆出黨中央轉為台灣省長，極得民望，儼然成為威權之威脅，李因之主導「凍省」，釜底抽薪，將宋「邊緣化」。到了2000年總統大選時，李大展身手，左右選情，政權遂為陳水扁取得。此時李陳兩人之關係，可稱水乳交融。中國國民黨主政台灣六十年，終為民進黨取代，此為台灣民主政治的第一次政黨輪替。

大選之後，國民黨人對黨主席李登輝討伐之聲不絕，李對國民黨自亦味同嚼蠟，漸成寇仇，故即辭去黨主席一位。2001年親李人士黃崑輝等，組成極綠之「台灣團結聯盟」，鼓吹發展具有本土化的台灣特色，成為民進黨之外，另一台獨色彩濃厚的政黨。「台聯」奉李為精神領袖（或稱榮譽主席），使他能單獨在兩黨之外，有一個操控台灣大業的平台。國民黨忍無可忍，乃撤銷李登輝黨籍。這些種種匪夷所思的發展，令人目瞪口呆。

蔣經國當年在台籍青年才俊之中，獨鍾李登輝，主要以李為專業出身，留學美國，有世界觀，而性格沉穩、慮遠思深，有策略性思維，兼之慎言謹行，社會關係單純。現在看來，這些考慮，目視所及者，當時大都正確。實際上李具有

濃厚之本土情結及親日傾向，年輕時已見端倪，因其深藏不露，又得當時政要蔣彥士、王作榮等之奧援，故蔣經國不虞有他，實亦希望能透過台籍才俊之努力，在台灣為國民黨扎根。可惜事與願違，國民黨幾為所覆，誠始料所未及。

李登輝為推行其政治理念，在台灣政界翻雲覆雨，許多人對其行徑，頗多詬病。其實策略之合縱連橫，為政壇所常見，古今中外，不乏事例。斯時斯地，群雄並起，各顯神通，事所必然也，何厚責於李。

筆者之觀察，李之可議者有二：蔣經國原知中國國民黨必須本土化，以此重任付託於李，而李在蔣身後，以多種手段，將國民黨空洞化，使其瀕於瓦解而後已。蔣何負於李，國民黨何負於李？李之為人謀而忠乎，與朋友交而信乎？此其一。李為加速轉化國民黨，視民主化選舉如商品市場化，不惜引入豪商巨賈之金錢影響與地下黑道之拳頭勢力。身居廟堂之高，而遊走於法律與道德之邊緣，操紅蘿蔔(Carrot)與巨棍(Stick)，以恣其意。由此黑金兩道，公然出現於台灣民主化過程之中，逐漸腐蝕社會公義及法治精神。黑金對台灣民主化的滲透和摧殘，在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中，絲籬牽錯。到了陳水扁主政，自為蒂固根深。以黑金腐蝕台灣民主化，這不可不說是李登輝之一歷史責任。此其二。

## 陳水扁

陳水扁以一農民子弟，在台灣的安定環境中教育成長，以律師身分，在「美麗島」案中為民進黨人辯護，因成為民進黨發言人。其後陳改行從政，在台灣民主化程序中當選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台北市長，飽受國家及社會的栽培。2000年參加總統大選，因知勝算不高，故以省籍情結及統獨意識為訴求。許多為人詬病的選舉技倆，如抹黑、栽贓、戴帽子、製造事端等，自此可說習以為常。

陳水扁擅長街頭呼喝，但無能治理國家。執政後仍然視治國為競選的延伸，無怪乎八年中造成社會不安，公義敗壞，經濟衰退，民信喪失。

陳所支持的候選人常常忽略了政見理想而只注重人身攻擊，發表會大都是情感宣洩而言不及義。2002年高雄市長選舉的假錄音帶，耿直如吳敦義，措手不及；2004年總統選舉的兩顆子彈，溫良如連戰，飲恨出局。這兩件可恥的選舉「奧步」，都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醜劇。

陳水扁當政八年中的作為，不但拋開了中華的文化傳統，亦背離了台灣本土的價值觀。他早期因驟然執政，不知人才，故「童子軍」充斥要津，繼之用人唯緣，不顧品德；到了後期，更是用人唯奴，聽話第一。所以評論家說扁政府愈做愈小，國政愈搞愈爛。他縱容妻子吳淑珍借機斂財，藉端勒索，破壞法治，污穢政壇。許多民進黨的領導先進，如

施明德、許信良、沈富雄、陳文茜等恆與為伍，紛紛出走。2006年間施明德奮臂一呼，要阿扁下台，頓時百萬人響應。紅衫軍不分老幼省籍，成為台灣民眾爭取法治與公義的表率。然而陳牢牢的控制了行政與司法資源，老神在在，對沖天民怨視若無睹，不為所動，反加緊他的國際洗錢勾當。以「台灣之子」沉淪為「台灣之恥」，成為一個歷史性的醜劇。陳水扁經由司法機構偵查，正式起訴，書狀千頁。台北地方法院，以其貪污瀆職，罪證確鑿，判決無期徒刑。陳在上訴中。

## 馬英九

台灣人民對陳水扁、吳淑珍的腐化貪婪極端憤怒下，謝長廷、蘇貞昌仍不能與陳切割，所以在2008年3月的總統大選中，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蕭萬長得票逾765萬，以逾百分之五十八的得票率，當選總統、副總統。這是台灣從1996年以來人民直選總統得票的最高紀錄，表示最雄厚的民意向背。在半年內連續兩次的大選中，民進黨一敗塗地，只好把政權交回國民黨。這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第二次政黨輪替，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亦成為民主化在台灣推行的明確驗證。

然而馬英九主政後，民望一直下滑不振。進一步的觀察，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因素：

一、馬有成為「全民總統」的心結，所以很多措施，極力包容台灣約百分之三十的極綠分子，時常劃地自限，不敢開展。在民主政治的規則中，能得過半數的票數當選，就是全民總統。1960年的甘迺迪，2000年的布希，都以非常微小的差數當選，但都是美國的全民總統，無庸置疑。其實國民所關心的是政治領袖就任總統後的作為和成績，而不是當選日的票數。馬英九在憲法程序下當選總統，自應已是「全民總統」，他的種種行政措施，應以全民的福祉為重點，而不是為討好某黨某派。何況為了爭取少數，背離多數，豈非不智？

二、陳水扁吳淑珍的非法行為，在陳下台後受到偵查及羈押，國人稱快。但主要證人在逃，次要證人越扯越多，顯然陳以打爛仗為策略。時間越拖延，案情越糊塗，阿扁越得利。越捅越大的貪瀆案，已碰上司法行政高層次的瓶頸，然而馬為避免干預嫌疑，猶豫不前。這當然與馬為人之原則有關，不知君子可以欺其方；何況延遲司法正義，如同破壞司法正義(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取捨之間，應從大處遠處著眼。民眾之企待公義，如大旱之望雲霓；等候之耐心，並非無限。幾經擾攘，台北地方法院始判陳以無期徒刑。

三、陳當政時所發生的金改案、軍購案、將領買官案等，現在已知流弊滋生，動搖國本。即使與陳案本身關係較少，但與國家要政攸關，是行政系統所應積極調查整頓的，至今未見有大刀闊斧的行動。維護法律尊嚴，伸張社會公義，應從總統府開始，不論弊病以往如何發生，都必需今日處理。如果因循故事，勢將養癰遺患。

四、國民黨內部之間理念和步調不一。面臨美國信貸崩盤、財信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及全球性經濟萎縮，馬政府的危機處理，似乎欲振乏力。2008年5月間所引以為傲的「九萬兆」團隊，運行似甚滯阻，是知人不用、或用人不專，或有其他施政結構之缺憾嗎？目前除了兩岸關係在解凍增溫，較為可喜外，馬政府年度的成績單，還有甚麼亮點，民眾拭目以待。

觀察亞太地區的民主政體，政治人物在未登大位前時常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極盡兼視並聽之能事。一旦坐上龍椅，志高氣揚，很快的可能感染上政治人物的職業病。此病的症候，如前所言可以說有「三低兩高」。馬英九目前，似乎面臨十字站口。

馬英九的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全球華人，大都以歡欣和期望的心情看待。台灣的政局和進步，是兩岸三地未來發展的重要參考。馬英九做人有原則，有政治抱負，有中華文化的價值理念，亦有全球化的世界觀。但這些只是政治人物的必要條件，要成為一個歷史性的領導人，必須堅持以道德誠信為基礎的軟實力，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履踐篤行，創造時勢。他如能成功通過時代的考驗，將成為中華民族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典範。這是他的機會，亦是他的責任。



## 全球化對台灣的挑戰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求國之不危，不可得也。

…秦・李斯

### 國際化

從1980年代後期起，台灣工業技術快速發展，促進了經濟轉型，而進入技術經濟時代，這亦給台灣帶來重大的社會變遷。因為產品需要市場，必須以外銷為導向；而島內因產品製造所需的勞工、能源及環保因素日益嚴峻，亟須向國外發展。所以台商們紛紛在國際上尋找機會。他們到北美、南美、東歐、西歐找市場；到越南、泰國、南非、拉美等地找勞工、找原料，不一而足。

為了能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台灣的產品，必須具有符合國際標準的品質，競爭優勢的價格，並能提供迅速有效的服

務。所以國際化提供了台灣工業升級的動力及規範。以前依賴進口保護以內銷為主的產品，慢慢地成為夕陽工業。

台灣的國際化商貿關係，因之逐漸建立。這些技術及商貿活動，大都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充滿了民主化的活力。一時車水馬龍，冠蓋雲集。台灣一蕞爾小島，儼然成為國際地圖上的一個亮點，無形中促成了台灣的國際地位及全球化的基礎。

到了九〇年代初，蔣經國總統於1987年底所訂定的解除戒嚴及開放大陸觀光政策，已開始看到效果。台商驟然發現大陸對台灣不過一水之隔，經營線較短，而同文同種，習慣相似，語言通順，鄉情交融，實在可變成他們前途中的「新大陸」。以前要努力東征、南進、北伐的，大都轉移方向：往西前進！所以中國大陸迅速成為台灣企業國際化的第一優先。

## 民主化

企業的意向，隨著經濟的成長，在台灣政治生態中，扮演日為重要的角色。企業領袖如王永慶、高清原、張榮發、許文龍等，都有濃厚的台灣本土色彩。他們的政治傾向，有藍有綠，自統到獨，但都對到大陸發展，抱着積極的態度。他們認為大陸是台灣產業全球化最簡易的捷徑。這種經濟上的考慮，原與政治無關。

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歷屆行政院長如俞國華、李煥、郝伯村、連戰，經濟部長如趙耀東、陳履安、蕭萬長、江丙坤等，對與大陸產業的交流合作，都持鼓勵的態度，亦採取多種措施，輔導台灣企業到大陸去開闢新的天地。國民黨政府知道相對於大陸經濟發展為基準來看，台灣的優勢在於技術創新、市場經濟、國際網絡、企業管理等。所以在鼓勵西進之外，亦主張把台灣建立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區域營運中心 (Regional Operation Centre)。希望以開放、包容、積極的措施，吸引更多有意到大陸發展的國際企業，先到台灣設立區域性總部。有人戲着說這是ROC (Republic of China)的時代意義。

李登輝為了迎合省籍大亨的需要及黨內大老的理念，爭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故首先以「國家統一綱領」為指導原則，以分段進展為策略，鼓勵兩岸的交流。到了1992年李當選總統之後，大事底定，擔心與大陸迅速合作，將不利於台灣獨立，乃主張「戒急用忍」，採取剎車。

等到民進黨執政時候，陳水扁及急獨派大權在握，對台商在大陸的產業發展和經濟交流，以有效管理為名，行管制緊縮之實。為了掩飾政府的無能，把產業和許多社會問題泛政治化，以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可笑一個執政的政府，仍然抱持造反奪權的心態，以省籍、本土化、台灣獨立為課題，不斷的分化社會。政府陸續操作台灣話、原住民、憲改、公投、入聯、「去中」、「排蔣」等泛政治化題目，成為社

會焦慮不安的根源。從前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生第一等原則，都被拋到邊緣去。這可說是台灣民主化的敗筆。

民進黨執政後，國際企業多望台卻步；已經在台灣的，許多亦有出走的準備。阿扁政府擅於在外交上製造假動作，炒作小新聞，台灣的國際關係，因之日益窘迫。堂堂總統的出訪專機，屢屢迴旋於空中，不得其門而入。一次次的官式訪問，開始是藏頭縮尾，最後以迷航收場，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話。許多民進黨人士，為阿扁的倒行逆施，使台灣在國際化、全球化中倒退，同為搖頭太息。但這些醜態，都給阿扁團隊在島內表達政治悲情的機會。「鎖國」和自我邊緣化，變成陳水扁政府的特色。

## 技術化

台灣的技術基礎，原極薄弱；受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五十年後，教育基礎亦甚為有限。1948、49年光復之初，台灣本島具學士學位者，僅五百人左右。國民黨政府奉行「中華民國憲法」，致力國民教育，並逐步向高等教育推進。二十年後，各大學對本科教育，已有優良成就，年齡18至21之青年在大專肄業者，高達70%以上。在工業技術方面，為彌補本土之缺乏，工業技術研究院亦積極推行國際化，向美國、日本、西歐等先進國家，引進技術及高級經理人才。積體電路、精密機械、微電子、新材料、新能源、自動化、光機電等，均

陸續由工研院引進開發並向產業界移轉。現時台灣出產之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總產量，為世界總產量之60%；筆記本電腦，約為全球的86%。

1994年初，中國科學院周光召院長承工研院之邀，帶領學部委員十二人，訪問台灣，舉行研討會，並與業界溝通，此為兩岸技術產業交流之先河。在此以後，兩岸之技術企業，交流管道暢通，相互謀求互惠互利的合作。

大陸的科技產業，在1990年初起，已能穩健發展。1993年高新科技工業產品的輸出，約是全國工業品總輸出的百分之五。到了2003年，這個比例已迅速增長到百分之二十五，台商自有一定程度的貢獻。此外，台灣向大陸的年出口量，2004年已超過500億美元。可斷言的是，大陸已成為台灣製造業生存發展的重大因素。因為大陸自然環境與經濟條件的提供，增強了台灣的工業製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

兩岸科技產業，透過市場機制的運作，許多已能充分整合。台灣的電腦關鍵性零組件業，紛紛轉到大陸生產，已成為中國大陸高新產業的一部分。據2003年的資料，台灣製造的桌面式電腦及筆記本電腦，在中國製造的比例，兩者均達百分之七十。雙方互惠互利的發展，亦促成了「全球化中華企業」營業模式的建立。

然而中國大陸經濟在快速增長後，產業環境已在蛻變之中，對台灣產業及科技的需求，已逐漸產生質的變化。在全球性金融海嘯及產業衰退的影響下，許多十年前的環境因

素，已經不復存在。所以台灣要在全球化競賽中勝出，必須調整兩岸交流合作的關係，更新兩岸合作的定位和發展的策略，尋求共同的利基，並以此為基礎，重新塑造在全球化技術企業上的獨特競爭力。



# 總統大選與選舉文化

經過二十年的演化，台灣的選舉文化有什麼改變？台灣的民主程序究竟有沒有進步？我們固然關心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誰勝誰負，亦很關心台灣的選舉文化。

民主與法治可說是一體兩面，一個法治社會不只要注意結果，亦要注意達成結果的程序(Due Process)。選舉結果是個人勝負，是有限的，是定時的；但選舉程序是制度文化，是全面的，是長遠的。台灣在中國人全球化發展中的影響，不只是因為他在艱難環境下能以教育和科技去開拓經濟，亦因為他能在維護中華文化的過程中推行民主。所以台灣三十年的演變，對世界各地都有啟發性。

## 破壞公義四端不存

陳水扁執政八年來所形成的選舉文化，不幸的充滿了統獨意識、省籍情結、族群對立、利益勾結。許多為人詬病的選舉技倆，如抹黑、栽贓、戴帽子、製造事端等，十年來習以為常。候選人常常忽略了政見理想而只注重人身攻擊，發表演會大都是情感宣洩而言不及義。六年前高雄市長選舉的假

錄音帶，四年前總統選舉的兩顆子彈，更是變本加厲，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性醜劇。

正如美國選民在2008年總統大選所傳遞的訊息：美國需要改變了，不改變、他會失去全球化世界中的領袖地位。台灣需要改變了，不改變，就會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淘汰出局！

台灣數年來面臨極為嚴峻的困境，可說是陳水扁政府一手所造成的。2008年1月12日台灣的立委選舉，選民對此已表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民眾對陳水扁說，我們對你的妄作胡為，已經不能再忍受了。所以選民用陳水扁所鼓吹的「小國會小選區」為工具，重重的打了他一個耳光。選民所最不能忍受的，是陳水扁把台灣五十年來辛苦塑造的社會公義的理念和價值觀破壞殆盡。

從歷史上回顧，蔣中正在台灣塑造的文化，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這是源自於孟子所主張的「仁義禮智」，人之四端。孟子說：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義、禮、智，是二千年來中華民族立身處世的標竿。筆者多年的親身觀察指出：台灣人賦性豪放、真情、刻苦、敬天、富同情心、有正義感。台灣人是富有中華傳統文

化的一個族群。陳水扁在當政八年中的作為，不但拋開了中華文化的傳統，亦背離了台灣本土的價值觀，可以說是無智、悖禮、不義、寡仁。他已把政府愈做愈小，亦把國政愈搞愈爛。

## 執政八年內外交困

先以經濟及外交為例。資深經濟學者葉萬安指出（台灣《聯合報》2008年1月14日），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三人當政，各約略八到十年。在他們任內，台灣GDP增長平均率，分別為蔣百分之八點七，李百分之六點八，陳百分之四點一。以任期最後一年的紀錄來看，台灣的經濟實力，在蔣時期是亞洲四小龍第一；李時期是第二；陳時期是榜尾。以國民失業率來看，分別在蔣時為百分之二，李百分之二點九，陳百分之三點九。無怪乎台灣的民生蕭條，民心焦慮。

報載2008年2月17日發表的「世界經濟論壇」的民意調查表示，人民認為政治領袖不誠實的，在台灣佔百分之八十，是亞洲的首位；台灣民眾對下一代經濟發展悲觀的，佔百分之五十六，對生命安全悲觀的，佔百分之六十。幾年來台灣的政策穩定度及國際競爭力，如雪上加霜。所以台商出走，外商卻步。國際在台的商貿組織，紛紛發出警訊。在外交方面，陳執政八年中，斷交了九國。堂堂一國元首出訪，所訪問或經過的國家，大都要以「加護病房」方式隔離處理，避

之唯恐不及。阿扁更時常為內部政治目的刺激友邦，製造危機；巧言令色，言辯而偽。許多國家對阿扁的不滿，自是公開的秘密。

在一般施政方面，「名」與「器」為國家重寶，但從阿扁看來，盡是酬庸或競選的工具。八年之內，換了五任行政院長，五任經濟部長，封了多少資政顧問。其他各部、會、國企、金融的領導人，更換如走馬燈，真是「罄竹難書」。以最能表彰文化素養的教育部、新聞局，更是以偏激狹隘的人士為頭領，舉止粗糙鄙劣，無怪乎「上吐下瀉」，引為社會笑柄。在個人操守方面，他縱容及庇護妻子女婿貪贓枉法，從公司控股到奇珍重寶到孺子尿布，大小通吃。所以民進黨元勳施明德等，實在看不下去了，號召百萬紅軍，或靜坐、或圍城，要阿扁下台。

在立委選舉前幾個月，他的「上杜下謝連莊」三個活寶，向已逝世多年的兩位蔣總統逼宮，更是違背了台灣民眾感恩敬天，飲水思源的價值觀。許多民眾撫心自問，若非蔣中正的積極反共（毛）抗俄，台灣早為戰火噬沒，今天再無統獨問題。要不是他的農業改革、提倡教育，哪有今天的經濟基礎、國民知識。若非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促進工業技術，廢除戒嚴法，開放報禁黨禁，哪有今天的工業力量及民主選舉，以至於台人治台！

## 選民厭煩無聊謊言

但是當上杜下謝所扮演的醜劇一幕在展開時，沒有聽到陳水扁有絲毫勸解或警戒的話。台灣有良知的民眾，不管藍綠，不禁要問，國家元首的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惻隱之心，到哪裡去了？

立法委員選舉最顯著的結果，是國民黨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囊括了第七屆（新）立法院的八十一席，民進黨只得二十七席。選民所表示的另外一個強大的信號是「公投」。陳水扁處心積慮，要利用公投來混淆立委選舉，國民黨不甘示弱，亦提出「反貪腐」的議題，宣示對政府領導及其親信貪婪腐化的追究。這次參加公投的，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民進黨人。贊成這個「反貪腐」條款的，超過262萬人。他們對陳水扁的憤怒，是再清楚不過的。這可說是對施明德及紅衫軍遲來的正義！

當前台灣的民眾，對於未來的台灣前途，有極大的憂慮。他們都關心：

- 如何以創新具體的手段，振興台灣經濟；
- 如何以寬容博愛的胸懷，化解族群糾紛；
- 如何以道德法治的實踐，重建社會公義；
- 如何以尊嚴自信的態度，尋求兩岸和諧；
- 如何以務實低調的途徑，開拓國際空間。

這些都是民眾所希望於未來的執政黨及總統迅速解決的課題。台灣的選民，許多經過二十年民主程序的薰陶，已經愈來愈成熟。他們多能明辨是非，厭煩過去政客們的無聊與謊言，他們要問候選人：「牛肉在哪裡？」

## 參考美國「君子之爭」

馬英九、蕭萬長和謝長廷、蘇貞昌兩組候選人，必須針對民眾關切的課題，提出他們的願景、政策和方案。馬蕭兩位如果只能向選民鞠躬道好，不能積極的把理念向選民溝通，爭取他們的認同，充其量是個好好先生，不等於是大有為的領袖。謝蘇兩位如果沒有道德勇氣向阿扁說不，照樣的和稀泥，忽視法治及道德的規範，那是再度對選民的侮辱。台灣政治的鐘擺效應的推動力量是民心向背。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兩黨的初選，候選人的一般表現，很值得參考。他們辯論政見而相互尊重，言詞尖銳而不粗戾，放眼未來而不囿於既往，可說「其爭亦君子」。克林頓前期為希拉莉助選，用詞過當，馬上知所警止。筆者認為這次美國兩黨的初選，是全球民主化過程的一個良好範例。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下，競選人要贏得清清白白，或輸得坦坦蕩蕩，不論或勝或負，都有政治前途。這次大選，應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轉機。最後，謹以五言絕句，留贈各候選人：

勝負一時快，音容萬里行；  
是非世人口，榮辱子孫心。



# 台灣民主化的勝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唐·杜甫

「狂勝二二一萬票」！台北《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用同樣的句子，做它們選舉揭曉日首頁的大標題。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蕭萬長在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選舉中，得票逾765萬，得票率逾百分之五十八，這是台灣從1996年以來人民普選總統得票的最高紀錄，亦表示最雄厚的民意基礎。面對這種龐大的壓力，民進黨的謝長廷、蘇貞昌，面色慘綠，在計票完畢一個小時內，迅速的鞠躬認敗。在2008年1月以來連續兩次的大選中，民進黨可稱是一敗塗地，只好把政權交回國民黨手中。這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第二次政黨輪替，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亦成為民主化在台灣推行的明確驗證。用「喜欲狂」的狂字來形容全球衷心關注台灣前途的人士的心情，無疑是很適切的寫照。

民主化政治的選舉，主要應是軟實力的競賽。這次台灣的總統選舉，關係台灣2,300萬人民的身家前途，對全球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系，相信亦具有重大的意義。簡單來說，它對政府、政黨、政治人物傳達了確切的啟示。第一：「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第二：政府要依法律辦事，施政要有實際效果。第三：國家領導人必須有博愛、是非、羞惡、謙讓的品德和情操。第四：選票表達、人人平等，政黨輪替、和平競爭，仍然是民主政治最中道可行的運行方式。這些聽來不過是老生常談，其實是歷久彌新的基本規律。我們可以從這次台灣選舉的三個層面，來分析這些顛撲不破的教訓。

謝長廷失敗的結局，其實在1月12日立委選舉民進黨慘敗時，已經定調明顯。台灣自2000年起陳水扁八年執政，對大多數的人民是一場噩夢。台灣原來的經濟好景，從雲端掉下谷底。阿扁自認他是「台灣之子」，是本土的表徵，苗正根紅，國家法律的施行，隨他的喜愛做主。他凡事以政治掛帥，台獨第一。在社會上撕裂族群，製造對立；在外交上實行鎖國，製造悲情。此外並縱容家屬家臣以公營私，枉法腐化。幾年之間，經濟蕭條，社會不安，官商勾結，公義蕩然。

相形之下，中國大陸、韓國、新加坡、香港、澳洲、紐西蘭等，十年來無不蒸蒸日上。以國民經濟增長率來說，今天台灣已是上述各國的榜末。無怪乎許多觀察家說二十年前大陸在搞政治，台灣在拚經濟；想不到十年風水輪流轉，現

時大陸在拚經濟，台灣倒在搞政治。有一句順口溜說：「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錢少；不到台北，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頗為傳神。所以台灣的老百姓，精神非常焦慮，亟思改變圖存，覺得真的再這樣下去，大家終要去跳太平洋了！1月12日的立法委員改選，台灣的民眾終於向陳水扁說，我們實在受不了你了，你饒了我們吧。

在這個關鍵時刻，阿扁戀棧不走，謝長廷自應挺身而出，展現他的領導力。畢竟他是總統候選人，又是黨主席。他要在絕地求存，逆勢轉勝，必須要勇敢的站起來，向阿扁說不，以爭取失望了的黨員的回歸以及中間民眾的認同。

可是他犯了在戰略戰術上不可救藥的錯誤。他不敢表示這種道德勇氣去面對深綠派的糾纏，並和阿扁切割。不止這樣，他坐視阿扁老神在在，一樣的操縱行政院和中選會；選民所唾棄的「上吐下瀉連莊」三個活寶，仍然原封不動高居其位，並又張牙舞爪中。看來阿扁自有盤算，他要乘下台前三四個月，好好的布置，除保住極綠派的影響外，再搞些像鏟震軍火公司這類的金礦，以為未來安全榮華的保障。

台灣民眾對於陳水扁的貪婪無恥和謝長廷的屈辱無能實在太失望了。跟隨而來的，是領導人如不能以身作則，自然失去領導力。組織系統中各層次如脫韁之馬，所拿手的傳統式的選舉技倆，如抹黑、栽贓、戴帽等等，陸續出籠。最令人覺得無聊的是捨選民關心的經濟民生問題不顧，反而咬住「綠卡」不放，並向對手的家屬展開一波一波的侮辱，自然引起社會公憤。

跟隨這些事件的演化，候選人的道德理念和價值觀，在選民面前表現得一清二楚。謝長廷以律師自豪，他的法律尊重哪裡去了？他自稱篤信宗教，他的人性關懷哪裡去了？所以在最後的關鍵兩月中，謝長廷錯過了把失望的民眾黨人和社會中間選民抓回來。他所希望的鐘擺效應出現了，只是把他自己再擺出局。

在總統大選過程中，馬英九的木訥溫和與謝長廷的明快機巧，是一個尖銳的對比。其實小馬哥風度翩翩，但不見得是一個出色的競選人。他頗善說理，但不擅激情。雖然他也時常聲嘶力竭，大部分的支持者常為他的斯文和保守而擔心，甚至有點「恨鐵不成鋼」。然而很多都為他的真誠執着，看大處看遠處的胸懷所感動。

馬英九的選戰，經歷了許多波折。初期他憑著個人的清新形象，建立知名度和親和力，他對選舉策略及施政大計，着墨不多。及到馬王之爭結束，黨主席移交，老蕭選定，特支費案二審清結後，情勢逆轉，才進入備戰階段。他的競選團隊，要到立委選戰大勝之後，總統選舉才算是正式開鑼。

歸根到底，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政治體制，但仍是現時人類文明中最可靠的制度。這次的台灣的總統選舉，給我們再一度信心，這是民主化的勝利！



## 民眾是民主選舉的贏家

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馬英九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原因很多。無疑的是國民黨的組織戰，起步雖然較慢，但能逐步的發揮力量，到選戰的最後兩個月，已能見招拆招。最可稱道的是勇敢地把馬英九推到濁水溪以南，直接與民眾接觸，讓民眾感受候選人的真誠和政見，提供他們一個慎思明辨的機會，希望在深綠大本營中，爭取「小輸為贏」。其次是對民進黨可能採取的「奧步」或「險招」，研擬應對的策略；「綠卡」事件的殺傷力，因此得到適度的防堵，選舉前兩日以鮑道格拆解夏馨的危機處理，真是可圈可點。再一次是對西藏動亂事件的快速回應。

西藏事件在選前一星期爆發，青海、甘肅同時亦有動亂發生，表示這可能是一項預謀事件。它與台灣大選時間巧合，蛛絲馬跡，亦令人不無猜疑之處。拉薩街頭的鎮壓，透過現代通訊技術的傳播，迅速在國際上引起波瀾，不但激發世界人權組織的關懷，加強對北京奧運的壓力，亦可能點燃獨立的火苗，在台灣熊熊燃燒。這個事件，可以說是選舉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未知數。

然而，馬英九立即對北京官方言行表示不滿，並採用了一些激烈的詞句，這是馬營中所不常見的。若非如此重重一記，西藏可能變成選舉中「仇中」的大旗，改變了選舉的主軸。

果不其然，謝營已放出停選抗議的挑戰。藍營的強烈反應，對綠營發生了釜底抽薪的效果。無怪乎謝長廷氣急敗壞，以攻擊馬的「草率善變」收場。這件事的處理，從馬來說，義正詞嚴，不留情面；而北京以理性容忍的態度，不予以回應，應是無招即有招。

馬英九做人有一定原則，不為人身攻擊，不作抹黑、栽贓、跡似不法等競選行為。他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中，一直是站在被動的地位。「立委踢館」事件發生後，因其冒進魯莽，不無可議，馬即時採取嚴正的道歉。謝營為所屬用下流語言對馬親屬侮辱道歉，馬亦立即接受，希望把競選的主軸，放在經濟民生有關的大題目上。這和他多年來鼓吹和諧，消弭仇恨的立場，前後一貫。

選民是民主政治的主體，是候選人的買家。買家如果沒有適當的訓練，如何能識貨、如何能比貨？所以民主化選舉，實際上有一段磨練學習的過程。

台灣的選民是這次選舉中最大的贏家。經過了二十多年民主化的洗禮，他們比較能領略民主化過程的三昧。儘管在助選活動中，他們沸騰激動，但是在日常工作裡行為如常。不論醫院、商店、工廠、辦公室、各種工作場所，都能正常

營業；同事間即有辯論，大都各抒己見，互相尊重。社會中反應平靜，並無暴力事件發生。和2000年的大選相比較，這次選舉，可稱是在文明平和的氣氛下舉行。

一個明顯的例子可見於街頭的計程車。十年來每到選舉季節，出租車輛大都是戰旗飄飄，司機常把收音機開得響響的，時常和乘客辯論，甚至發生暴力。一般民眾，常以乘計程車為畏途。這一次在台灣街頭，已經很少看到飛馳叫囂的汽車和司機了，可以說是一大進步。

民眾用冷靜和務實的態度，從候選人以往的紀錄及發表的主張中，分辨他們說得天花亂墜的，究竟有多少是口水謊言，多少是煙幕胡言，多少是幻想空言，多少是政見真言！

民眾對助選要角，這次亦有比較成熟的判斷。選戰的最後兩天，李登輝、李遠哲紛紛表態挺謝，希望用他們的光環，產生從前對陳水扁坐上大位臨門一腳的作用。但是這次選民多以冷眼看待，冷心自問：這兩張老臉孔，過去二十年享盡了民眾的崇拜和供奉，對今天的政治生態的沉淪，自有不可推諉的道德責任。別的不說，對於扶上寶座後的阿扁的腐化枉法，他們亦沒有公開站出來規勸和譴責，以表示些微的良知和道德勇氣。君不見，施明德一介平民，以抱病之軀，揮臂怒吼；二李卻高坐廟堂噤聲危坐，這是何等的對比！

平心而論，李登輝對台灣自有一定的貢獻，但他縱有萬般優點，在喝飽國民黨奶水後，反害奶媽上吐下瀉，最後瞞

天過海，拱手將政權交給民進黨。這種行為模式，對下一代是什麼樣的示範？至於李遠哲，一個電台評論人指出，他已經推銷了兩次「黑心」產品，民眾還要犯賤聽他第三次嗎？可見公道自在人心。近月來最為社會詬病的「上杜下謝連莊」，在扁政府中安如磐石，知道台灣政局的人，都知道誰為他們撐腰！若干高級知識分子，平素以清流自詡，這次圖窮匕現，倒是可見廬山真面目。其實拋開藍營不論，許多綠營分子覺得兩李扭捏作態，不異待價而沽，直到最後關頭，再來虛幌一招，亦甚不滿。總之兩李的邊際效應，為正為負，雖未可知；但日益式微，殊無疑義。

最是諷刺的是「一黨獨大不利國家」的說法。李登輝當政十多年中，任命了五院院長，掌握了立監委員、國大代表之外，所有軍事、情治、內政、教育、財政、經濟、國防、外交，一手包辦，這不是一黨獨大，而是一人獨霸。最後的結果，是社會的分崩離析，造成民進黨八年執政和台灣人民的噩夢。今天的「新黨」，就是十年前看不慣一人獨霸與台獨居心的一群國民黨清流出走而成立的。所以這個謝營所拋出的政治課題，此時產生不了綠營所希望的效果，不能不歸功於選民的成熟。但為社會國家的長治久安計，並不是未來馬英九所能忽略的課題。

在民主政治中，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民希望他們所選出的人，能締造大能力、大有為的政府。實際上在民主政治制度的運作下，除了選舉之外，仍然要以國家法律為約

束，社義公義為規範，領袖品德為榜樣，民心向背自然是最後的取捨。全國上下互相信託，這種軟實力的發揮，才能促進真正民主化，亦是全球化時代國家競爭力的重大支柱。



# 認識台灣的價值觀與軟實力

2008年3月22日台灣的總統大選中，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蕭萬長以765萬的選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這一次馬英九帶領國民黨捲土重來，是在野八年後的浴火重生。選舉的結果，備受世界密切的注意；選舉的過程，亦得到廣泛的讚揚。

一般的看法，國民黨重新執掌政權，將可發揚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重拾二十世紀末期的光輝，並將有助於兩岸的和平和世界的發展。

民進黨徹底失敗，可以說是陳水扁一手所造成的。他的貪婪腐化，營私枉法，徹底違背了台灣五十年來建立的價值觀。如何去了解台灣的價值觀呢？我們可以從在五十年中所經歷的艱苦中去了解。

## 台灣的崛起

台灣的崛起，是二十世紀後期世界上的一個奇蹟。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慘敗後，六十年前在驚濤駭浪中到了台灣。經過五十年的慘淡經營，由海上一孤島變成亞洲四小龍，若干科技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更佔樞紐地位。實際

上台灣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國民所得躍升，國民教育普及，生活品質改善，中小企業抬頭，地方自治圓熟，全民普選成型。這種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多方面的改革和升級，在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甚為罕見，所以廣稱為「台灣奇蹟」。

台灣的成功，實際上不只因發展科技產業而已。它的發展過程，主要是受到一種有特色的價值觀所支撐，就是：崇尚中華文化，注重教育科技，實施民主政治，追求國際合作；它們塑造了有台灣標誌的價值觀。

## 崇尚中華傳統文化

孫中山、蔣中正都以孔孟學說、儒家思想為最高原則。三民主義的目的，是建立中華民國成為一個和諧公義的大同社會，這就是孔子所揭載的理想。在這過程中，孫蔣二人亦師法於歐美，哲弗遜、林肯、洛克、盧梭等人的人權、法治、政府思想，紛紛融入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主張之中。

但是孫、蔣始終以孔孟思想為本根，他們尊敬歐美先賢但不以之為偶像膜拜。這和毛澤東的神化馬克斯、列寧，有着基礎性的顯著差異。此外，他們兩人雖然信奉耶穌基督，但絕不把個人的宗教信仰加諸他人。所以在中國社會裡，宗教自由，人人平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各宗各派，自行其是。

所以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治，是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基石，以「民有、民治、民享」為棟樑，以「世界大同」和「和諧社會」為屋頂。這可說是一個尊重人性，尊重族群，天人和諧的國家藍圖。民進黨執政以來煽動族群對立，製造統獨糾紛，與這精神當然是背道而馳。

## 教育科技發展經濟

尊重知識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中華文化所注重的「士」，是道德、器識、文采具備的人，具有是非、羞惡、謙讓、惻隱之心，這亦是教育的目的。在原來「中華民國憲法」裡，規定了國家發展教育和科技文化的投入，在中央應不低於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五，在省不低於百分之二十，在縣市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其後李登輝倡導修改憲法，在新版憲法中亦說明了「國家應發展科學技術，以為經濟發展的基礎」。發展教育是國民黨在台灣五十年執政的重要措施。

台灣在1945年從日本光復時，居民中有學士學位的不過五百，今天台灣國民教育普及，高校職專林立，教育機會充沛，有學士學位以上的，不下於五百萬。國民黨以人為本、科技為重的政策，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和信心。

1980年以後，台灣的農業、工業、十大建設都已深具成績。蔣經國推行國家重點科技方案，發展工業技術，推動技術移轉，為台灣的技術經濟，開拓一片新天地。今天台灣

許多科技產品，西進大陸，行銷全球。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所生產的積體電路元件及模組，約佔全球總量的一半，成為世界性的「產業稻米」。無怪乎園區每因地震或火災停工，引起美國股票市場的波動。

民進黨政府以政治考慮，摧殘教育，所謂十年教改，新法教學，去中國化等等，都給青年後代帶來無窮災害。最可笑的是扁政府的教育文化界大員，反成為民進黨選戰中的打手，可稱無恥之尤！阿扁破壞中華文化和教育，招惹民怨，謝長廷沒有勇氣和阿扁清楚切割，是咎由自取。

## 實施民主化政府

蔣經國知道威權政治為國家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他以現代化知識及網絡，分析世界潮流，審度國內因素，知道政權的世代交替，勢所必行，捨除民主化，沒有其他途徑，何況這是中華民國立國精神之所在。所以他拔擢省籍青年，使其參政。不數年間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張豐緒、連戰等逐漸出頭。在1986年後，他更廢除戒嚴法，開放報禁及黨禁。一時在台灣正式登記成立的政治黨派，數逾三十，這是民進黨以台獨為宗旨而能在台灣正式運作的原因。各縣市長、議會、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亦輪番由當地民眾直接選舉。

國民黨機器在蔣經國逝世後，落入李登輝之手。李以高度政治權謀，用選舉及黑金為工具，縱橫操作，國民黨分崩離析，終於大限難逃。公元2000年時把政權拱手讓與民進黨，成為民主化過程中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犧牲品。2008年民進黨垮台，把政權交給國民黨，這就是台灣的第二次政黨輪替了。

經過二十年民主選舉的洗禮，台灣的民眾，對民主政治的運作，已經更為成熟。他們已有信心從政客的胡言、空言、謊言的包圍中，挑選說真言、幹實事的候選人。從國際民主國家政權更替的歷史來判斷，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雖然非常崎嶇，但從今以後，應該可說走上坦途，這是兩岸三地中特殊的案例。

## 追求國際化合作

國際化是台灣五十年來生存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台灣是海中小島，既少自然資源，亦寡內需市場，所以需要透過國際合作，以獲取所需的人才、技術、資金、市場和管理。它製造的任何產品，必須經過國際市場上各種品質、安全、功能、價格的考驗。國民黨在執政後期，積極走全球化的方向，希望把台灣塑造成國際產業在亞洲區域的中心。

單就人才來說，台灣固然重視教育，但是有經驗的科技專家、管理人才和創業家，大都來自國外深造後回國的留學

生，這些人才回國後，把他們的國際化網絡亦擴展到國內。所以採行正確的留學政策，促進國際交流和合作，是全球化時代不可或缺的一環。民進黨在陳水扁及台獨教義派的影響下，強調本土化，限制人才與商貿交流，多種措施，無異「鎖國」，最後終使台灣邊緣化，無怪乎經濟不振，民生蕭條，這是阿扁政府自作自受。

總括來說，五十年「台灣奇蹟」的支撑，是台灣的價值觀：尊重中華文化，發揚教育科技，實施民主政治，追求國際合作。這是台灣在全球化競賽中所仰賴的國家軟實力根源。了解理念，尊重彼此，將是此後大陸、港澳、台灣交流合作，為全球中國人塑造新未來的一個重要基礎。



## 馬英九的全民總統情結

馬英九在2008年3月22日的台灣大選中，以220萬票的重大差距，擊敗了民進黨候選人，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得票率達百分之五十八。台灣的兩大日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以「狂勝」為大標題來形容馬的勝利。台灣民眾忍受了陳水扁八年苛政煎熬，大都以「喜欲狂」的心情慶祝馬的當選，並期待「馬上就變好」。全台上下，大都陶醉在亢奮激昂的狀態中。

不幸的是，馬總統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在當選後的第二天，根據《中國時報》的調查，民眾對他的滿意度是百分之七十九；就任滿月時，滿意度已下降為百分之五十；就任滿兩月，滿意度下降為百分之三十五；就任後百日，滿意度略為回升。可以注意的是民眾對他的不滿意度從當選後第二天的百分之七一路爬升，在就任滿兩月時已超越滿意度，現在兩者成為拉踞狀態。究竟為何在短短的百日之中，台灣民眾對馬英九從高度的期望變成不可置疑的失望？他的民望，有沒有持續下滑的危機？

許多名嘴和政論家對馬英九就任總統後的表現，作了許多評述和演繹。一般的觀察是，他在就職後百日，已經把

他的基本選民族群都得罪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如何發生的呢？以我的觀察，馬英九的一個情結，是急於當「全民總統」。馬有一個典型中國讀書人的心態，充滿着「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既然已登大位，自然希望四海歸心，全民擁戴。所以曲意的優容深綠派和極獨分子，贏取一個「全民總統」的表象。想不到他的異於尋常的行為，反而導致民眾失望。

馬政府第一個月的新聞大都與高層人事的任用有關。據報高級閣員裡有幾位具有外國居留權，以致引起民進黨大肆攻擊。其實人才長久在外國而具有外國居留權，不是忠誠問題，而是常識問題；這是任何在外國有正常專業人士的必然結果。但馬政府事先沒做好調查分析，事後缺乏危機處理，所以給社會的印象是新政府像個鬆散的會社，做事缺少章法。這事件不幸發生在內閣成立的開始，反應略為零亂，但與馬英九本人較少關連。

然而接着一連串高級官員的提名：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監察院副院長沈富雄，考試院院長張俊彥等案，應是馬英九的充分主導，全都引起了社會的震動。在民主政治政黨輪替的運行中，跨黨借將，如非國家有戰亂或重大變故，不免混淆政治責任，這是很不尋常的。這樣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展開，民眾不禁會問，在國民黨內真是沒有人才嗎，還是一種政治性運作？這跟當年陳水扁找國民黨的唐飛去當行政院長的政治權謀，有何區別？

選用賴幸媛的確具有正面的意義，但過去三年國民黨在連戰、宋楚瑜、吳伯雄、江丙坤等的辛勤營造下，兩岸關係已露曙光。在勢頭正好的時刻，對團隊做出這麼重大的改變，無疑給大家潑個冷水。為爭取獨派的支持，犧牲了黨內的士氣，低估了人民的智慧，影響了雙邊的默契。民眾看馬英九在這個案子裡的表現，充其量是毀譽參半。

提名沈富雄是很有創意的。沈氏本是民進黨老將，年前不恥阿扁所為而脫黨，此時已是無黨籍的社會賢達。在大眾心目中，沈氏素有獨特的人格及清譽，正符合監察院長所需要的風骨及勇氣，甚多人為此提名案鼓掌。然而這種重大案子，馬英九事先沒有爭取國會內國民黨黨團的共識，以為御筆一批，自然各方景從，未免高估了總統位子的能耐。不知道內部的溝通請益，是對國民黨領導骨幹的尊重，而虛心尊重是不可缺少的領袖風範。最後功敗垂成，三方都不討好，這件事看來，是馬英九的失策，起碼是考慮欠周，溝通不力。

最奇特的是考試院長一案，被提名人是科學家出身，大學校長的資歷自然是無可說的。然而他是阿扁長期的貼心顧問，聖眷崇隆，在大學校長任內事端不少，學術專業與考試院亦不相干。無怪乎消息出籠後，輿論譁然。考試院的職司，是為國家選拔人才，建立文官體制，這是中華歷史文化、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特色。院長一職，何等重要。然而馬以之為酬庸工具，先屬意於獨派的台聯主席，後優容於深綠的光電教授，似乎政治考慮超越了基本原則，無怪乎民眾

大為失望。其實國民黨在學術界、教育界或傳統「考試」、「人事行政」系統中具有器識、品德、才具、資格的，大有人在，馬英九置之不顧，實是一大失策。

針對馬英九「全民總統」情結，我們且用政治人物常患的「職業性症候群」來檢視，所謂「三低兩高」，即是：低估人民的知識，低估社會的變化，低估時間的緊迫，高估本身的智慧，高估權勢的萬能。他是否已感染些許症狀，恐怕不無商榷之處吧。

其實台灣2008年3月的大選，選民已賦給馬英九清晰的任務(Mandate)。馬是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經過合法的程序，以大多數的票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還有任何問題嗎？他是公開競選、合法選出的總統。我們可看美國的例子，1960年美國的甘迺迪、2000年的布殊，都以極微少的票數取勝，當選了美國總統，但是他們從未擔心不是「全民總統」。

馬英九如果不能拋棄表面的「全民」情結，前途恐怕荊棘猶多。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尊重少數，服從多數。領導人物應知「民無信不立」，為所當為，團結多數，激勵民心。不此之圖，其何能久？殷鑒不遠，馬總統可不慎乎！

在此書付梓之時，馬英九執政已近兩年。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低至 20%，大部份時間都在30%左右徘徊。這時段內國際國內有許多重大的突發事變發生，馬政府的應變措施，一般來說，不如民眾的期待。實際上金融海嘯引起了全球性的經濟恐慌，台灣一隅之地，何能抗拒？但2009年的八八莫

拉克颱風狂襲台東，轉為台南土石流埋村慘劇，政府未能作緊急應變處理，亦自有責任。此事變一直到馬總統親自下鄉督戰，各部會的措施，才較一致。由此可見，老子所謂「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的至意。

常人都知老子主張「無為而治」。其實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不是沒有作為，而是不作違背自然常理的事。天有和風潤雨，亦有迅雷疾電，不一而足。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老百姓遭遇到疾風、暴雨、急雪、狂颱，都是人命攸關的緊要大事，必須以突變處理，不能掉以輕心。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應是這個意思。



## 馬英九的考驗：重拾軟實力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老子》

從經濟發展及社會層面來看，馬英九就任總統後民望的下滑，原因是很清楚的。政府在高層人事案中波濤不斷，議會廟堂喧嘩擾攘，而民眾所關心的經濟問題，一點也沒有「馬上好」的跡象。

平心而論，一年來國際原油價格飛漲，美國次按風波肆虐；百業蕭條，股市烏黑。面臨着國際性的不景氣，台灣何能獨善其身？何況阿扁執政八年，國庫被挖掏得七零八落，機制被扭曲得骨立形銷。台灣的經濟沉疴已深，不是朝夕之間可以復原的。要求馬英九釋出超人神功，在一年半載中扭轉乾坤，是絕不可能的。馬英九上任後，台灣物價上揚，股票慘綠，不幸的美國金融海嘯，如瘟疫一般橫掃全球，更使台灣市場如雪加霜。民眾固然了解這些環境因素，但以前馬團隊把「馬上好」說得太滿。「六三三」目標言猶在耳，已經道歉必須追回。民眾的失望，是不難想像的。《老子》第六十三章所說：「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實在一點不錯！

馬政府原所引以為傲的，是閣員都是治國英才，所以有「九萬兆」的豪語。但是這個團隊，似乎還沒有發揮效能。在陸委會、監察院、考試院等重要的人事案中，亦看不到副總統蕭萬長、行政院長劉兆玄參贊的跡象，令人甚為詫異。是馬英九不知人嗎？知人而不能用嗎？用人而不能專嗎？還是「政治人物職業性症候群」中的傲慢與偏見作祟？

民進黨所領銜的八三〇「嗆馬」活動，參加的人數雖然和目標相距甚遠，但有五萬人到七萬人上街遊行，似乎是相當確定的，這對馬政府自應是一個警兆。對前途有挫折感的台灣民眾，比這個數目實在多得多，只不過是許多人願意再給馬政府一點時間去表現而已！

在卸任總統以後，陳水扁因國務機要費貪污案，已被列為偵查的對象。台灣的民眾，厭煩了阿扁的貪婪枉法，期待國法的伸張，能夠「快馬加鞭」，把這個噩夢放入歷史。但對於有關資料是否解密，或解密到什麼程度，如何偵訊阿珍及涉案人員，馬本人及其部屬，多不願意表示意見，以免貽人以行政干預司法的口實。其實阿扁的作奸犯科，固然是司法問題，但他所提出辯解的，都是政治問題。馬總統如對國務機要費的政治性沒有立場，豈非引手自縛？為了維護法律尊嚴，伸張社會公義，馬英九應明快命令各行政單位充分配合司法的調查，並從總統府開始。當知藏頭縮尾，猶豫不決，延遲司法正義，就是破壞司法正義(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施明德前年帶領紅衫軍暴露阿扁的醜惡面貌，是台灣人民爭取法治與公義的表率，馬英九居然不敢在總統府接待他，理由牽強可笑，民眾亦是大惑不解。「政治人物職業性症候群」中所述的無知與權謀，似乎亦在這裡若隱若現。

從目前資訊來看，陳水扁吳淑珍夫婦已精心編織了龐大的國際洗錢網：牽涉的人頭及金錢，高出以前所知的貪瀆案十倍以上。「台灣之恥」的真正面目無可遁形，到此將是日暮路窮。然而，他仍在做困獸之鬥，狡猾伎倆，層出不窮。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因司法行政的因循無能，使他在法律夾縫中逃生，甚至逍遙法外，馬政府將如何向未來子孫及國際社會及交代。名電視主播陳文茜引述了一個評論說：陳水扁是個「壞蛋」，馬英九像個「笨蛋」，台灣或許快「完蛋」，這是何等的語重心長！

3月大選之後，民眾對馬英九實在有「如大旱之望雲霓」的期待，但是他在就任後不久，就表示總統應該退居二線，各種實際問題，應由部會首長去拚搏。這個想法，令人大為吃驚。我敢說「你錯了，小馬哥」。民信所歸的馬英九，應是一個大有為的總統，是要努力工作的總統，是帶着公僕們衝鋒陷陣的總統。如果馬在競選時以「二線領導」為政見，希望垂簾聽政，以待天下大治，相信大部分民眾不會把票投給他。

台灣大選之前，我指出台灣民眾對未來前途有極大憂慮，希望未來的政府能夠：

- 以創新具體的手段，振興台灣經濟；
- 以道德法治的實踐，重建社會公義；
- 以寬容博愛的胸懷，化解族群糾紛；
- 以尊嚴自信的態度，建立兩岸和諧；
- 以務實低調的態度，開拓國際空間。

這些課題，將是對馬政府的重大考驗。現代化的企業領導們，面對新任百目的里程碑，大都有一個現況查證(Reality Check)，現在就是馬英九查證檢討的時刻。《孟子·公孫丑》章說：

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希望馬政府能對以往百目的所作所為，好好的做一檢討，「過則毋憚改」，「知恥近乎勇」，現在民望雖然低落，但尚有可為，來日方長。

大選後的政黨輪替，已使台灣解除了許多民主法治的禁咒。許多以前不敢說的如「外省人原罪」、「濁水溪以北」等，已經成為歷史名詞。台灣的民主化火炬，必將持續的傳遞下去。這是馬英九歷史地位和歷史任務的重要時刻，他必須拋棄「全民總統」的情結，及「二線領導」的迷思，帶領國民黨人和台灣民眾，把台灣重新建設起來。

《老子》第六十三章所說的：「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告訴一個真正的領袖，必須實踐篤行，從事物的易處和細處作起。民眾對馬英九寄以厚望，他如能重拾賴以當選的軟實力，成功通過民眾的信任，將成為中華民族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典範。



# 他山之石

第六章



## 從軟實力競賽看以巴歷史糾紛

全球化時代進化中一個重大的逆流是戰爭，而時下全球戰爭威脅最大的地區是中東。這裡有形形色色的種族糾紛、宗教糾紛、路線糾紛、經濟糾紛等，在在都是地雷，隨時隨地都可能引爆。2002年美國布殊總統魯莽地捲入了伊拉克，已經被戰火燒得唇焦舌爛，進退不得。實際上中東最大的威脅還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長達六十年的戰鬥，儘管伊斯蘭世界內部有多種紛爭，但是他們團結一致，共同敵視猶太人、以色列和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國家。許多觀察家認為，紐約「九一一」悲劇的真正原因，是伊斯蘭極端派對美國堅定支持以色列的一種報復。

### 未演說先遭責難

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 (Mahmoud Ahmadinejad，以下稱艾總統) 在2008年9月24日訪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他承哥大「世界領袖論壇」的邀請，到校發表演說。哥大校長博林哲 (Lee Bollinger，以下稱博校長) 首先發難，詰問艾總統不肯承認猶太人被屠殺的慘劇(The Holocaust)，聲稱要消滅以

色列，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者，拒絕國際防核組織(IEA)的調查等。博校長開宗明義說哥大有優良的學術傳統，尊重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提供辯論全球性課題的平台，但這並不表示支持任何一方的主張。他並說他懷疑艾總統有學術勇氣回答這些問題，又稱艾總統的行為，類似一個殘忍的小獨裁者。

艾總統面對主辦單位大家長提出問題的尖銳態度，顯然亦相當激動。他說他接受邀請前來演說，為的是尊重知識和辯正真理。在沒演說前就碰到這種武斷的責難，顯然是提問者對知識的侮辱，亦是對聽眾的侮辱。他是來自一個文明的國度的人，對此頗為詫異。

在一個高層次的學術論壇裏，發生這種火爆場面，實在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我不禁想起《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群儒」那一幕劍拔弩張的景象。實際上他們所辯論的，的確是關係種族糾紛、中東戰火、世界和平的大問題。

博校長是東道主，以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用這種強硬的行為待客，是否有失身份？是否淪為一種負面教育？他對問題主觀意識的確定，似乎沒有討論的餘地，對學術自由是否不夠尊重？博校長的表現，引起了許多學生、校友、社會、國際人士的議論，可謂毀譽參半。相形之下，艾總統被迫苦守，步步為營，中間擇要反擊，時有佳作，縱然有時實問虛答，不失一個總統的風範。

博校長的「出格」，固然可說是反映他本人的真實感情，但如果說這是大學校長一種典型的有政治企圖的行為，是可

以理解的。紐約是世界上猶太人的大本營，可稱以色列的「虛擬」首都；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教授、捐款人裡，猶裔人士也極多。博校長一方面必須維持哥大崇尚學術自由的傳統，同意艾總統來訪，一方面要表明個人的立場，並贏取族群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先來個下馬威，劃清界線。他的「犧牲打」，可謂煞費苦心。現在讓我們看看雙方在兩個重要問題上的歧見。

## 以學術探究緣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希特勒對歐洲猶太人偏見極深，認為猶太人是歐洲政治、經濟、社會難題的根源，最終的解決方案，就是來個種族大清除。他在1933年控制德國政權之後，處心積累，透過各種手段，將猶太人捕進集中營，飢餓勞役之外，分批處決。歐戰爆發後，德軍勢力範圍擴及波蘭、羅馬尼亞及歐陸各地，隨着廣設牢籠。歐陸上的猶太人，逃命不及的，通通被打入集中營中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最後陸續被送入毒氣室活活毒死。

據統計因此喪生的猶太人超過六百萬，可說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浩劫。二戰結束之後，許多非常殘酷悲慘的事實，陸續被紀錄證實。在這個背景之下，以美國、英國、法國為首的聯合國，在波斯灣畔巴勒斯坦人所在地成立了以色列國，成為流亡在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家園。此地在兩千年歷史上實

在亦是猶太人的故鄉，巴人雖然不服，但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亦無可奈何。然而，六十年來，中東事變不絕，炮聲戰火，此起彼落，無日或息！艾總統在2005年的一個公開演說中，宣稱所謂大屠殺是（猶太人）捏造的，是一個不實的神話，所以博校長詰責艾總統這種說法是荒謬無知和公然挑釁。

艾總統指出，雖然國際人士對「大屠殺」一事已有許多調查報告，但數據可以辯論之處甚多。他的看法是對這事件不應草草定案，而應該繼續研究。人們不應只是尋找真相，亦要探索緣因。所以他主張要繼續清查，以求水落石出，他說這才是真正尊重學術、追求真理的表現。他說物理、化學、數學等科學，已被研究了數百年，但時至今日，仍然是科學家研究的對象，而且不斷有新的發現，形成了新的知識。如果草率的說這事件的研究已經夠了，不是武斷，就是怠忽，都不是追求科學的態度。

他進一步說，不管「大屠殺」的真相如何，總究不是今天巴勒斯坦人的責任。巴人何辜，因何被迫去背負歷史事件的包袱？為什麼在他們的家園中，無端的成立了一個以色列國？過去六十年來，有多少巴人被迫離鄉背井，家破人亡？美國人自詡崇尚公平、法治、人權、自由，難道不覺得內疚神明嗎？

## 歷史悲劇無解

艾總統再三說，他不敵視猶太人，亦不偏袒巴勒斯坦人。他的國家裡，有回教徒、基督教徒，亦有猶太教徒，他們都同等的參加國會，可以決定未來自己的前途。這個辯論，已經把以巴糾紛、中東戰火的重要因素，勾劃了一個輪廓。

艾總統的辯論策略是很明顯的，他要轉移目標，要學術界去探討猶太人究竟在歐洲做了什麼壞事，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以致遭受此種不幸。當然猶太人含冤已久，不能接受任何二度侮辱及傷害。事實上艾總統當然不敢否認悲劇的發生，他只是要說猶太人亦應該考慮巴勒斯坦無辜受害的冤曲。

這種歷史的悲劇，實際上是無解的。古人說：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歸根究底，時間不能倒流，人死豈能復生。人類只有勇敢面對現實：與其詛咒先人的錯誤，冤冤相報，不如各退一步，為子孫開拓新機。以巴的世仇，且作如是觀吧！



# 伊朗的平反與抉擇：核電乎核武乎

當我們正憂心忡忡，感覺伊朗戰火迫在眉睫時，2008年12月4日美國國家情報評估提出了最新的報告，聲稱它們以「高度的信心」，判斷伊朗在2003年時，已經中止了核武器的計劃。很顯然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在2005年認為伊朗加緊發展核武的結論，以及布殊總統一連串對伊朗的指控是偏頗的。這個報告發表以後，伊朗全國上下，可說是歡喜若狂，覺得多年來受到美國總統布殊及切尼的冤屈，現在可以大吐一口怨氣。全世界對布殊再不能盲目的挑起中東的另一場戰火，莫不額手稱慶。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技術當然更是如此。與核子物理、核子化學、核子工程有關的技術，素為國際上所高度關注，因之有《禁核擴散公約》的設立。但是發展中的國家，多認為這個國際禁核公約，實際是有核國家壟斷核能技術的手段，不公平而極霸道，所以透過多種方法，與之對抗。在本世紀初美國布殊總統就職後的一個重大外交政策，就是宣稱伊拉克、伊朗、北韓為「邪惡軸心」，領導多項經濟制裁。這三國家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單，主要的原因是她們極力發展核能技術，引起了美國的疑忌。美國透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

IAEA的運作，意圖關閉伊朗的核能設施，更加深伊朗和聯合國之間的齟齬。布殊及切尼在伊拉克碰壁，又到處向伊朗煽火，以轉移國際關注的目標。在這種互不相讓的局面下，伊朗核電核武問題，自然成為國際上的一個重大危機。處理稍有不慎，戰火可能一觸即發。

## 能源自主不能妥協

伊朗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在2008年9月底訪問哥倫比亞大學演講中，為堅持發展核能技術，引起了熱烈的爭辯。艾總統說發展中國家需要自主能源，這是一個國家的權利。這和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國格有關，是不能妥協的。至於國際合作，他說伊朗以前曾嘗試與美、英及法合作開發核能發電，但這些國家都拒絕參與，說「你們不需要自己發展，我們可以賣能源給你」。然而伊朗以前亦曾嘗試向這些國家購買民用飛機的零件，同樣的吃了閉門羹。你能相信這些已開發國家會真正幫忙伊朗嗎？

他說伊朗的核能發電計劃有幾個原則：一是遵守國際法律，二是完全和平用途，三是充分與國際合作，接受檢查。到現在為止，IAEA並沒有說伊朗在發展核子武器！

艾總統說他堅信核子武器是不道德、不合人道的，任何政治人物在此時此地想試驗核子武器或製造核子武器，一定患了政治癡呆症。然而，美國顯然自異於正常人，現在美國已

在試驗第五代核子彈，她還有什麼立場可禁止其他國家開發核電，致力於和平用途？

艾總統批評布殊總統不虛心的去探討「九一一」慘劇發生的真正原因，利用「九一一」事變所產生的悲憤氣氛，轉借為消滅「大規模破壞性武器」，而貿然進攻伊拉克。結果在伊拉克什麼也沒找到，但已把伊拉克毀壞成為廢墟，犧牲多少無辜生命；現在阿富汗亦是遍地戰火。幾年來中東局勢已更安定了嗎？世界會更安全嗎？所以美國常要靠他龐大的軍事力量，去壓迫其他國家就範，這樣以硬實力為主的外交政策，如何能解決國際上的問題！

## 柔以克剛舌戰群儒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辯論中，艾總統盡量突現美國公共政策的種族偏見。事實上猶太人在美國的商貿、金融、財務、法律、教育、科技、醫療、製造等行業，人才濟濟，多居領導地位。美國的新聞媒體同情猶太人，其來有自。多年來中東戰火不斷，新聞界多對以色列採取友好態度。它們的報道和評論，形成了社會的主流意見，美國政府不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當政，其最終決策，自然極受影響。伊朗發展核電的立場，和巴勒斯坦人的悲情，很少有機會在高階層、高格調的平台上表述，亦極少能吸引社會的重視。

艾總統本是一個大學教授，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早知是龍潭虎穴，但亦欣然接受。單刀赴會，自然有備而來。會議開始時他有點被咄咄逼人的態度所激怒，但很快就回復平靜，不亢不卑、侃侃而談。雖然有些地方，他可說有點言偽而辯的味道，但在外交殿壇之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所以左右閃讓，避重就輕，亦是人之常情。無論如何，他要尋找機會把伊朗對以巴糾紛和核能技術的立場向美人清楚申訴，促使美國社會廣泛的注意，他這個目的是達到了。

美國的鷹派人士如布殊、切尼等，把持着部分國情機密，以國家安全為保護傘，選擇性的透過媒體傳播，以達成政治目的，前例甚多。六年前操縱人造衛星資料，瞞天過海，出兵伊拉克，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最近這次的國情資料報道來看，布殊政府幾年來對伊朗發展核子武器的指責，如非傲慢及疏忽，就是偏見及誇張。恐怕這一回合的贏家，是以宣示國家軟實力為主的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

## 言偽而辯不誠無物

然而，艾總統亦不能聲稱是真正的勝利者。他不敢承認猶太人慘被屠殺的事實是很難站立的。無論大屠殺之原因及經過如何、死亡數目為六百萬或一千萬，它的發生總是一個事實。希特拉是個殘酷的暴君，不論他為何對多少猶太人不滿，不分青紅皂白，暴力謀殺了數以百萬無辜的百姓，老幼婦孺無一例外，亦是絕對不可原諒的事實。

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醜惡的一章，是毫無疑義的。艾總統不從正面答覆，只在支節上要文章，未免不夠坦蕩，這是他的一個敗筆。艾總統必須承認歷史事實，否則哪有「誠信」可言。誠信就是軟實力的基礎。

在核能方面，伊朗既然歡迎IAEA檢查，為何不使訪查更為透明化？其實艾總對核能的堅持，一方面是覺得布殊在國際上的可信度日落西山，個人威望急速下降，已不敢一意孤行，在中東另起戰火；一方面亦因許多歐亞大國，包括俄羅斯、德國、法國、中國、日本等，和伊朗有多種能源及經濟上的關係，不主張採取極端的措施，起碼不再被布殊牽著鼻子走。所以伊朗對於發展核子技術，自覺有恃無恐，仍是我行我素。

伊斯蘭世界裡，一直都有一個重大的隱憂：以色列是否擁有核子武器？所以他們對於發展核子軍事技術，使能對以色列發生制衡及嚇阻的作用，保持濃厚的興趣。據美國CBS新聞電台的一個報道，美國遠在七〇年代尼克遜總統在任時，已有情報顯示以色列在發展核子武器。其時正是基辛格當政為國務卿，就對以色列施以壓力中止，同時亦把這宗駭人聽聞的消息隱藏起來。所以伊朗對核子技術的意願，是不難想像的。如果對以色列的核武疑懼一旦不能消失，伊朗或伊斯蘭世界發展核武的企圖自會持續下去。

## 包容尊重長治久安

從全球宏觀的立場來看，以巴之間的武裝衝突持續已六十年，停停戰戰，不死不休，是當今世界上最為棘手的火藥庫。實際上種族及宗教的糾紛，不是煤氣集中營或核子武器所能解決的。這裡的勝負，不在炮火的兇猛，而在人心的抉擇。族群之間，都有沉重的歷史包袱，是非對錯，難有定論。但雙方必須增加了解，互相容忍。彼此心內的疤痕，要有善意的滋潤，時間的化解，方可消弭於無形。國家之間如果能從軟實力的立場相互比試，應該可以找到長程的解決方案。

2001年「九一一」慘案的發生，無可置疑的是伊斯蘭世界極端派人士對全球的一種控訴。肇事的十幾名極端分子，明知此去便無回頭。他們視死如歸，代表的是種族和宗教糾紛的背後，存在着多少刻骨銘心的悲痛。「九一一」暴行的結果，奪去了三千多無辜的性命，這是一個大型的、預謀的殺戮，自然是不可原諒的。然而，痛定思痛，我們要如何減少冤冤相報、以血還血的悲慘循環？

總之，我們希望猶太人、巴勒斯坦人及美國政府更多的反思。多些同情與憐憫之心，彼此互退一步；與其詛咒黑暗，不如共點燭光。說不定再過五十年，中東地區終可看到和平共存的來臨。



# 民主化過程的示範：美國總統初選

2008年2月5日是美國民主化政治的超級星期二，是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選舉兩黨提名初選一個重要的日子。有二十二個州的兩黨黨人，各自推選他們所喜愛的總統候選人。因為選情激烈，特別是民主黨的希拉莉與奧巴馬兩人，在前面的六個州中各擅勝場，纏鬥不休。以我的觀察，初選的結果恐怕仍是平分秋色，不會有壓倒性的勝負。兩人將會把戰火延長到夏天的民主黨代表大會，才能一見分曉。

## 弱勢族群崛起

然而不管是誰勝出，下任美國總統看來不是一位女性，就是一位黑人，都是在弱勢族群中產生。這個結果，恐怕不是二百三十年前美國開國元勳們所能預料的，也不是近如數月前再有經驗的觀察家所敢斷言。這是美國人必須準備接受的事實，不能不說是民主化潮流中的盛事！

美國自1776年開國後，行政上的大權，大部分操縱在所謂WASP (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色英格魯撒克遜族基督徒) 手中，也當然都是男性。許多女性，在美國獨立戰

爭時起已經對國家社會有重大的貢獻，然而因歷史及傳統上的社會歧視，在全國性選舉中的投票權，一直要到一百五十年後，即1920年美國憲法第十九號修正案後，才能完全取得。女性真正擔任國家高級首長等職，還是近三十年來的事。當然美國最近兩任國務卿和駐聯合國大使：M. Albright、J. Kirkpatrick、C. Rice都是女性，看來和女性在處理國際錯綜複雜的關係，較能考慮軟實力的因素。總之希拉莉如能當選美國總統，將是美國歷史性民主化過程中的創舉。

具有同樣歷史意義的是奧巴馬。美國的黑人，歷史上多是白人豪商巨賈的工廠或農場奴隸。美國立國百年之後，林肯總統不惜以軍事行動，維護聯邦政府的政策，廢除奴隸，回復他們的人權。內戰勝利後，1865年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十六號修正案，正式廢止奴隸，並讓他們享有公民的權益。實際上黑人在政治上真正擁有平等的地位，一直要再等一百年，多位民權運動先驅，包括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牧師等的努力鼓吹，1965年選舉權法案通過後才告確定。然而社會上對黑人的歧視，仍然不絕如縷。儘管黑人有優秀的運動員、音樂家、演員、作家，但是在企業及政府高層上，黑人仍然是稀有物種。所以奧巴馬這次如能脫穎而出當選總統，亦將是美國民主化中的奇蹟。最能感受正面影響的，將是亞洲人，這一族群，同樣的亦是企業管理上的稀有物種。總之一個黑色人種的美國總統，它所傳播給全球人士的訊號，將是無可比擬的。

共和黨領先群倫的麥凱恩雖然是越戰英雄，為人正直，經驗豐富，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參議員，不幸共和黨過去八年已經給布殊總統「玩殘」了。布殊一意孤行，進攻伊拉克，如今仍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每月燒錢數億，亦把國力掏空；次按風波橫襲，油價高漲，失業率急增，看來在 11 月的大選中，再優秀的共和黨候選人，亦不免遭受淘汰。天數如此，非戰之罪。

有趣的是，麥凱恩高齡七十一，是不折不扣的銀髮族，如能當選，將取代列根而成為美國歷史上年齡最高的總統。2008 年的美國，無疑是弱勢族群崛起的一年！

麥凱恩憑著他在越戰的經驗，主張美國不能在伊拉克拍拍手便走，必須加強軍事力量控制局面，美國才能逐步抽身回鄉。在國內方面，他主張共和黨傳統的保守經濟政策。

我們回來看看，希拉莉和奧巴馬兩人的差異在哪裡。我們應該注意兩個重點，一是誰的贏面居多，二是他們是否能做稱職的總統？

## 奧巴馬奇蹟

先說奧巴馬。他現年四十九歲，是一位魅力(Charisma)十足的演說家。他是一位黑白混血，父親是肯亞人，母親是美國人。他 1961 年在檀香山出生後，隨母親到印尼居住，他的繼父是印尼人。其後他遷居伊利諾州，並到哥倫比亞大學

深造，畢業後又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他才智過人，善於溝通，2005年獲選為伊利諾州美國參議員，對於民生、移民、社會、國防法案，著墨頗深，為年輕參議員的翹楚。

奧巴馬競選的主軸是「改變」。也強調美國內外交征，處處碰壁。以前美國在國際上的盟主地位已經喪失，在許多國際論政的場合上常被孤立。在國內來說，美國失業率高企，政府赤字預算龐大，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能源價格有增無減，社會醫療制度破產，所以這是該改變的時候了。而他最可以代表新一代的美國人，求新求變，爭取先機。他的選民，亦以青年壯年為主。除了黑人團體全力支持外，媒體名嘴Oprah Winfrey更是他最重要的推銷者。他的戰囊豐盈，人氣旺盛。2007年底在愛奧華州的初選中牛刀小試，一鳴驚人。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中，雖然敗於希拉莉，但隨即得到甘迺廸家族成員的公開支持，如虎添翼。

很多人懷疑奧巴馬在全國政壇中初出茅廬，是否能有治國的見識、能力、準備和擔當。愛德華甘迺廸參議員在華盛頓一會議中公開支持他，並向聽眾說了一個故事。他說若干年前亦有一個年輕小伙子（指約翰甘迺廸）競選美國總統，當時一位極受尊敬的前任總統（指杜魯門）詰問，你有能力領導國家嗎？這位年輕人說：「世界在不斷改變，以前的方法已經不管用，這是新一代領導出山的時候了！」

愛德華甘迺廸說，這新一代的領導，今天就是奧巴馬！甘迺廸家庭的這種公開鮮明的選邊站台，對整個民主黨產生

極大的衝擊。顯然的奧巴馬的實力是軟實力，他的賣點是誠心求變，以信待人。他不求民眾的愛戴或尊敬，但要民眾信任他。

## 希拉莉異軍突起

美國參議員希拉莉，在參選前已經名滿天下。她在伊利諾出生，從小才華橫溢，在衛里斯萊大學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然後從事專業律師工作。她和克林頓婚後到亞肯色州居住，隨克林頓在政壇崛起，她先後成為「州長夫人」、「第一夫人」。克林頓就任第四十二任總統後，希拉莉的影響力甚大，特別在家庭、醫護、社會、保險方面的法案，許多都可看到希拉莉的影子。在美國政壇上時常有不斷的耳語，究竟在他們家裡，誰是真正的「家長」(Head of the Household)。

終究一個高姿態的第一夫人，在美國政壇上還是會引起疑忌的。在多方面壓力下，希拉莉轉居幕後，然而，她對政策研究始終保持興趣，涉獵的範圍慢慢擴大，並建立了重要的智囊和網絡。克林頓的桃色新聞不斷，帶給希拉莉極大的打擊，促使她決定建立自己的政治平台。她在2000年時參選紐約州參議員，引起世界矚目。觀察家對她問鼎總統寶座，都覺得只是遲早的事。她宣布加入選戰後，很快就造成很大的聲勢。

## 看未來與看現在

但是希拉莉其實是屬於較嚴肅的專業人士，並非以個人魅力見稱。以前在公開場合中，她戴着「第一夫人」的光環，受到各方的吹捧呵護，不可諱言的使她高估了自己的親和力。競選活動中主客易勢，她的嚴肅面顯露出來，成為溝通的障礙。克林頓加入競選團隊，求功心切，有時言語過當，他個人的角色及歷史，亦多爭議。所以克林頓對選民的影響，可說是瑕瑜俱見。實際上夫妻相繼成為總統，不無建立「王朝」的表徵。所以有些民主黨人對希拉莉不無戒心，愛德華甘迺及前總統卡特，對她的參選頗為冷淡，不為無因。

艾奧華州首戰失利後，希拉莉才正視這些問題的嚴重，迅速改變戰術，放低身段，鬆開自我，與群眾直接互動。她不刻意去吹捧女性溫柔或埋怨社會歧視，但亦不諱言女性在追求成就中所遭遇的困難，侃侃說到做妻子、母親、職業婦女的甘苦。在新罕布什爾州一個場合中，有位女士問她如何面對政壇、家庭、個人間的各種挑戰，然後說：「你怎麼在處理這些千絲萬縷的事務中，還能去打理髮型呢！」希拉莉百感交集，一時眼中充滿淚水說，雖然面對這些困難，但亦是她個人心甘情願的選擇！她的真情流露，感動了許多婦女，第二天成群結隊去投她的票。所以她在新州，出人意料的轉敗為勝，還比奧巴馬多了十個百分點的選票，可以說是這次選程的轉捩點。在CNN舉辦的加州辯論會中，她已經表示出非

常的平和和高度的自信，並對美國當前的難題和解決方案，展現出相當深入的了解，無怪乎《紐約時報》在2008年1月25日已宣布支持她。

希拉莉、奧巴馬兩人固然尋求突現自我，但政見其實相差不大。他們的分別究竟在哪裡？在這種全民參與、一人一票、票票平等的民主化過程中，領導者要有崇高理想、周全政策和執行能力，並必須與人民溝通，得到選民的信賴。所以民主化的政治選舉，是軟實力的競賽。

## 概念股與實力股

以我的觀察，奧巴馬的賣點是「美國必須要改變，要改變必須有新思維，能帶領美國面對未來的，捨我其誰？」希拉莉的賣點是「美國必須能改變，改變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有應變準備和能力的，非我莫屬。」套一句投資經來說，一個是「概念股」，另一個是「實力股」。

當前美國面臨的難題，是非常嚴峻的。例如：如何從伊拉克抽身而不致前功盡廢、如何紓解信貸風暴及金融危機、如何降低油價而鼓勵創新能源、如何降低醫療成本並兼顧國民健康、如何遏止非法移民並降低勞工成本、如何防範恐怖襲擊並尊重人民法益、如何維護世界和平而免成國際警察、如何贏取盟邦合作並維護美國地位，等等。

這些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都急在眉睫，必須解決，一刻亦不宜浪費，否則美國在二十世紀所建立的世界領袖地位，將會逐漸削弱。新任總統就職日，應是新方案啟動時，而非總統在職訓練的開始。所以候選人的理念、魅力、兼聽、好學固然重要，能夠坐言立行、劍及履及更是不可或缺。這些複雜的因素，將需由美國公民自行去決定。

## 求變與求真

值得特別稱道的，是兩人甚少作人身攻擊，盡量談政見，說理念，偶而碰到像「膚色」、「性別」敏感問題，亦迅速跳出，以免引起選民對人身攻擊的反彈，可以說是「其爭亦君子」。在CNN的辯論會中，希拉莉笑着向聽眾說，共和黨人說他們要變，但是你們覺得現在的候選人和坐在白宮那人真有分別嗎？民主黨人說要變是真的，不管我們兩人哪個當選，將會帶領美國走入新時代。這句話，贏得了全場如雷的掌聲！

我只希望這些新的改變，不止是表面上、形象上的刷新，而是真實的把美國在新世紀中的定位，在全球化中的國際關係，及美國人如何與世界各式人種融和等實質課題，提供一個嶄新方向和框架。

這一場美國總統黨內的初選，辯論政見時相互尊重，以國家前途為重個人利益為輕，看未來而不囿於既往，極激烈

而無戾氣，這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真諦，可說是全球化世界中民主化過程的一個良好範例。中國大陸觀察家有認為美式選舉只是靠賣廣告及吻小孩，那未免流於膚淺了。



# 奧巴馬的全球性挑戰

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於2009年1月20日在華盛頓國會山莊廣場宣誓，就任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美國政治上的種族不平等，至此劃下喜悅的句點。

奧巴馬走馬上任，可不止是美國一國的事，在全球化的今天，對世界各國都有重大的意義。當下全球籠罩着從美國吹來的濃密經濟災難烏雲，加沙走廊炮聲隆隆，歐洲十五國嚴寒刺骨，到處都充滿了前途茫茫的不安全感。所以奧巴馬的就職引起了全球人士關注，他所代表的是時代性的改變、挑戰、希望、激勵。

這個時候，恰好接近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兩百歲的誕辰。林肯是奧巴馬的政治典範，除了政黨屬性以外，兩人的理念和經歷，實在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兩人出身寒門，同是伊利諾州選出的國會議員，同對普羅大眾和基本人權有深刻的關懷和努力。前此林肯為了維護黑人的公民權益，不惜與南方保守勢力一戰；一百五十年後，乃有美裔黑人當選美國總統。飲水思源，奧巴馬對林肯這位人權法治的鬥士，有著崇高的敬意。在宣誓典禮中，奧巴馬就以林肯用過的《聖經》宣誓。

在美國立國二百三十三年的歷史中，林肯是一位極受尊敬的總統。歷史學者共同稱道林肯，是因他具有恢宏的遠見，博愛的胸懷和堅定的勇氣。今天奧巴馬所處國內外環境的惡劣，比當時林肯所遭遇的，更為嚴峻；時間的壓力，更是無比迫切。林肯的領袖風範，無疑是奧巴馬所當努力效法的。

## 重整經濟，重拾民信

在奧巴馬總統的日誌中第一需要解決的，當然是如何拯救江河日下的美國經濟。因為次按風潮所引發的銀行倒閉、股市崩盤、產業萎縮和失業惡化等問題，就像一塊塊的骨牌，在瞬息之間應聲而倒。如果不能以迅速有效的措施去紓解這個急湍，最後必然轉變為經濟全盤熔融(Meltdown)和社會全面的瓦解。這個問題，在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只是徵兆初露。不到半年光景，美國的窘局，已經擴大為全球性海嘯式的風暴，成為繼美國1930年代經濟萎縮後最驚人的全球性經濟恐慌。

美國的經濟究竟出了什麼毛病？是國庫空虛嗎，是民生凋敝嗎？當然過去十年中許多宏觀及微觀的經濟、財政、金融措施中存在不少紕漏，埋下了病患的種子，而伊拉克的戰火熊熊，燒錢已近千億。然而目前美國仍有龐大的國力，經濟力量仍是全球第一。我們從較高的一個層面來審視，可以

發現當前的經濟問題，是社會普遍存在失信、背信的現象，引起了大眾對企業的不信任，對金融機構以及公共體制漸漸失去信心的緣故。

孔子說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我們所看到的金融海嘯實際上是全球性「信心」危機的反映。多年來由於企業鼓勵消費，信貸泛濫。若干消費者及經營者在個人層面不能維護信用，動輒以破產為保護，觸發了金融企業機構的背信與失效，終於造成了投資者對企業及市場的信心崩潰。最後的結果，就是人與人、人與企業、人與市場、人與政府之間的互不信賴。因為全球化發展和國際相互依存的關係，這就爆發全球性的「信心」危機。

當然要讓消費者重得債信，企業穩定運營，股市止跌回升，經濟重獲景氣，恐怕非兩三年時間不能見效果。但是如果現在不下重藥，半年內經濟沉痼沒有起色，全球性的信心恐慌，必然如瘟疫般蔓延而不可收拾。所以獲選以來奧巴馬已緊鼓密鑼組織團隊，研擬對策，磨刀霍霍，只待今朝。及總統就職，部會新人到位，各項工作，應可鳴槍起跑。所以全美國以及全世界，對奧巴馬就任新職都有無比期待。

奧巴馬提出的七千億或一萬億美元的經濟改革方案，明眼人看來，不免要質問幾個基本的問題：

第一：錢從何處來？如果沒有可信的來源，政府只靠印鈔機運作，那麼所產出的成品越多，將越快成為廢紙，而加速政府的破產。

第二：錢如何用？如果只把鈔票交給銀行或企業，可能馬上進入特權領導們的荷包，徒然使他們發了國難財。資源到不了消費者的手中，達不到振興經濟的效果，反成為政府的背信。

第三：產業效率如何提升？美國以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過去二十年來病患叢生，如何易筋正骨，以提升生產效率，擴大國際市場，增進顧客的信心？政府官僚體系的介入，如不小心，亦可能使企業雪上加霜。

第四：政府的資金如何撤離產業(Exit)，在何種情況及以何種方式將政府資金退出，以保護市場經濟的基本面而重拾全民的信心？

這些問題的答案，和經濟振興方案的進展息息相關！

前此，前財政部長保爾森與聯儲局主席貝南克推出救市方案，敏捷明快，為布殊內閣文化所罕見。然而國會覺得他們以金融機構為救濟的主要對象，未能對症下藥，解決不了源頭消費者的困難，所以反對聲浪甚多。上面所提的幾個問題，都是辯論的要點。殷鑒不遠，奧巴馬新政府應檢討基本原因，採取整體措施，才不會重蹈覆轍。所以新政府的第一年，必然以振興經濟為燃眉之急的最優先的目標。重振民眾的信心、建立政府的大信，這些都有賴於奧巴馬總統的遠見、胸懷及勇氣，不止是籌措更多的資金而已。

## 調整外交，建立公信

與迫在眉睫的經濟恐慌相比，許多目前非常棘手的外交熱點，將不得不成為奧巴馬總統的第二優先。這些包括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走廊的戰火，伊拉克戰局和政局的控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恐怖份子的茁壯，俄羅斯烏克蘭天然氣輸送的糾紛等，各有形形色色的火舌，如吞似吐，時隱時現。此外可見的仍有許多問題，如伊朗發展核武的威脅、北韓去核的談判、達佛的種族屠殺、環球溫室效應、極端的天然災害等，都可能觸動新的危機。

實際上在奧巴馬的從政紀錄裡，外交政策並不是他的強項，我們亦不願意看到他為了急於表現而倉卒動作。因為人在困難的時候，常會做出錯誤的決定。權位越高者，一犯錯誤，對社會貽害越大。這在二十世紀中，史不絕書。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此公文武兼備，歷練完整，任事忠盡，聲譽遠播。但是數年前他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引證最新情報，對伊拉克擁有大型滅絕性武器一案遽下結論，為布殊、切尼進攻伊拉克政策背書。當時他侃侃而談，義正詞嚴。事後發現事實與他當日信誓旦旦所指證者大不相同，他知道自己朱紫不分，扭曲事實，鑄成大錯，終於黯然下台，引為人生憾事。但此事之負面影響已然造成，多少無辜性命，因之灰飛煙滅，成為歷史上可痛的一章。可不悲乎！

新任國務卿希拉莉對國際事務雖然有多年的涉獵，終究是首次坐上指揮台。即使謀士如雲，情報潮湧，但難免菁蕪互見，眾口鑠金。如何明辨是非，取捨決奪，仍需領導者高度的智慧和堅定的勇氣。最重要的是當前的外交事務，每一件都有複雜的原因及後果，許多事故，必須從國家的整體利益來考慮，才能找到最佳的對策。舉例來說，許多原非外交方面的事件，如天災、病疫、人權、匯率等，處理不當或處理遲緩，都可能成為外交上的難題或大事。

希拉莉在國會聽證會中指出未來政府外交的方向，將為「智慧實力」或「巧實力」(Smart Power)的應用。即利用一切國家可以應用的資源，軍事、政治之外，尚包括經濟、文化、科技、法律等力量，投入於外交事務之中。這就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結合，將是一種正確而具彈性的策略。這種策略，相信比布殊時代動輒以武力施壓，展顯牛仔式的霸權為高。事實上國際上重大的外交糾紛，都有錯綜複雜的歷史、社會和政治文化背景，絕不是單純的黑白二分法所能判斷。所以必須以剛柔並濟，軟硬兼施的整體對策，才能發生效果。奧巴馬和希拉莉有此認識，令人引以為慰。

以中東的加沙戰火為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爭執，上溯千年歷史，而現時雙方均有複雜的內部政治意圖。火箭炮彈，只提供短暫情感上的滿足，亦常是掩蓋本意的煙幕。而激情過後，常常發現無情的炮彈已再度粉碎了解決答案的橋樑。

以色列人必須了解，他們的安全需求及長期生存，應該建立在和平上而非戰爭上。威力再大的火箭炮彈，亦絕不能保證長遠的勝利及和平。實際上血流得越多，越多的民族仇恨便延續到下代子孫。同樣地巴勒斯坦人亦必須了解，他們固然有追求合法的政治經濟地位的願望，猶太人自然亦有相同的要求。所以以巴兩方，誰也不能把對方消滅蒸發或驅逐出境，雙方只有學習在原處和平共存。站在美國和英國的立場來說，他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中東糾纏不清局勢的創始者，應該有責任採取公正、和平、堅定、一致的策略，把這個關鍵因素向雙方表達，並透過聯合國安理會，向雙方施壓，使他們覺得坦誠談判，對雙方都有利，而不輕啟戰端。

奧巴馬有較完整的世界觀，了解黑人之外，他最近的親信中，有亞洲人，有非洲人；他了解到的宗教，有基督教，亦有伊斯蘭教。他不是來自世家豪賈，知道市井小民的心態。所以他有廣泛的文化背景、認同感和親和力，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能夠有他這種全球化的陶冶，這將是老天給他的天然優勢。

奧巴馬在這時刻，應該是以無固、無必的態度，建立他的國際公信力。他是一個新鮮人，沒有布殊的包袱，可利用國際上短暫的對新總統及新內閣的希望，透過聯合國安理會，使雙方各自放下武器，冷卻亢奮的情緒，並從異中求同，勾劃新的未來。換言之，奧巴馬新政府第一年在國際事

務上，絕對不要自以為是、多作主張。最好是呼籲全球各地全面的停火，誘導當事的各方，各找台階，在不動武力的前提下，互相鬆綁，共謀解決的方案。能夠達成這種有限度停火的目標，有助於未來國際熱點的冷卻，那將是奧巴馬政府的重大而卓越的成就。這種成就，將是建立在軟實力與硬實力共生的策略上，而以公信力的彰顯為基礎。



# 兩岸未來

第七章



# 兩岸合作的障礙：意識與情結

中國幅員廣大，各地自有獨特的歷史、地理及人文特色，南轅北轍，不足為奇。許多廣東人、四川人、上海人、陝西人的習性，往往是酒後茶餘的笑料，不必多加渲染，亦無須故意忽視。若以這種平常心去看待地緣、尊重省籍，天下多少事，可付笑談中。

## 遺民悲情

客觀看來，台灣屬於中國版圖，可以遠溯秦漢。台灣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大陸移民，各自從不同時段東遷，但主要來自閩南及粵北（客家），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宗教、祭祀均與原來鄉里相同。然而因地理環境所限，海峽自成天塹，除閩南、粵東之外，百年來兩岸關係並不密切。台灣的居民，對大陸有一種近鄉情怯，既喜既憂的情懷，是不容諱言的。

遠的歷史不說，滿清開國未久，鄭成功極力擁護明室遺族，志在恢復華夏衣冠，因之遠走台灣，與清廷對立。雙方關係緊張，以至兵戎相見，最後鄭氏覆滅，台灣復入清室。

但台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及嚮往，久而彌堅。光緒年間沈寶楨在台南延平郡王（鄭成功）祠題聯有云：

開萬古固未嘗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異，缺憾還之天地，是一代完人

物換星移，世事變幻；白雲蒼狗，人情坎坷。鄭氏之是非功過，自是一言難盡，且待歷史決定吧。然而台灣人民自有一種淡淡的遺民悲情，其來有自。

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失敗，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這對台灣來說，直如晴天霹靂。台人何辜，受此池魚之殃。「丞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丘逢甲誅心泣血之詞，情何以堪！遺民悲情，躍然紙上。但從此之後，不少台灣知識分子，令其後人不惜飄洋過海，重回大陸升學。身在孤島，心繫中華也。

## 二二八重啟裂痕

二戰結束，台灣光復。民眾對於回歸祖國，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大部分人士，無不紛紛寄以厚望。不幸二二八事件突發，原是小事一宗，頓成街頭喋血。可憐槍火無情，何分青紅皂白？受害者固然有台人，亦有大陸人，但總以台灣人為大多數。

事實上蔣中正播遷台灣初期，國務重點為軍事。當時確以保衛台灣安全，免為大陸所拼合為第一要務。此時台海風雲危急，民心憂疑未定，採取威權管理，為其一貫作風。白色恐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台灣人與大陸人，同受其害。雷震與孫立人固外省人也，且為蔣氏所熟知，倚畀至殷。一旦政見不合，即成箭靶。兩人所受冤屈，人所共知。凡此種種，可說是歷史上的悲劇，無不增加老一輩台灣人的挫折感及對大陸的疏離感。對此時期受害者家屬，則切膚之痛，日久而記憶猶新，自是人之常情。

## 民主化新出發

待1954年後政局較為安定後，蔣中正政府即致力於土地改革，振興農業，加強教育，培植人才，發展工業，拓展商貿等，切實以改善台灣人民生活為首要。1980年代蔣經國當政後期，政局安定，民食富足，已具備政治改革的條件。1987年他廢除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並採行民主化。所有基層選舉，均由鄉土主導之外，政府高層官員，對台籍青年亦曲意拔擢。今天台灣的各級政府，自下而上，已為台人天下。民進黨的衰衰諸公，大多是在這種民主化社會環境中接受教育而嶄露頭角。

文獻資料顯示，台灣為日本殖民地時期，教育僅為點輒性質，台人能受高等教育者如鳳毛麟角。1945年日本投降之

初，台灣全省有學士學位者約五百人。五十年來國民黨政府以國民教育為義務，執行不遺餘力。振興科學教育文化，明載憲法之中。今天台灣島內大專畢業以上有正式學位者不下五百萬，高等教育普及乃是今天台灣競爭力的重要根源。

## 化解創傷破除盲點

台灣人對五十年代播遷去台的大陸人的疑慮，到七十年代方暫平息。不幸此時大陸「四人幫」當政，「紅衛兵」橫行。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令人觸目驚心。眼看著大陸民眾身上的苦難，更撩起台灣同胞心中的創傷。許多有志的台灣青年，浩然有「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氣概。即使事實有所不能，但對毛澤東教條對中國大陸的損害，從引蛇出洞、陽謀、反右、反修、大躍進、文革、六四等等驚心動魄的鬥爭，無不感同身受，心有餘悸。他們免不了會懷疑，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件雖成過去，但有無可能再度發生呢？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不料二十年之間，大陸政治風暴已定，台灣「文革」鬥爭驟起。世事變幻，一至於斯！在缺乏了解的狀況下，期望台灣與大陸民眾相互認同，可想而知的是相當困難。如非蔣經國1987年底開放大陸探親，在警戒森嚴、劍拔弩張的邊界上明修一條棧道，設法以親情融化寒冰，雙方敵意的化解，更將遙遙無期。現時看來，可見蔣氏之用心良苦。

歷史性悲情意識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台灣是個海島，台人賦性豪放、真情、刻苦、敬天、富同情心、有正義感。部分民眾不自覺的受到台獨極端者的煽動或挾持，以致走上偏激的歧路，亦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大陸的有識之士，必須了解台灣同胞內心的「情」，才能以客觀包容的態度，去紓解歷史性不幸的「結」。能體會台灣同胞對大陸的憂疑心態，才能明瞭一些對「一國兩制」主張的顧慮。兩岸之間，的確有若干心理困難存在。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們必須處身到較高的層次，方能細看歷史的長河，並期許以平常心耐心和善意誠意，從根本上化除雙方意識上的盲點。



# 兩岸的共同橋樑：孫中山的理想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 民國 · 孫文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在武漢起義，推翻滿清，成立共和政體，這不是普通的政黨輪替，而是一件超越時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四千年的君主皇朝，到此終止；由人民作主的共和政體，從此開始。也就是說，老百姓將可以作自己的主人，用選票及和平的方式來選擇經理國家的政府。所以，辛亥革命應是四千年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辛亥革命的精神領袖是孫中山先生，他是中國歷史上創造時勢而有長久及重大影響的英雄人物。歷史上能夠和他相比擬的不多。

孔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到今天仍然是人類追求的理想。

孟子也是一個這樣的的人物。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理論，二千年來，也很少有人比得上。

孫中山所領導因辛亥革命而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成立至今，九十九年來，一直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中。然而中華民國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她的人民，在世界各大洲展開商貿文化各項交流。她參與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勝利國的一員，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

1949年由毛澤東領導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經過一番非常坎坷的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是全球GDP的第二大國。過去六十年中，中華民國仍然存在，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亦有傲人的成就。

實際上，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大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到二十世紀中葉，已進入了新的一章，人民可以有不同而和平的發展途徑。民主共和體制的基礎及運作，已日為增強。六十年來，不幸由於各種情況的發展和意識形態的糾纏，兩岸政府仍然以海為界，各自表述，有時候甚至劍拔弩張，對於遍佈全球的中國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非常遺憾的狀況。

未來兩岸如何統一，中國人民如何攜手合作與時俱進，如何成為世界上和平安定的力量，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領導，這些相信是大多數中國人共同關心的問題。

我個人對些問題，是很樂觀的。因為兩岸雖然有許多的爭端，然而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精神，是兩岸的共同點，提供了兩岸共通的橋樑。

我在十多年前去北京訪問，看到天安門廣場高高懸掛著毛澤東的肖像，但也懸掛著孫中山的肖像，心裡非常溫馨。我到廣州去，看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紀念墓園，被很莊嚴的保存著，心裡也非常安慰。我到南京去，看到絡繹不絕的遊客去瞻仰中山陵，使我心裡對中華民族的前途，更充滿了信心。

不久以前我和一些外國友人又一次去遊覽中山陵。外國朋友問，在紀念堂中石壁上雕刻的文章是什麼意思？我說那是《建國大綱》，是孫中山落實理想的具體方案，於是逐條向他們解說。具有特殊意義的是建國大綱第一十七條：

中央與省的權限採「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我說這種中央與地方存異求同、謀求均衡與和諧的務實做法，孫中山早就有見及此。我的南京朋友說，這豈不是「一國兩制」嗎？我說這何止是「一國兩制」，這是「一國多制」的精神！以中國幅員之大，這是事實的需要，亦是中國歷史上由來以久的傳統。

進一步來看，中國歷史上凡是能夠繁榮強大的朝代，都是能包容共蓄，相互尊重的朝代。凡是雄才大略的領袖如周太伯、漢武帝、唐太宗，都有「興滅國，繼絕世」的胸懷，先能「以大事小」，所以才能領袖群倫。任何人想要為中國做

大事，應該記取歷史的教訓。孫中山熟讀中國歷史，以孔孟為師。他亦熟習美國歷史，以華盛頓林肯為師。他雖沒在德國、俄羅斯住過，但亦心儀馬克斯、列寧的主張。所以孫中山的學問和知識，兼收並蓄，故成其大。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裡，我們可以看見上列各思想家的精華。

外國朋友說，想不到孫中山建國的理想，如此遠大。他也說了一個故事。據說在六十年代初期，一個美國知名的記者在遊覽中國後，去拜會中共主席毛澤東，並說他對中國的文物地理、社會人情，有深刻的印象。毛澤東說，依你看來，中國最高的山是什麼？這位記者說了幾個名字，毛澤東只是微笑搖頭，最後他說，我告訴你吧，「中國最高的山是孫中山」。

我說毛澤東真能夠說出這樣稱讚孫中山的話，足見他對中國歷史自有深刻的理解，值得刮目相看。我向國內的朋友求證這件事，有一位學者說，他從前由中共內部的參考資料裡，似乎也看到這一段。事實上，多年來中國大陸對孫中山一直很尊敬，這是無可置疑的。如果這件事不是毛澤東所讚許，那是不可能的。

我深深的希望，兩岸三地的朋友，能摒棄意識形態和政治口號，以務實的態度來促進兩岸三地的互相了解及和平合作。即使是和平競爭，亦可以相互砥礪，相輔相成。二十一世紀將是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真正可以揚眉吐氣的時代。

我希望我們能時常靜靜地想，虛心地問，究竟我能為下一代留下點什麼？能為未來中國人做點什麼？問題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已給我們留下良好的典範。尊敬孫中山，就是兩岸三地和平合作的基礎，學習孫中山：「和平、奮鬥、救中國」唯精唯一、無我無私的奉獻，就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坦途。



# 兩岸合作的契機：變數與盲點

兩岸科技產業的交流，從1990年代初開始，十餘年來，已穫致豐碩的成果。然而在這些科技經貿交流的最基層——政治面來說，兩岸的關係仍然緊張。唇鎗舌劍、波濤洶湧的局面，時常出現。兩岸如要持續目前以經濟為主的交流，甚至提升到文化、教育、社會等層面及層次，我們必須針對可能威脅到兩岸總體關係持續的原因，作較深入及坦率的分析。不可諱言的，在海峽兩岸我們可以發現有幾種勢力在較勁，而使兩岸的前途充滿了變數。

## 分裂主義

所謂「分裂」主義，是指台灣島內部分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這些人士鼓吹台灣「去中國」化，在政治上與中國撇清關係，自成獨立國家。台灣島內持此主張的人，以激進派的民進黨人為代表，即所謂「深綠」派人士，在1980年代約為台灣人口的20%，到今天約為40%。台灣每次縣市長、議會或總統選舉時，「深綠」派最後都以制造統獨分裂、煽動省籍悲情為取勝撒手鐗。

這一派人士的主張偏激，不止在島內製造族群對立，亦在國際上尋求奧援。他們反對兩岸科技產業合作的深化，即合作亦緊守「根留台灣」的政策。至於合作層面的擴大，自然亦持反抗的立場。對於承認外地學生學歷，接受雙向留學一事，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地可說是理所當然，但在台灣便引起爭議，以致在國會殿堂中大打群架，就是這個緣故。

對這派人士一個重大的束縛是孫中山先生「中華民國」的大旗，這是他們在驚濤駭浪中的救生圈，但持之既非所願，棄之必遭沒頂。因為如果他們公然將台灣改名為「台灣國」，兩岸戰爭，將不可避免。戰爭的結果，台灣一島，亦必將成廢墟。所以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還是不得不把「中華民國」這個救生圈抱緊，這亦是對台獨人士最大的諷刺。

## 宗族主義

所謂「宗族」主義，是指大陸上思維極左人士，主張「中華民國」不存在；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為叛離的地方政府。即使六十年前雙方相互敵視，六十年後雙方並無正式來往；此中央對此地方之發展，並無貢獻，但此中央對此地方有宗主權的主張，則視同天賦。故為貫徹此一主張，縱然先予優容，最後終將訴諸武力。這一派人士對兩岸科技產業合作固然歡迎，但其高調形象及「老大哥」姿態，時常激發上述台獨主義者的氣焰，雙方的政治關係，自然愈為緊張。

這一派人士在大陸當權主流中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可惜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不深，所以在處理民族矛盾上的政策甚為短促，手段甚為粗糙。評論家練乙錚的指出的「經濟上給甜頭，政治上採高壓」極為傳神。

中國幅員廣大，民族眾多。五十六個主要族群，各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尊嚴、需求，豈能以一為尊。其實「柔遠人，懷諸侯」、「以大事小」、「繼絕世，舉廢國」，這是中華文化愛護同胞、尊重生態、追求和諧的精髓，不是一時的功利思維而已。

這派人士見不及此，遇到有關民族性或地區性的糾紛時，馬上疾言厲色，或掩耳不聽。不知道在全球化中，世界已經平坦化了，通信技術發達，民主意識高漲，人為的壁壘已不可久恃。這種理念的人士不但不能為政府排難解紛，有時反而埋下災難的火種。

即如在神權政治(Theocracy)的伊朗，伊斯蘭教大長老威權至上，但他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反埋下足以燎原的火種。看來無線手機及Twitter的技術，廣為人民的支持，伊朗處在民主化及全球化的過程中，好戲還在後頭。

上述兩大理念主張者相互對立，甚至劍拔弩張。台灣島內對大陸有真切了解及民族感情的，隨着人口組織的變遷，日益減少，亦漸失去在島內政治影響力。統一合作的基礎，日為脆弱。假如兩岸不能迅速在同種、同源、同文、同利的基礎上進行，而拖延時日，未來雙方的合作，更將事倍功

半。兩岸如兵戎相見，何異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甚而引起全球中國人的大爭鬥，如此則自顧之不暇，中華如何能在世界上崛起稱雄？

## 國際機會主義

國際上仍有不少人士，以台海兩岸之對峙狀態，為分裂中國最佳之恐怖平衡，並可從中取利。若干武器供應商，包括美、法、英、德、意、以、俄等，可對兩岸不斷提供不同的軍事產品及服務。又如日本極端人士，更希望縱惠台灣獨派成為日本的附庸，而作為與中國對抗的棋子。此類人士，固然屬於少數，但均擁有若干實力，對台海緊張情勢，極盡興風作浪之能事。

目前兩岸各有一些理念上的盲點，在不同勢力的操作下，時而成為棘手的障礙。主要的盲點有二，姑稱之為台灣的與北京的。

## 台灣的盲點

台灣的盲點在於對「一國兩制」主張的排斥。其實「一國多制」，是中國歷史的特色，亦符合孫中山的主張。中國自先秦以後，各朝代雖有天下共主，但朝廷或中央政府所能直接管轄的，方圓千里，各朝代均有不同。然而中央與地方州

郡，互相尊重，各取所需。孫中山在《建國大綱》明白主張，未來之國家，為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就是「一國多制」精神的表現。台灣大多數民眾，自可接受這種觀點。可惜「一國兩制」的名詞先為大陸所提出，在台灣獨立派的眼光裡，絕不能原封不動的接受。台獨派當權時，控制國家資源並可施加政治壓力，社會大眾，更是噤不敢言。

此後有關一國兩制或體制問題時，雙方如以「回歸孫中山」精神處理，互相尊重，當是合乎中庸之道的做法。

## 北京的盲點

北京的盲點在於對「中華民國」的不敢承認或不願承認。「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及革命先烈於1911年所建立，它是中國四千年君主統治政權的終結者，這是歷史事實。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廢除了清末列強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又由於此種領導，全國上下包括中國共產黨，對日本八年抗戰，終使日本軍國主義向盟國投降。這些都是歷史紀錄，不是任何個人或黨派所能推翻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後，「中華民國」雖然侷促台灣一隅，但仍在3.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300萬的人口中行使主權，延續由二戰後由中國眾多黨派協商訂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推動民主憲政。它的人民，擁有護照，旅行全球。它的科技、商貿、文化等活動，成為全球開發中

國家的典範，而晉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五十年的艱辛歲月裡，在極少的資源、有限的外助下，這種努力成果，應是中華民族歷史的光榮。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對「中華民國」的敵視或不敢正視，連新聞媒體也不敢正式稱呼中華民國的「總統」或「部長」。而在台灣的民眾及企業，為爭取在國際上運作的空間，不得不以「台灣」為旗幟，行之既久，形成了「一中一台」的狀況，無形中助長台獨的氣勢。很簡單的例子，是過去的二十年中，在許多科技性或專業性的國際會議中，大陸的與會者，時常要求來自台灣的專家不得稱為來自「中華民國」。北京這種要求，不止傷害民族感情，妨礙學術交流，亦迫得台灣的人士，形勢上不得不向「台獨」靠攏，加深了「一中一台」的分離。

我們常譏笑日本人不敢面對歷史事實，不敢正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導致今天日本年輕一代對歷史無知，亦引起許多外交、內政上的困境，而在全球化中喪失了領導地位。我們難道不該反躬自省嗎？

北京對「中華民國」的強硬態度，當然有它的立場和理論設想。然而時代已迅速改變，試想五十年前，雙方甚至以「匪」相稱！如果按照以前的思考模式，無形中自我設限，剝奪了許多反對台灣獨立的民眾的空間，最後的結果，是把台灣的民眾送上台獨之路。

「一中一台」情況的造成，北京過去的行為模式，自有相當的責任，這是歷史性的不幸。「為淵驅魚」，不知「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

總之這些時代性的悲劇，不應成為下一代的包袱。我希望北京仔細考慮，難道助長破壞性的「台灣獨立國」比接受歷史性的「中華民國」，對未來中國的統一大業更有幫助嗎？現在應是中國領導者表現政治智慧、民族寬恕、道德勇氣的關鍵時刻了。



# 兩岸合作的關鍵：塑造軟實力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

…胡錦濤

兩岸的和平合作，是中華民族在全球化中崛起的重要因素。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兩岸科技產業交流，已獲豐碩成果。台灣的企業，得到大陸人力、物料、製造環境的支持，增加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使台灣的總體經濟，得到了新的活力。大陸的新興科技產業，利用台商帶來的技術、資金、管理知識和國際市場網絡，走上了康莊大道，促進了大陸的現代化。雙方的交流合作，互助互惠，是一種「非零和」(Non Zero Sum)的「雙贏」(Win-Win)遊戲。

然而兩岸內部各存不同的理念、盲點及多種人為因素，所以未來變數仍多。上文所述的不同理念主張者相互對立，甚至劍拔弩張。台灣島內對大陸有真切了解及民族感情的，隨着人口組織的變遷，日益減少，亦漸失去在島內的政治影響力。統一合作的基礎，日為脆弱。假如兩岸不能迅速營造更良好的合作基礎，而拖延時日，過一兩代之後，雙方的合作更將事倍功半。

意識型態的爭議，終究要有政治性的大智慧才能解決，而不應變成科學家、工程師、專業人員等要做實際工作的人的負擔。根據上面所述，雙方應對所有有關國號名稱或種種意識型態的爭議說「暫停」，就是「Moratorium」或「Time-Out」。雙方了解並尊重對方的立場，先迂迴通過，往前再走一步。《禮記·學記》所說為學做事應「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就是這個意思。

兩年來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三通，逐步實現。政治氣氛的改善，兩岸已有多次的會面，討論多項課題，然而旁敲側擊，似乎未能有更新的進展。每次會談的主角們，都提出一些十六字箴言，大都撲朔迷離，充滿禪機。我看還是胡錦濤主席「擱置爭議」四個字最有積極的意義。

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誤解，不可能因分離或對抗而消除，互相刺激，只會加強抗拒。我們與其希求在短期內得到答案，不如保留一個「善意遺忘」(Benign Neglect)的時空，讓民族感情上赤裸的創傷能夠自然彌合。這應該是「擱置爭議」的真意吧。在一個和諧、容忍、尊重的環境下，讓我們思考如何務實的走出下一步，以免浪費寶貴的時光。

## 培育軟實力共創新機運

在未來的時代求發展，我們需要一些新思維。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歷史的軌跡是由西歐到北美而走向東亞，不知

不覺的已到了大中華區域。這次的移動特別加速，是因為美國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風暴，使得美國以及其他西歐國家招架維艱。支撐全球性經濟安定的責任，大部分就落在中國身上。這亦是中華民族的新機運。依我的觀察，這種時代性的機運，應包含幾個層面。

## 全球化中華企業新結構

第一，加速調整工業經濟的結構。利用兩岸具有的技術、管理、資金，盡速吸收國際上先進工業資源及能力，加以改良，提升其生產效率，而擴大在國際市場上的應用。舉例來說，中國的汽車年生產量，已達1,300萬輛，居世界首位，且將以30%高速率增長。此後的汽車生產，不應以「量」的增加為滿足，應加強「質」的升級，使符合低碳經濟及優質環境的需求。過去有許多先進燃燒、驅動、控管、材料、設計等技術，賦閑於歐美，未能充分利用，現時正是發掘運用的時機。此類機會，亦存在於電子、電腦、能源、資源、醫療、環境、安全等工業領域中。如兩岸推誠合作，以優勢互補，精選項目，當可去蕪存菁，加速全面經濟結構的升級，並把雙方的長程社會發展，推向另一高峰。目前兩岸三地在美國的龐大外匯存底，是美國國債的重要來源。由此可見，兩岸的安定、合作及發展，將可對全球人類的安全及福祉作出更多的貢獻。這項工作，應鼓勵兩岸企業為合作主體，政府提供政策及法規支撐。

目前若干大陸的企業，已積極在國際上尋求併購對象，最近吉利汽車公司(Geely)之收購富豪(Volvo)是一個可喜的例子。然而併購公司之管理及發展，將面對不同企業文化的挑戰。台灣的許多企業，對跨國運營已有豐富的經驗。所以兩岸如能加深合作，必可使「全球化中華企業」(Global Chinese Inc)的營運模式，推上一個更高的層面。

## 發展中華優勢科技

第二，科技進步，是全球化時代中知識經濟的原動力。兩岸三地在過去二十年發展過程中，已有許多驕人成果。現在是全球科技競賽重新洗牌的時刻，我們正可在若干領域中，如無線通訊、軟件設計、納米材料、特殊材料、航天科技、生物信息、傳統中醫藥、新能源技術、光電合一等，可以發揮獨特的優勢，開拓產業價值鏈上領導的角色。此項工作，應由兩岸適當的大學及科研機構為主體，政府提供研發資金進行。

## 中華軟實力企業文化

第三，歷史上社會經濟的發展，要能持續，必須有淳厚的軟實力為支撐，而誠信是企業及人類活動不可或缺的基石。美國、日本二十年來技術產品的起伏，提供了許多明顯

的教訓。檢討過去幾年來中國在全球社會的信譽，已受到毒奶粉、毒水餃、毒玩具、假藥品、假工具等一而再、再而三的摧殘。中國人傳統的「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誠信形象，已不復存在。中國土地上的人民，長期來寄託在在污濁的空氣、有毒的河流、頽廢的土地上。城鄉的差距，貧富的懸殊，日在擴大之中。而現時社會裡，腐化的官員利用特權貪污瀆職，肆無忌憚。台灣陳水扁的行徑，固然是犖犖大者；在大陸的各角落中，腐化的事例亦不勝枚舉。這些事例，廣泛為民眾所詬病，但政府似乎未能以霹靂的手段，肅清政風。這豈是有誠信負責任的政府所當為。所以不分兩岸，我們必須重振中華文化誠信為主的軟實力，才能使中華民族真正站起來。

中華民族是一個敬天知命，愛好和平的民族。《大同篇》裡「天下為公」的理念，亦可以說是民主制度的精髓。《大同篇》裡言簡意賅的闡述了一個民主而公義的社會。從選舉，立身、家庭，就業，老幼扶養、環境保護、公共服務、資源節約、建立社會安全網等方面，塑造了一個「和諧社會」的境界。這是中華民族所追求的共同理想，亦是具有中華特色軟實力的大成。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刻，亦是一個最好的時刻，更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 兩岸合作的願景： 從辛亥革命百年談起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宣告中國四千年君主政體終結，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事件。從這時開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出現了一個以人民為主的共和政體；不知不覺的，中國成為世界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推手。由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公元前五百五十年孔子所揭示的中國特色的大同社會，才得到一個實現的契機。《大同篇》中開宗明義的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那一百零七個字所描述的是一個崇高、具體、公義、和樂的願景。國家的政治、社會、家庭、教育、就業、弱勢族群、環境保護、社會服務、公共安全等政策方向都有很清晰的勾劃。大同社會，就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孫中山先生很顯然的受到孔子理想的啟發和感召，所以他領導同志，拋頭顱、灑熱血，不屈不撓，展開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運動。他們的目的，是要在這地球上建立一

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讓中國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法治、公義和富足。辛亥革命成功後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基石，以「民有、民治、民享」為棟樑，以「世界大同」和「和諧社會」為屋頂。可說是一個尊重人性，包容族群，天人和諧的國家藍圖。

中國近一百年的發展歷程中，是崎嶇而充滿着障礙的，真有說不盡的內憂外患，酸甜苦辣，時而山窮水盡，時而峰迴路轉。一直要到今天，辛亥革命的九十七年後，我們終於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曙光。

我的樂觀，並不是完全盲目的。因為在2008年這一年裡，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通過了三個重要的考驗。

第一個是民主化的考驗。台灣在今年3月20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中國國民黨以220萬票的差數，擊敗了民進黨，收回政權，把籍貫在大陸、出生在香港的馬英九送上了總統的寶座。老百姓告訴執政的集團說：我們才是主人，你如果不稱職，把國家搞得一團糟，就得下台！這其實就是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The People comes first, then the State, and the Ruler last)的基本精神。

回顧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慘淡經營了五十年，建立了民主化的基礎；蔣經國逝世後，內部分崩離析，因而在2000年被民進黨取代。然而，看著陳水扁民進黨政府的貪贓枉法，肆無憚忌，民眾實在忍受不住了，所以今年3月時如催枯拉朽似的把他淘汰，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就是現代民主政治

理論(Samuel P. Huntington, 1991)中的「二次政黨輪替」。中國人在民主化的路上，從此應該走上坦途了。這可說是以孔子「選賢與能」精神為核心，孫中山及革命先烈們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憲政的運行，透過台灣全體人民作了一個清楚的演示。所以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當政者，要好自為之。這句話，我願意奉獻給所有具有歷史觀和使命感的政治領袖。因此2008年在台灣的總統選舉，是中國人在民主化中的勝利。

第二件重大事件是9月27日神舟七號的太空漫步。太空技術，可以說是高科技的綜合代表。最先進的積體電路、電腦計算、衛星通訊、儀器控制、高級材料、空間氣象、星際活動、生化醫療、品質管理等等水準，都集合在一起。在太空上的操控，可說是差之毫釐，失之萬里；半招失誤，命在須臾。在那幾天內，我們看到幾個中國人能夠脫離地球的束縛，在三度空間中翱翔揮灑，令人驕傲亦令人神往。中國人很早對太空就懷著好奇和幻想，許多《西遊記》或《封神榜》的故事，數百年來膾炙人口。然而最早最著名的華裔太空人應該是嫦娥，可惜的是她到了月球之後雖能長春不老但再也回不了家。這次我們能把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三位送上太空，還把他們安全的帶回來了，這是中國人技術化重大進步的象徵。

第三件重大事件是北京奧運。孫中山先生在宣導「三民主義」的歷程中，多次提醒國人：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中，被泛稱為「東亞病夫」，被界定為「一盤散沙」，可說是我們的

國恥。然而，2008年8月8日在北京開幕的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很清楚的告訴全世界，中國人已具有世界一流的體魄技能，亦有世界一流的組織力量。這是一宗非凡的成就：中國不止能在許多特定競賽中取得金牌銀牌，更有全面的世界一流運動水準。除此之外，它不止能建設雄偉合格的競技場所，亦有大型的規劃、組織、運籌、執行的毅力和意志力，這就是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結合的表現。因此中國人不止可以參與國際性的大活動，亦可以做國際性大型活動的主人。

民主化、技術化、國際化是全球化時代的三個主流，亦是人類文明三個主要的推動力量。今天我們看到中國這三方面的重大進步，我認為和孫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所奠定的現代化的基礎有關。

展望未來，中國的和平及統一，應是中國人的共同夢想。然而在兩岸三地之間，仍然存在若干心理情結、意識型態、實務困難，需要一一克服。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及文化都有強烈的認同，然而他們在驚訝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就時，內心仍難忘懷60到80年代驚心動魄的「鬥爭哲學」及「文化大革命」的震盪。其實歷史性的創傷，是需要時間及持久的善意的滋潤，才能彌合的。現時的環境條件，的確是非常可貴的，因為在過去十五年兩岸民眾已經有相當深入的交流，亦了解孫中山先生理想的大同社會及和諧社會，已成為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追求。我從美國、台灣回到香港，已近十二年，對中國的前途，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樂觀。

看過北京奧運開幕典禮表演的人，知道中國借著這個機會，向世界傳達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是闡述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包括造紙、製筆、活版印刷術等，成為人類信息傳播和知識累積的重要方法。第二是宣揚中國人博大精深的智慧，遠溯自老子、孔子、孟子。冀求學而時習，講信修睦，懷遠柔來，天人和諧。我相信這些演出不是偶然的，而是與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決策指導有關。中共兩代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在許多場合中亦強調對台海兩岸和平統一的願景。所以兩岸中國人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尊重，已經在我們的腦海和內心深處，塑造了共同的價值觀。孫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就是跨越海峽兩岸共同的橋樑，這是我對中國前途樂觀的原因。

我希望在慶祝辛亥革命的歷史性時刻中，兩岸的朋友能够以友愛及包容看待彼此，以理性及常心處理時事，以信心及毅力規劃未來。彼此擱置爭議，笑看既往；相與為善，共創未來。我相信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中，將有更多更輝煌的成就。

註：本節摘自2008年10月10日在香港各界慶祝辛亥革命雙十節大會上的演說。

# 軟實力領導的典範



## 徐賢修：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先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宋·范仲淹

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從成立迄今已接近三十年，它孕育了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成為今天台灣經濟生存及發展的支柱。世界上盛名遠播的「台灣經濟奇蹟」中，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是一個重要的焦點，亦是發展中國家競相仿效的對象。

每當檢討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的歷程，尋求它成功的因素時，我第一個想起的總是徐賢修先生。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成功，今天看來，為理所當然。但是在三十年前，這是台灣前所未有的計劃，在全球亦少有成功的實例，如果沒有主持者大膽的設想、仔細的規劃、勇敢的鼓吹、堅毅的推動，它就會胎死腹中。徐賢修無私無我、不忮不求，應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父！

## 簷篠櫺櫺以啓山林

徐賢修先在北京清華大學畢業，到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攻讀數學博士學位後，應聘在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擔任教授多年。1970年間應蔣經國院長的邀請到台灣，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蔣希望他在科技及教育的崗位上，協助國家經濟的發展。當務之急，是希望以科技促進台灣工業的「脫胎換骨」。當時身為國家領袖的蔣中正和蔣經國兩位，對國家科學和教育的發展極端重視，但他們對科教施政的成績，遠不符國家的需求，是相當失望的，所以對徐賢修有高度的期待。

1973年徐兼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後，陸續到美、歐、日、韓等地考察科技發展的狀況，分析各地成功的因素，並印證台灣的需要。在1976年間，他建議成立科學工業園區，以吸引海外學人回國創業，並引進國外大公司投資生產，共同帶動科技產業的發展。這個建議，得到蔣經國的同意，即指示經濟部、教育部、國科會協同籌設科學工業園區，並由經濟部長孫運璿、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及徐賢修三人成立一個小組，協調各項工作的進行。即使這樣，工作的進行，遭受到很多阻力。

在1970年間，台灣十大建設正在進行，成效尚未彰顯，國家各項經費都很侷促，科學工業園區的構想一提出，馬上受到質疑，尤其是負責財政的官員反對的聲浪更大。大家對

政府要投進資金，徵收土地，遷移農民和駐軍，建築廠房，提供水電等等環節，都有爭議。有部長級政府大員說：「這個計劃，要政府出錢出力來營建廠房，幫助公司成立，等到公司賺錢了，政府還要減免他們的稅負。政府的支出多、回收少，這個算盤是怎麼打的？」一時意見紛紜，許多人認為科學工業園區計劃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

誠然，科學工業園區是一個構想，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將來究竟會有多少企業加入，成果如何，經濟效益究有多大，事先實在無法以具體數字來體現。其實凡事如果黑白分明，任何人不需努力，即可辨別取捨，而在錯綜疑難的時候，才能考驗領導智慧。所幸蔣經國以遠處大處著想，獨排眾議，這個計劃終於在1977年確立。跟着來的問題，是這個有關科技工業發展的基礎建設及管理，應該由哪一單位來執行？當時許多部會，覺得這是個燙手山芋，有些不敢接手，有些不願接手。最後只好交給提出計劃的國科會，而徐賢修就挑起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敗的責任。

## 先知的風範

我原在美國杜邦化學公司服務，主要從事高分子產品之研發。1978年夏天應聘為國科會客座教授，到清華大學服務，並出任清大工學院院長。在這個期間，因為我負責電動汽車的研究開發計劃，和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認識了，而

且有許多機會討論，彼此都有執著的脾氣。當時科學工業園區的構想已經在逐步推行中，報章時有所報道，但我對它可是諱莫如深。有一天，徐先生來電邀約一起去看園區，我興高采烈的坐上他的車子，一起往竹東馳去。

車子過了高速公路交流點之後，很快就轉入了泥巴路停下。我們走上了崎嶇小徑，經過一堆堆的荒煙漫草，來到一處小山丘。我登上一看，周圍都是稻田，遠處還有軍營，哪有「科學」、「工業」、「園區」的樣子？我轉身問徐先生：「園區在哪裡？」他說：「就在這裡！」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臉上帶著笑容，眼光充滿自信。儘管周遭是一片田野，但科學工業園區的形狀及生態已經勾劃在他眼前。他的語氣非常莊嚴，那種成竹在胸的篤定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當時不知道他周遭所產生的激烈的政治阻力，不能體會他内心深處的煎熬。

接着我們找到一個地點小息，他攤開一份構想設計圖，上面標示了園區首期的分區及設施的相對位置。我們談了一會，我說：「園區要吸引海外人才，這些人的年紀大約四十歲上下，多數人的孩子還都在中、小學階段，我們必須幫助他們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子女如不能好好的上學，家長們必不能安心的工作。」他說這事將來可與台北或台中的美國學校合作，以通學或設立雙語分校的方式進行。我說雙語學校應該設立在園區之內，以便利家長照料，而減少他們的後顧之憂。又說這是一個優先的問題，不宜延後處理。他想了又想

說，既然這樣，我們也許可以先在人工湖附近，建立一座實驗學校，以雙語教學。後來實驗中學在園區內正式設立了，但它性質特殊，無例可循，許多問題，如：立案、經費、管理、級別、師資、招生，分班等，都需要特別處理，不是地方政府或教育機構所願意主動解決的。所幸歷屆管理局主管，在國科會責成下，責無旁貸，逐一排除困難。實驗中學日後也成為園區一個重要的賣點，有助於吸引人才及資金。這雖是一樁小事，但可見徐先生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廣徵建議，從善如流的態度。

這個時候，我和徐賢修的認識雖然不深，但多次見面談話。我的本職在清華，對於園區的進行，只是從旁觀察，沒有直接參與。間中亦出些主意，並透過專家的討論，作成建議。徐先生告訴我，由於經費不足，建設園區的構想要分期執行。實際工作的起步，幸好有當時台灣省主席林洋港，以及國防部長宋長志的協助。因為建設園區首先要解決的是土地及地上物賠償等問題。當時各方面的阻力很大，但由於林洋港的積極負責，所以農地徵收、農戶安遷等工作，才能進行。加上國防部的配合，第一期五百公頃的土地問題終告解決。

除了土地之外，建設園區還有很多外人所不能體會的辛酸。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能認同願景的團隊。當時的局長由國科會副主任何宜慈擔任。何先生在IBM服務多年，是電子界資深專家，處事非常圓熟。然而園區初設，千頭萬

緒，有關科技管理，企業合作的事，大大小小，真是百廢待舉。徐主委由於看到我在杜邦公司服務，科技界的朋友亦多，所以徵求我去擔任副局長。我因為先有回去杜邦的承諾，不能食言，無法即時接受副局長一職。所以後來他在積極的徵選下，請到了李東陽、童虎等，他們都是能力高超的一級戰將。特別要提的是李東陽，他本來在加州斐士諾大學教書，是一位城市規劃的專家。回台之後，為了園區的事，經常奔波於美台之間，十分辛苦。不料在某次奔赴加州公幹中，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是不幸為園區捐軀的第一人。但政治無情，現在園區裡，政府裡記得李東陽貢獻的人，還有多少？不要說社會大眾了。

園區的發展，歷任局長、副局長如何宜慈、李卓顯、童虎、李東陽、陳履慶、楊世緘、薛香川、童兆勤等諸位，功不可沒。管理局裡高手如雲，如何希淳、童琪等等亦都是一等人才，他們到園區的服務，都與徐主委的精誠敦請有關。

## 園區成功的因素：軟實力的領導

我認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徐賢修的軟實力領袖風範。其中包括兩部分，一是他的遠見、魄力、誠信與熱忱。沒有他的運籌帷幄，堅韌不拔，園區構想無法付諸實現。二是他的禮賢下士，求才若渴，否則我們亦不會看到園區內群賢畢至，士氣高昂的盛況。

徐賢修對於用人，以我的觀察，有幾個要點。一是知人善任，用之以專；二是只看長處，不看短處；三是對事不對人。所以他能建立一個優秀的團隊，人盡其才。

其中一個實例，是當時國科會國際合作處長王紀五。紀五兄才氣橫溢，交遊四海，縱橫捭闔，人所熟知。他曾告訴我說，他小時候寫字常跑出格外，因此受長輩叱責，但他習以為常。他跟徐主委做事很愉快，因為徐主委對他不按牌理出牌的習慣，能充分包容。國科會裡當然亦有像張明哲先生的慎言謹行，循規蹈矩的。我個人在清華大學推行電動車發展計劃時，和徐主委意見時有相左，但他對我是信任不移。最後我甚至把電動車的商業化離開清華，另由產業界接手，而大學只從事基礎性的研究與開發。幸而國科會最終還是支持這個作法。

園區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是蔣經國的支持。籌建園區困難重重，徐賢修感到很大的阻力及壓力，但卻從來不會失望，蔣院長的信任支持，是重要原因。1980年12月15日，科學工業園區正式開幕當天，許多政府首長因故不能參加，但蔣經國卻親自蒞臨。那天他與徐賢修坐著電動車繞場一周，以行動表達他對科學園區的支持與期望。蔣經國在談話中說：「整個園區的構想，乃是學術研究和工業的創新與生產力的提升。」這種前瞻性的思維，就是蔣、徐兩位對台灣工業「脫胎換骨」構想的基礎。

園區成功的第三個因素是政府措施的配合。在這方面，行政院院長孫運璿的領導是非常重要的。孫運璿早在經濟部長任內，為了「加速工業升級」，成立了「工業技術研究院」，此後工研院終於變成科學工業園區重要的伙伴。在園區籌備的階段，他是三人小組的成員，後來在行政院長任內，推動多項國家性重點科技，這對科學園區，有很大的先導作用。另一位需要說明的是李國鼎先生的角色，外人常有所混淆。在科學工業區計劃正式啟動的時候，李國鼎已由財政部部長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負責協調各部會的科技方案，協助訂定國家重點科技、獎勵措施及有關法令，塑造外商投資與海外學人創業的誘因。所以他對園區是一個輔助的角色。但種種政令如風險投資的發揮對園區後來的發展，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園區成功的第四個因素是園區裡的青年企業家。當然「獲利」是各家公司創業的主要動機，在創業過程中不屈不撓的精神，才是企業成功真正的關鍵。今天園區裡的龍頭企業，如聯電、台積電、台揚、盟立、華邦等等，成功之前都是經過一番辛苦的奮鬥。這些企業家，大都是工程師出身，半路出家，下海經營。他們都有過人的智慧，加上充分的毅力和敬業精神，終能利用政府所提供的環境，創造一番新天地。

第五個因素是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成立的宗旨在協助企業提升技術能力，舉凡新技術研發、轉移、技術人才及

領導人才的培育，工研院均扮演重要的角色。1990年初曾經有一份統計：在科學園區裡，百分五十以上的產業與工研院建立了技術的關係。園區裡電子、電腦、光電、材料、精密機械的主要公司許多都由工研院的院友所領導。我每次到園區參觀，每個公司，都有老朋友來握手言歡。

第六個因素是園區周邊的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所培育的畢業生，是園區各公司重要的生力軍，加速了科學園區的成長。工研院和清華、交大，可以說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技術的「活水」。

第七個因素是現代化的服務。徐賢修創設科學工業園區時，他認為要達到園區的功能，政府必須實事求是，提供對科技產業有效率的服務。他採取了加工出口區的模式，成立了管理局，使政府有關單位能夠「合署辦公」，以增進效率，而以「新、速、實、簡」為服務的指標。「新」是創新，服務高科技產業必須具備創新的觀念；「速」是快速，要迅速解決問題，不能拖延；「實」是實事求是，不要空談；「簡」就是簡單，為企業提供簡便的行政程序。

## 實例回顧

記得1980年代園區開動的初期，那時個人電腦還未普遍流行，辦公室機器如複印機仍是奢侈品，即使政府機關對這些奇型異巧仍在將信將疑的階段，不要說法律上的地位。有

位園區內的企業朋友向我抱怨海關所給他的困擾，起初我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引進高新企業，本是政府的施政重點，如何不給企業方便呢？經過一番解釋，我才了解原因。原來設備或零件進口當然都要經過報關的程序，而報關用的表格是財政部專用的大號一式五聯單，必須用複寫紙來逐項填寫，一份文件厚厚的連複寫紙有九頁之多，無法打字，但海關執事人員不接受以A4紙影印的表單。他的公司製造通訊產品，零件種類繁多，每日進出的數量多以萬計，為了應付海關的要求，不知道要用多少人手，可以說傷透腦筋。後來我在一次與園區有關的行政會議中，向財政部長官談到這個問題，立即獲得他們的回應。不但此後零件計件的方式可改善，亦改變表單格式，可以用電腦印表取代，當然包括用複印機了。這就是「新、速、實、簡」精神的表現。園區的成功，其實靠多種關鍵因素組合，現在說來，真像白頭宮女說往事！

另外有件小事也可看出園區與周邊機構配合的重要，工研院屬於大科學園區範圍，任何土地的處理均須向園區備案。1980年代後期，由於園區已經成為高科技產業聚集的地區，周邊的低價地隨之高漲，成為園區擴展的瓶頸。當時，工研院東側有塊很小的畸零地，我們希望能收購後做完整的運用。但是地主因奇貨可居，開出了天價，而且還有民間代表來關說。那塊畸零地只有幾畝，是我們整體規劃的一個痛腳，我是工研院院長，本可以忍痛答應他的條件收購，但我們考慮到工研院與園區的關聯性，一不小心，無形中會在土

地高漲的態勢中火上加油，加深園區發展的困境。因此在說服地主降價無效之後，我們決定放棄。由這點也看出工研院與園區唇齒相依的關係。

## 功成身退

徐賢修對科技產業的貢獻雖大，但他的仕途發展並不順利，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的書生風格，不能與朝中巨室妥協。一般來說，徐先生常是單槍匹馬，義之所在，勇往直前。得罪的人，自亦不少。他所帶領的團隊，大部是科技工程人員，只能站在各自的崗位，默默做好各自的工作，少有相互奧援的習慣。他的幹勁雖大，但要撼動幹高葉茂、根深柢固的官僚勢力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他終於在1981年向蔣經國辭去國科會委員之職，並準備束裝回美國。當時科學工業園區已經正式營運，各種規範，都已建立，相信此後自可步上坦途。他的決定，許多人都非常詫異。但他不願因個人的關係增加蔣總統的困擾，所以辭意堅決。蔣經國挽留不得，最後說：「國科會你可以不做，但工研院是要繼續負責的。」所以徐賢修仍擔任工研院董事長，推動高科技的研究和轉移。他對台灣科技產業的貢獻，始終如一。今天以500公頃的土地，產生了台灣10%以上GNP的產值，不可不說是一個奇蹟。

蔣經國總統逝世後，他因知音已去，自覺意興闌珊，不久亦離開了他摯愛的台灣，回到普渡大學定居。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政府對他的虧欠，他始終是淡然處之。因為站在報效國家的立場來說，他得到了寶貴的機會，亦盡了他全部的心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讀書人的風範，就是如此。政治固然無情，公道自在人心，在我們這群一起走過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歷程的同仁心中，徐賢修是不折不扣的科學工業園區之父。

2001年8月中，他的公子徐復生、徐遐生教授及親人，在拉斐葉市舉行了一個宴會，慶祝他的九十歲壽辰，但普渡大學的朋友們一知道了，很快海內的親朋故舊亦知道了。那天遠道而來的朋友，有馳名國際的數學大師麻省理工學院林家翹教授夫婦、聖他巴巴拉加州大學校長楊祖佑教授夫婦，各地學人碩彥，如楊復生、唐仲英、黃中孚、蕭台戈、蕭政、劉中鴻等等五六十人，真是冠蓋雲集。新竹清華大學由王天戈教授代表，頒贈國立清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工研院由孫章博士代表，致送紀念品，我和長女林安之參加了這次盛會。徐先生看到了安之，非常高興，亦大吃一驚。他說：「上次見面時你是中學生，現在已成了大教授。」我說：「當年你所配置的小小公司，許多已經成為世界企業。」大家相顧而笑，非常安慰。

新竹科學園區同業工會的理監事長曾繁城、孫弘兩位，代表所有同業，向他致送一個由十二吋晶片製作的紀念品，

別出心裁，表達同業對他篳路櫟櫟創立園區的敬意。我想起老子所說的「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又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用來說明徐先生，應該是很確切的。徐先生與夫人舉案齊眉，同享遐齡，桃李滿門，德風遠被。在今天的社會中，像他這種學者典範，實在是鳳毛麟角。楊祖佑教授說，徐先生是「兩袖清風，富比天下」，亦可以說是對這位「智者樂，仁者壽」的愛國學人非常恰當的評語。

參考：林垂宙〈台灣科學工業園區之父——徐賢修教授〉，  
《傳記文學》第七十九卷第五期，台北，2001。



## 孫運璿：立足台灣胸懷中華

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宋·張載

1950年代，台灣的經濟仍然以農業為主。到了1960年代，逐漸進入輕工業時期，而以勞動力密集、家庭式管理、小中型規模為主要表徵。此後的三十年裡，台灣的工業突飛猛進，逐漸轉變為科技型產業，到了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經濟力量已有長足發展，儼然成為亞洲經濟體係的「四小龍」之一。造成這種成功的因素很多，政府裡有關科技產業的領導階層，有重要的影響。從蔣經國開始，孫運璿、徐賢修、吳大猷、李國鼎、趙耀東、陳履安、何宜慈等，都有各自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不敢亦無意為孫先生寫傳記，只是描繪個人對一位偉人的觀察。從我個人的經歷中，回憶孫運璿以軟實力領導的風範，及對建立台灣的創新機制的貢獻。

孫運璿出生於山東省蓬萊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後，一直在電力公司服務。到了台灣之後，歷任台

灣電力公司總工程師、總經理，交通部長，經濟部長，行政院長。他在1978年春受任行政院院長後，不過半年的光景，美國卡特總統就宣布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這個時候，全台灣面臨一個嚴厲的挑戰，風聲鶴唳，人心恐慌。孫院長協助蔣經國總統，以「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堅定和毅力，採取了多種重大措施，把台灣的局面穩定下來。許多科技產業方面的興革，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實施。重大的如：開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強化工業技術研究院、推動國家重點科技、推動資訊工業、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等等。這些重要的措施，可以說為台灣奠定了工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基礎，亦提供了台灣未來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條件。所以這卡特事件，對台灣而言真可以說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孫運璿當時說了一句話：「今天不做自由鬥士，明日將為海上流民」，這是何等沉重和豪壯，到今天仍深深感動人心。全台上下，深信孫運璿是蔣經國最得力的助手，當是未來國家領導的不二人選。

不料在1984年的2月，孫院長腦溢血驟發。一夜之間，一個在政壇上生龍活虎，如日方中的強人，毫無徵兆的突然頽萎了！這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這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大的轉折，不得不歸諸天數！

孫運璿從這個時候開始脫離了台灣的政壇。他的生命雖然保全了，但是手足的功能終究沒能完全恢復，大部分的時間局促在輪椅上。然而他憂心天下，關懷社會的心情，從來

沒有改變過，甚至可說比以前更為熱切。他看到國事蜩螗、江河日下，而自己完全不能著力，無可奈何的無力感，給他帶來無比的煎熬。朋友們和他見面，常常為他眼中的淚花所顫動。我在這個時候追憶那段交會的日子，回想幾件發生在個人身上的事，更深切體會到孫院長思慮的精深、瞻顧的恢宏，感情的真摯和人格的偉大。

## 台灣初識

我和孫先生真正交往的開始，應是1977年8月。那時我在美國杜邦公司從事高分子科學應用研究，獲邀出席當年的國家建設研究會會議。出席會議之前，知道這次會議的重要性，所以事先做了一番思考。我覺得台灣在資源極度短缺、情勢非常緊迫的情況下，應以科技研發為求生存謀發展的重要策略，並應以國外的企業發展策略和歷程為借鏡。

國外的大公司，無不投入鉅大的金錢和人力以改良新產品和新技術。行之既久，成果累績，自可在國際市場上贏得獨特的地位。而台灣的企業在研究發展的投入，可說是微不足道。當時全台灣投入研發的費用，一年不及一億美元，僅與美國研發排名第十五名的柯達公司相當。所以我先搜集了當時美國研發上的資料，包括：汽車、通訊、化學、資源、機械、電子、電腦、塑膠、電力、航空和藥品等產業及公司的研發和營運等。我在分組會議時做了一個報告，並提

出個人的一些分析。當天正好是孫部長本人當工商企業分組主席，他全程參與，全神貫注，並提出很多很有意義，而且深入的問題來討論。他完全同意產業科技研究對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亦指出國內的特殊環境和困難。他說台灣百分之九十七的企業都是中小型，營運非常艱苦，所以政府對產業技術的研究開發應該扮演先導者的角色，增加業界的信心，發揮領導的功能。我很佩服他的務實和高瞻遠顧。

這次的國建會，對我此後的職業生涯，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在會期及此後的交流中，結識了經濟部的領導人如韋永寧、蕭萬長、虞德麟、江丙坤、徐國安等，領略到他們各自的精明強幹及整體的團隊精神。我對孫部長尊重部屬、順從專業、包容異見、周延歸納的領導風格，得到了較深的了解。我和他在會中會外有了幾次懇切的交流，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共識。我雖然已在杜邦工作十年，畢竟出道未久，即有一得之見，識聞終究有限。但是孫部長不耻下問，求新求知的誠心，深深感動了我。

1978年我到清華大學（新竹）擔任工學院長的時候，原來由老友毛高文院長所領導電動車的研發計劃已完成了雛型車的設計及試用，正在籌備進行一百輛試製，為未來進入商業化作準備，這個超大型科研計劃，便由我接手。各分項計劃的主持人，如萬其超、黃光治、陳文華、王國明等，都是非常傑出的科研人員，已先由毛院長精心挑選。這個項目，極具前瞻性，可說是超時代性的，是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原

清華大學校長)所積極支持的。因他的規模龐大，亦是一個行政院列管的項目。我原在杜邦公司有過科研商業化的經驗，對與汽車工業亦算熟悉，覺得電動汽車產業化的路很長，遠景雖然光明，過程實在崎嶇。主要是電池技術尚待突破，除此之外，還要做市場、生產、物料、安全、品質、維修、服務、財務、競爭力等等的分析和管理，可說是千頭萬緒。這些都超出學校的任務及資源所能支持的範圍。所以這樣規模的中程試驗，應該離開大學，改由企業界接手。學校應集中致力在前期研究，如電池、傳動、材料、控制等技術課題上。

我的概念和國科會原來的設想有些不同。當時的考慮，是企業界無此能力，權責亦不能集中，所以還是由清華大學一貫負責做下去的好。經過我多方陳說，各方共同分析後，意見暫趨一致，徐主委終於同意這個想法。所以電動車試製項目外移，清華大學研究的重點，轉向電動車上游發展。

徐賢修主委原來對我並不認識，從這個時候開始，他頗贊許我的坦白和固執，此後亦對我曲意包容和提攜，變成我二十五年來非常敬佩的師友。電動車計劃孫部長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我所主張的轉變，包括大學與企業要合作亦要分工的必要性，閒談中曾和他討論到。他站在整體經濟發展的立場，完全贊同這個看法。

1978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中美斷交的決定，可說是向台灣丟下一個政治炸彈。清華大學的劉國雄、陳力俊、萬其明、施漢章等幾位教授，倡議為了加強國防工業的技術能

力，應在大學發展合金鋼真空冶煉技術。我們討論多次，參考了多方的意見，最後作成建議，向國家研發基金提出，經過多次審議，最後提向行政院特別會議報告，申請撥款新台幣2,000萬元，在清華大學成立合金鋼實驗室。這時可說是台灣國際情勢危疑震撼的時刻，這個數目，當時在學界，可說是天文數字，材料界的同仁，由北到南，對這個重點項目，同感興奮。

當行政院特別會議最後討論提案時，孫院長聽完簡報後，他說「清華大學這個計劃構思很好，目標很重要，時機亦適合，團隊以往亦有很好的成績，但是照所提出的來看，恐怕不易成功」。大家聽了，一下默住了，全身好像泡在凍水裡。他接着說，一個合金鋼真空冶煉的技術非同小可，需要相當大量物料及時間試車試用，才能找出最佳實用條件。可是原計劃所提出的，低估了試車的經費和時程。最後他在這個計劃，自動增加了百分十幾的預算，以免功差一簣，教授們要臨時到處「化緣」。與會的同仁，可說是喜出望外。這種主動為研究人員設想、先加預算的作法，除了孫院長之外，我沒看到第二位。亦可說只有一位真正能實踐力行的工程師，才有這種洞察機先的能力。這是孫運璿的慮遠思深和對人的真誠關懷又一例子。

## 工業技術研究院

1980年我在台灣客座期滿，必須回美國銷假。國科會徐賢修再三鼓勵我回到台灣長期服務，並在國科會內找了很多不同的機會給我選擇。我和內人馬文松考慮再三，因一雙仍在稚齡的小兒女的教育問題，遲遲不能決定。1982年，徐主委親自枉駕紐澤西舍下規勸，情辭懇切。當時我因已在杜邦公司工作滿十六年，個人的想法是再過兩年即符合提早退休的條件，另一方面大女兒安之也將進入大學，我自可安心地回國服務了。

我見到孫院長談回台的問題，他誠懇的說：「一個人做事最重要的是要看時機。你如果要回來為中國人做事，那麼是越早越好！」又說：「工研院正成立工業材料研究所，正在找所長，我替你答應這個工作好不好？」我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實在無法推辭了，所以跟家人說，準備搬家吧。像這樣的結束在美國優渥的生活，轉到遙遠動蕩的環境，減少過半的薪水，隨時還有戰火的威脅，許多中外朋友，都覺得這個人真是獸子一個，紛紛給我虔誠的祝福。我對兒女們說：「我不顧一切，有背常理。但實在因為身上流着中國人的血，不能自己。下面二十年，是中國發展的契機，我不願意在這個關鍵時刻，留着空白。你們將來就會懂的。」一家大小，一直都很支持我，使我非常欣慰。

## 材料科技發展計劃

1983年夏天，我終於回到台灣。行色甫定，就去拜望孫院長，談談材料科技發展的方向。孫院長說，材料是工業的基礎，工業產品的使用價值大都由材料的使用來彰顯，所以材料科技對整體產業的發展，有基礎性的影響。他希望我能研擬一份關於全國工業材料科技發展的計劃，透過重點科技專案提出到行政院報告。

我當時心中有個疑問，台灣的產業界對材料科技的認識相當薄弱，工研院似乎應該以即時幫助產業界為優先，但這樣會忽略了一些前瞻性和長程的目標。如何選擇呢？孫院長說：「材料所現在應當要幫助產業界，但有一天產業界已能自行開發技術的時候，材料所將置身何處？所以長程研發不能放棄，材料所應保持領導的地位，經常帶領企業界不斷往前走。」此次的深談，使我看到他的深遠眼光和宏觀思維，他是要求紮根的人。根要植得深，樹才能開花結果。一般政府領袖常常要求「立竿見影」，不知道科技研究不是立竿，而應是種樹。

這次見面之後，我再請教了許多科技界與產業界的泰斗及先進，包括李國鼎、閻振興、何宜慈、唐君鉑、趙耀東、吳伯楨、桂體剛、魏傳曾、莊以德、董世芬、王國琦等。我又邀請許多清華、台大、成大及國外材料界的學者朋友，包括美國的李振民、卓以和、蔡維嵩、田增英等大師，協同研

擬材料科技發展計劃。我們訂定了三個發展的重點，這是後來工業材料研究所的三個目標：(1) 協助解決工業界的材料瓶頸；(2) 以材料科技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3) 開發新的材料技術工業。

這個計劃準備妥當，已經是1984年初，就在我準備安排去行政院做報告之前，孫院長病倒了。材料科技計劃幸因他的前期指導，雛型已定，勉可執行下去。1987年孫院長康復到可以外出時，他首先到工材所來視察。他在輪椅上看到各項計劃如超合金、碳纖維複合材料、發光二極體、工程陶瓷、金屬腐蝕防治等，都和工業界能緊密掛鉤，非常高興，頻頻向同仁說「謝謝你，感謝你的努力！」同仁都衷心感動，孫資政在這種健康情況下，還是論不及私。看他這種愛國的情操和關懷的真誠，許多同仁都忍不住流下眼淚。

## 嶄新的創新機制

1988年秋，我奉命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職務。我為此去看孫資政，他非常高興。工研院原是1972年他在經濟部長任內創立的，目的在加速工業技術的提升。它是以一個財團法人的組織，去執行國家研究院的任務。這種模式，不要說在中國是創見，即在世界，亦很少有同樣的範例。這種前瞻性的構想，當時在立法院遭受很大的阻力。許多勇於監督政府的諍友，以張子揚委員為首，提出許多質疑。政府此

舉，是否有「私相授受，圖利他人」的嫌疑？張立委素以風骨嶙峋見稱，還是孫運璿的老朋友呢！經過孫部長等的反覆申述及保證，立法院終於通過成立工研院的法案。但要求工研院每年必需將工作計劃、預算、決算及執行報告，由主管機關呈報行政院，轉送立法院。這是此後每年預算審查時，工研院院長必須在立法院會中，敬陪末座，以備質詢的緣故。

我對這個任務是充滿信心的。凡是開創性的興革，終免不了有批評。西諺有云，一個先驅者的背上，時常插滿了箭刃。工研院的構思，要從科技成果產業化來看，很自然的會發現他「定位」的真義。所以工研院定位的說明，是我就任院長後第一注重的事。

科學研究結果的產業化，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它需要許多機構和個人的通力合作，才能做得成功。在這個產業化的過程中，工研院站在大學與產業界的中間，發揮連繫的作用。它應是把科學研究轉變為工業技術的機構。簡單來說，大學的責任是研究科學，工研院的責任是開發技術，產業界的責任是生產銷售，加上政府的孕育營商環境，這四方面構成了國家創新體系。在這體系中，四方的互動關係，成了科研成果產業化成敗與否的關鍵。我把這些看法向孫先生報告，他聽了之後非常高興，覺得原來的構思，可以得到持續的推動。我亦感到責任特別重大。

我在兩任院長任內，把努力的焦點放在「人」上。我自覺個人的能力有限，任何個別的高新技術，可由研究所所長或

中心主任去推動，他們是技術專家。院長的責任是「人」。他要建立制度，確保全院在選人、用人、留人的合理化和企業化。使人盡其才，才善其用。所以我的工作有兩個重點。第一是透過強化研究團隊、組織、制度與環境，發揮個人的潛能。第二是把工研人帶到工業界去，以發揮工研院的效益。

孫資政建議要向社會多宣導工研院的任務、定位、角色和績效。所以我常常提出「產、官、學、研」四方合作的模式與文字，這和以前泛稱的「產、官、學」有別，而突顯「研」的重要。另外一個重點是激發社會對工研院職業精神的尊重，我提出「創新、團隊、尊重、勤奮、奉獻、卓越」(ITRI 第一)作為工研人行為的規範。

我在工研院服務近十二年，正是台灣科技產業發展最迅速的時段，許多以前沒有的產業，如微電子、電腦、光電、無線通訊、電腦周邊、工程材料、複合材料、特用化學、自動化、精密機械、能源資源、環境保護、工業安全、醫療器材、生物技術等等，都一一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台灣的經濟起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台灣的技術創新能力，受到國際的稱譽。工研院由於同人的努力、產業界的配合、政府的支持和社會的督促下，對台灣的經濟的轉型與社會的改革，以至於兩岸科技產業及未來的發展，發揮了若干積極的貢獻。相信歷史自有公斷。這是我個人職業生涯很可回憶的一段，未來將再為檢討。

大凡外界批評工研院工作不力、效益不彰時，我常是敬謹受教，但凡是泛泛的毀謗工研人的職業規範時，我一定據理力爭。記得在1990年初的一次立法院預算委員會中，我和兩黨的某些委員，發生了火爆的爭論，我絕不接受不負責任的漫罵。媒體自然廣為渲染。孫先生在事後聽我的說明後，眼眶裡含着淚水，只說「要忍，要忍」。當時我心中自覺委屈，頗不以他的勸告為然，仍然是我行我素。等到多年以後，才領略「忍字心上一把刀」的意思，和孫先生別話不說的涵意。其實在孫先生的輝煌歲月裡，亦有極多不得不忍的時候，可是他總是保持緘默，泰然置之。「有容乃大，能忍自安」，這亦就是他處世待人的風誼。

## 工研院二十周年院慶

1992年春天，為了慶祝工研院二十周年院慶，我們決定以學術性研討會為綱要，邀集世界上與工研院相類似的一些研究機構的領導人來台，以「國際工業技術發展與技術轉移」為題，互相交流經驗，以收切磋之功，亦可宣導工研院在國際上的地位。會議在台北中央圖書館舉行。受邀來台的有瑞典皇家工程院院長福士伯(Hans Forsberg)、荷蘭國家技術組織總裁高斯特(M. Gerst)、德國佛蘭豪爾研究總裁賽波(Max Sabre)，美國阿崗國家實驗室主任史萊森(Alan Shriesham)、美國貝爾實驗室主總裁梅玉(John Mayo)、南非應用研究院院長克

拉克(Brian Clark)、澳大利亞工研院總裁史多克(John Stock)、新加坡工業標準及研究院總裁邱利明、日本通產省工技院前院長飯塚幸三等。他們對工研院的模式及成就，至感興趣。孫資政和他們交談，極為快慰。在慶典中孫先生看到了許多工研院的老友，如郝履成、馮大宗、桂體剛、鄭國賓、顧光復、胡定華及一些新秀如邢智田、盧致遠、林敏雄、李立中、李鍾熙等，非常高興。孫先生跟工研院的同事在一起，最是無牽無掛、輕鬆瀟灑。曾有人打趣說工研院就像孫資政的第五個兒子，其實說孫運璿是工研院之父，是理所當然，實至名歸的。在過去三十年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歷程中，有些人可稱大亨(Tycoon)，有些人可稱教父(Godfather)，不一而足。我個人的看法，只有孫運璿真正可稱「台灣科技之父」。

美國紐約理工大學(New Yor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t Brooklyn)是歷史悠久、成績卓著的研究型大學。他們為了表揚孫運璿在交通部長、經濟部長、行政院長期間，為台灣創立各大建設方案、工業化電力系統、推動積體電路工業、組織工業技術研究院等貢獻，決定在工研院二十周年院慶的同時，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典禮在「國際工業技術發展與技術移轉研討會」開幕式中舉行，由校長博里瑞樓(George Bugliarello)博士親臨主持。孫先生在接受學位時，向與會貴賓致辭，特別感謝工研院同仁。看來他很高興工研院得到國際級專業人士的認同，我和他說，這個榮譽博士學位，是他給他兒子二十歲生日的最好禮物，大家相視而笑。

## 兩岸科技交流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一直都是我們極端關注的課題。從蔣經國總統允許退役老兵訪問大陸後，許多廠商便紛紛西進。中小企業原來要遠走非洲或中南美，以求生存謀發展，驟然發現大陸與台灣只有一水之隔，同文同種，血濃於水。不但市場龐大，而且資源互補。大陸於是成為企業國際化的主要對象。許多著名的工業界巨頭、本土化大老，如台塑王永慶、長榮張榮發、奇美許文龍等更是見機而作，身先士卒。

自我接任工研院長之後，許多企業家的朋友，表示希望工研院的協助，針對他們在大陸發展的需要，做一些企業策略規劃，以達到產業發展，互惠互利的結果。我們在「國家統一綱領」頒布前，與大陸科技界的來往已很頻密，但都局限在個人及所的層面。工研院的六個研究所、五個研究中心，對大陸已有技術性的接觸及了解。國統綱領發布之後，我們覺得工研院應比其他官方機構，更可發揮協助台灣產業的功能，所以積極的進行一些聯繫工作。

1993年中我應第三世界科學院之邀，前去意大利翠士廸(Trieste)開會，並接受國際技術成就獎，正好和北京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先生見面。所以我當面邀請他來台灣訪問，他即欣然接受。當然接下來有許多技術性的困難待解決。中科院是中國的最高研究機構，周院長本人是群倫領袖，如何突破雙方現實的障礙，達成破冰之旅呢？

我回台灣之後考慮再三，與老友《工商時報》發行人余範英商議，復得中鋼公司董事長王鍾渝的協助，決定以三個機構合作的名義，舉辦「兩岸產業科技學術會議」，邀請周院長以學者身份，在會中發表主題演講。這樣的組合，包括科技、研發、產業、工商、文化五大層面。這個原則定下來後，其他的步驟，便一一展開。

實際過程是極為曲折的，試想在這個歷史時段裡，要使在台北的「陸委會」首肯，在北京的「國台辦」同意，以至發給證照的先後，中轉站的安排等等，可說是困難多重，幸好在中科院與工研院的主辦同仁精心合作下，周光召院長一行二十五人，內含十位中科院的學部委員（院士），終於在1994年1月底到達台北。訪問團的科技界領袖，包括師昌緒、徐光憲、高小霞、王震西、李成功、李依依、郭景坤、倪嘉鑽、郭傳杰、楊建國、鄒世昌、鍾雪友、仲增鏞、陳念貽、吳健生、金琳、洪廣言、龍春滿、李培良、劉忠良、洪及鄙、郭蘊宜、張壽榮等，都是科技界的領導，一時俊彥，亦是首次來台。雙方學者，共聚一堂，敘舊道濶，無任快慰。周院長一行在台灣逗留了五天，在討論會後，除在台北外，亦分組參觀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國鋼鐵公司等，並在日月潭瀏覽日月光華的湖山勝景。

我事先請教周院長是否願意與會外人士見面。周院長說因係個人身份及學術會議，此行最好保持低調。所以他抵埗當天，我為他洗塵，只敦請了陳立夫、孫運璿兩位資政作

陪。立公原來是光召院長舊識，璿公則雙方仰慕已久，晤面之餘，賓主盡歡。

會議開始時，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據《交流》雜誌第十四期（3月份）的記載，有下面一段：

1994年1月17日「兩岸產業科技會議」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不同以往個人或個別單位之大陸學者來訪，這次兩岸大規模的科技、學術交流活動，在開幕典禮中，三位台灣科技大老級的人物，總統府資政孫運璿、李國鼎、吳大猷，以及四位國家級機構領導人，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大陸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工研院董事長張忠謀、院長林垂宙，大家相聚一堂，形成兩岸多年來首見的科技高峰會，也為雙方科技交流創造了更寬廣的空間。綜觀此次兩岸產業科技會議的實質意義，如同前中研院院長吳大猷所說，這是兩岸科技菁英首度具體、深入探討交流會議，實為兩岸中國人共同的驕傲。

這次會議中，除了對兩岸科技發展的長程目標及涵蓋層面有進一步了解外，亦深入探討雙方在鋼鐵、航空材料工業合作的機遇。正如《交流》雜誌所報道的：「隨着（此次）會議的順利展開，兩岸科技交流已從理論式的紙上談兵，進入實質交流的新境界。」

從這次訪問之後，兩岸的科技人員，來往更為密切，亦促進了此後許多產業科技的合作，對大陸科技產業的發展，自有正面的影響，不必細述。我想這個結果對孫資政來說，應可說是差強人意吧。

台灣科技產業在1970年代，可說是播種時期；1980年代，可說萌芽時期；1990年代，可說是開花時期；到了二十一世紀，如果幸而能持續發展，應該是結果及豐收的時期。這過程中成功的喜悅，亦有挫折的沮喪。如果能虛心的檢討經驗，善用教訓，應該能對大陸以及開發中國家或經濟體系提供借鏡。孫運璿所開始建立的國家創新機制能夠一步一步的運行，工研院所播下的種子，在這個關鍵時刻，能够茁壯而扮演橋樑的角色，促進兩岸交流。它們能協助未來經濟及社會的進步，可說是始料未及吧。

這裡我要特別指出，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待時」，又云「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些雖說是老生常談，但給我許多啟發。周院長來訪過程中困難極多，但《中國時報》報系許多朋友和工研院工作伙伴的支持，範英學長的慎思敏行、直諒多聞，是促成這次歷史性會議成功的重大因素。

## 個人感懷

孫運璿是典型山東大漢，偉岸英挺，氣宇軒昂。然而他望之儼然，即之亦溫。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官架子，亦聞

不到絲毫銅臭味。他有一種自然的親和力，讓人覺得是久別的老朋友。他參加會議，絕不遲到，亦不玩大官的「訓話、再見、趕場」三部曲，既然來了，就好好學習。後來他行動不便，在輪椅上亦是正襟危坐，儀態端莊，不讓與會的人員有任何特別的感覺。「厲而溫」、「恭而安」，是他極好的寫照。他的言行舉止，在台灣的民眾早已習慣了。大陸來的人士，看到他的敬謹尊重，景慕不已。我和一位來訪的朋友說，孫資政就是台灣精神的楷模。

最近的十多年裡，我經常住在香港，與孫資政見面較少，但資訊仍然暢通。他去世當日，我在北京演講；追思禮拜的時候，我在南沙主持會議，均未能前去致意，實可說悖禮薄情之至。但是心裡，無時無刻不在懷念着他。

回憶他1970年代的英姿煥發，卓然不群；1980年代的威而不猛，侃侃如也；1990年代之後，國情遽變，人事日非，此時的孫資政，心中愴然，而無可奈何。

他是一典型的讀書人，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悲天憫人的情操。他亦是一個真正的工程師，有崇高的理想和求真求實的信守。

在他最後的二十年裡，大家惋惜他的投閒置散，埋怨上天對他的不公。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假設他的健康良好、行動自如，以他「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自然是豪氣干雲，昂首闊步。在這段時間裡，難免會被捲入凶險詭譎的政治鬥爭之中。然而豺狼當道，大勢難迴，他雖有菩薩心腸，

能否全身而退，實未可知也。所以上天的安排，確實巧妙。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斯之謂乎！

最後，我且借用清朝沈葆楨紀念鄭成功的對聯，略改數字，獻給敬愛的孫運璿先生：

開萬古固未曾有之奇，科技促進中興，為生民立命  
極半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一代完人

我何幸能在二十五年前認識他追隨他，還有機會為社會做點小事，為中國未來貢獻棉薄，自覺是上帝給我極大的恩寵！

參考：林垂宙〈孫運璿的政治家志節與工程師風範〉，《傳記文學》第八十八卷第五期，台北，2006。



# 霍英東：平凡的人非凡的事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

霍英東的逝世，引起了國內外廣大的、一致的悼念。社會對他高度的評價，可說是沒有爭議性，這在香港，可說是近年來的異數。霍英東許多令人感念的事蹟，已經有很多的記載。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霍英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認為霍英東是中國文化傳統上能負大責任，有大承擔的人物。就是孟子所說「天降大任」的人物。

中國文化上的「大人」不是指皇親國戚，或豪門巨賈。他們大都出身於寒微的家庭，有着平凡的背景，遭受艱苦的際遇，經過環境的折磨，然而由於他們個人不斷的努力、奮鬥、奉獻，終於脫穎而出，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做出關鍵性的貢獻，留下他在歷史上的地位。

## 天降大任

《孟子》裡有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孟子所稱頌的「大人」是：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起於板築之間，膠鬲舉於漁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我的注解是：虞舜是個農夫，傅說是建築工，膠鬲是打漁的，管仲在監獄服務，孫叔敖做航運，百里奚搞貿易。這些孟子所標榜的大人物，不是養尊處優，高談闊論的人，都是活生生，一步一腳印，不怕辛勞，力行實踐的人。

了解霍英東背景的人，會覺得孟子天降大任的段話是霍英東很好的寫照。他出身蜑民，世代都受欺壓。小的時候，居無定所，以海為家。他每天暴露在火辣的太陽下幹活，穿不夠、吃不飽，經過多少艱難，受到多少阻挫。1950年初他帶領船隊突破封鎖線時，冒著多少危險？五十年來他亦忍受了許多人的欺侮：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還有不同時候的中國人，都給他吃過苦頭。有記載說，他在三十歲時幾乎天天都生活在逃難的狀態，廢寢忘食，時常是肚皮貼著背脊，體重只有40公斤。就是在這種環境下，他鍛煉出剛毅的性格，寬宏的度量，堅定的決斷，熱切的同情。也是在這種環境下，他早年已經對國家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

毫無疑問的，我敢說霍英東就是孟子所說的「天降大任」的歷史性人物！

我想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在霍英東晚年，他最想完成是什麼？」

霍英東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率先參與國內的建設。他修橋、鋪路、建設廣州白天鵝大酒店、捐款給大學、中學、小學、醫院、博物館、圖書館等等，許多人都耳熟能詳。我想這些事情最重要的意義，一是雪中送炭，在當時國內資源非常缺乏的時候，這些雪中炭，不管多少，都是極端重要的。二是開風氣之先，他的帶頭，對其他企業領袖，有指標作用。

## 不求名不逐利

他在珠三角工作的最近十五年，是以南沙為重點。我認識霍英東的時候，他已在南沙耕耘多時。有幾次參加南沙的工作例會，看到他七十多歲的人，仍然有五十歲人的幹勁。他在會前或會後，常帶着主要幹部從一個項目看到另一個項目，從船廠一直走到水鄉，不憊其煩的聽同人報告，握手鼓勵他們，這麼辛苦，為的是什麼呢？社會上，甚至國際上許多人士，都對他的內心理想，都感到興趣。

誠然，大千世界裏，形形色色，有人求名，有人逐利。霍先生是為名，還是為利？

說名嗎，霍英東雖然行事很低調，但早已名滿全國。他不喜歡名字時常見報，亦不喜歡到處把名字掛在牆上。說利嗎，他的財富雖然不如比爾蓋茨，但亦列名世界前五百。如果他的興趣是利，應該可在香港、澳門、上海或北京大搞地產，終究他是香港「樓花」商業模式的創始人；他亦可以找一些財務專家替他買賣股票或併購公司。但捨棄這些熟悉易賺錢的路不走，而要在不見經傳的南沙，花錢、出力、受氣，他究竟為的是什麼？

我認為這就是霍英東與眾不同的地方。他的思維，超越時尚或傳統的模式。他是有理想、有方案、有決心的人。他主要的出發點不是為個人一時的名利，而是為社會長程的發展。他不要為求結果走捷徑，而要以耕耘的過程去收成。他要用實踐篤行的方式，去領導社會並淨化社會的風氣。實際上他亦覺得時機難得，因為他的摯友何銘思先生器識卓越，和他理念一致，並可以全力協助他。

所以當1999年霍震宇和我們香港科技大學幾個同事腦力激盪後，跟他說可以透過建立資訊科技園的方式，發展技術創新，培育高級人才，促使南沙成為一個進步繁榮的社會，他馬上就顯得興趣勃勃了。我跟他說，不過這種建設基礎和培養人才，實在應該是政府的責任，以個人的力量去做，是

很辛苦的。而且科技園只是一個平台，本身是很難賺錢的。他瞪眼看著我說，我要發展科技園，不是為了可賺錢。如果有一天它能有收益，即管是賺一塊錢，我都要用它來發展科技、教育或慈善事業。我聽了之後，實在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在這個背景之下，香港科技大學的領導，以鍾士元主席、吳家瑋校長為首同意積極投入，所以南沙資訊科技園的工作，就開始了，這個項目由我負責。在過程中，我做了許多一般人不敢做的一些決定，霍先生非常容忍我，從未說過第二句話，令我有知遇之感。

## 實踐篤行

2003年我在科大副校長任內退休，另參加了一個科技創新風險投資公司時，霍先生、何先生對此很有意見，再三要我回來，幫忙南沙的發展，希望盡快把南沙再推上一層樓。我說現在因為廣州市政府的積極參與，南沙的遠景大好，原來霍先生所希望的，看來一步一步可以實現。但是霍先生總覺得許多基礎的工作，如培養高級人才、發展創新技術，應該要特別加強。所以我提出南沙資訊科技園第二期計劃，建議在南沙建立一個創新機制，促使大學、研究、高新企業及科技園的通力合作，這需要重新投資港幣8億元，霍先生毅然同意了。這項為發展科技，培養人才的重大個案，國內外媒體都廣為報道。

香港科技大學的南沙研究院，是南沙資訊科技園第二期計劃的主要成分。對科大陳祖澤主席、朱經武校長、錢大康、陳玉樹、黃玉山三位副校長的全力支持，霍先生非常欣慰。我們的構想是使2008年香港科大南沙研究院成立，與科技園結合，並聯手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及國內主要大學等通力合作，南沙將可以說是一個獨具特色的創新基地。霍英東建設南沙，以為未來珠三角以及中國在新經濟中發展的典範，這個夢將可以成真了。

## 真君子大丈夫

總括來說，霍英東先生是一個有宏觀思維的人，注重實踐篤行，而具有典型中國人哲學人生觀。南沙資訊科技園會議中心的大廳裡，雕刻着孫文親筆的《禮運·大同篇》。很多人都知道，孫中山先生是霍英東所景仰的一位革命先知。我有一次和霍先生談到孔子大同社會的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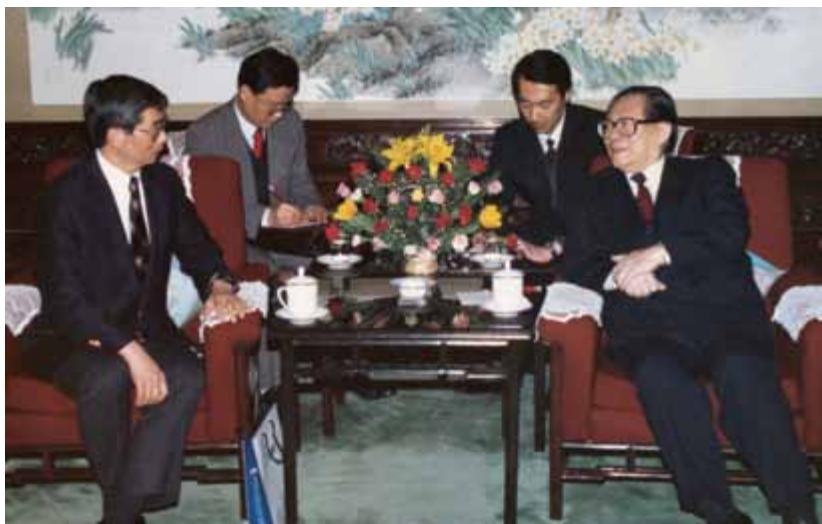
他的眼睛裏閃耀著光芒說，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他這話一說，對我來說可是石破天驚！我想這就是晚年霍英東的理想。他要以南沙為試點，以科技及人才為動力，建立一個繁榮、開放、和諧的社會，並可作未來中國國家發展的榜樣。

大家悼念霍英東的逝世，自然覺得很悲傷，其實他享有八十四的高齡，事業發達，子秀孫賢，可說是「天佑善人」，「福壽全歸」。然而，可遺憾的是他的南沙理想，仍未及時成功。要達成他的理想，困難仍然很多。我們在悼念這一位看似平凡的長者，更要緬懷他不凡的風範和志節，並能協助完成他的未竟事業，實現他的南沙理想。能夠如此，霍英東的名字及典型，將可留下給後代子孫，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

最後，我以下面的對聯，總結個人對霍英東的觀察：

好學以致知，力行以近仁，行善為最樂，是可稱真君子。  
愛國而忘身，見義而渺利，容忍而克己，此之謂大丈夫。

註：本文2006年11月17日發表於香港《信報》、《文匯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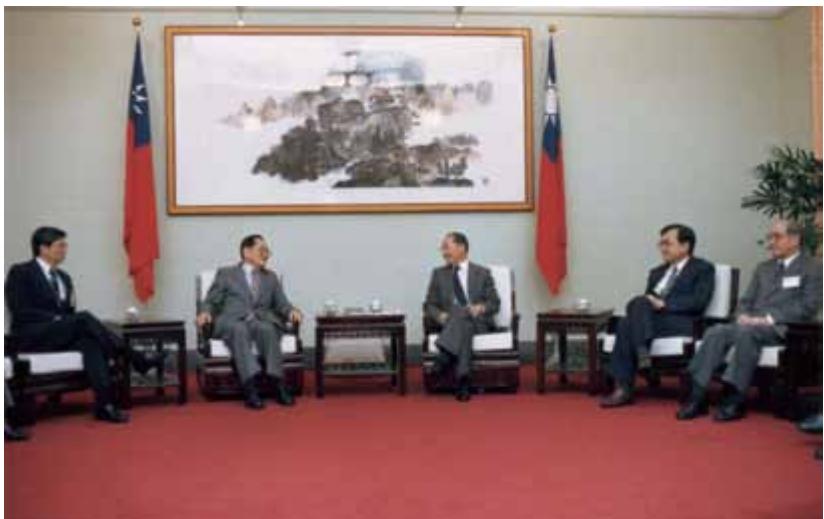
與江澤民總書記會面，談全球化及中國未來之遠景。北京，中南海。1993. 3. 24



與朱鎔基總理會面，談中國工業技術之發展。北京，中南海。1993. 3. 25



參加「國建會」，與蔣經國總統會面。台北。1977. 7



與工研院技術顧問委員會成員拜會行政院長俞國華，會報VLSI技術發展及  
台積電公司 (TSMC) 移轉案。

左起：林垂宙，潘文淵，俞國華，沈君山，羅无念。台北。1988



向李登輝總統介紹電腦通訊技術。工研院院區，新竹。1991  
右起：鄭瑞雨，李登輝，張忠謀，林垂宙。



向李登輝總統解說工研院新實驗大樓創新廣場之工程設計。  
工研院院區，新竹。1992  
右起：張忠謀，李登輝，邱進益，林垂宙（立），劉榮隆（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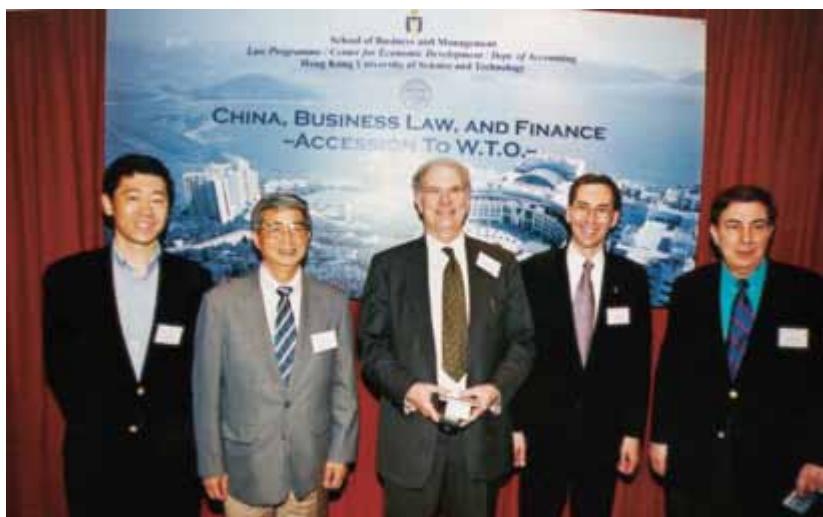
陪同香港科大朱經武校長（中），周敏敏館長（右）接待北京大學訪問學者。  
香港清水灣。2002



在香港科大與工業界人士及青年創業家會談。香港清水灣。1999



主持香港科大論壇與香港社會領袖講者合影。香港會議及展示中心。2002  
左起：香港科技園CEO 譚宗定，SAE公司總裁梁少康，林垂宙，Esquel公司  
總裁楊敏德，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建鋒，香港科大教授曾明哲。



在香港科大企業管理學院接待訪問學者。香港清水灣。2002  
左起：李稻葵，林垂宙，Joseph Vining，Gary Biddle，Orlan Lee。



主持香港科大國際論壇，與國際學者訪問南沙。廣州 南沙。2001. 3. 21  
左起：清華大學薛瀾教授，史丹福大學Henry Rowen教授，林垂宙，  
哥倫比亞大學Richard Nelson教授，渥太華大學Michael Kelly教授。



陪同貴賓參觀建設中之 南沙資訊科技園。廣州 南沙。2002  
左起：何建立，梁玉楣，吳家璋，林垂宙，何銘恩，霍英東，梁國偉，  
黃安發，霍震宇，錢大康，高秉強，宋志源。



與南非科學工業研究院（CSIR）簽訂技術合作協議。

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亞（Pretoria）。1989

左：林垂宙，右：Dr. Chris Garbers, President, CSIR



與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簽訂人才交換協定。台北。1989

左起：史欽泰，林垂宙，Dr. Ian Ross, President- AT&T Bell Labs，張忠謀，  
方賢齊，張瑞昌，谷家恆。



與英國Lotus Engineering公司簽訂汽車共用引擎研發計劃，簽約儀式中經濟部  
次長楊士緘到場祝賀。台北。1992



歡迎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訪台參加學術研討會，訪問工研院。  
工研院，新竹。1994.1  
左起：林垂宙，周光召，劉榮隆。



歡迎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訪台參加學術研討會，與嘉賓晤面。

台北。1994. 1

左起：郭傳杰，楊建國，李雅，李永昌，周光召，李國鼎，趙耀東，  
張忠謀，林垂宙，王鍾渝。



歡迎中國科學院科學家來台參加學術研討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1994. 1

前排左起：徐光憲，師昌緒，林垂宙，張壽榮，鄒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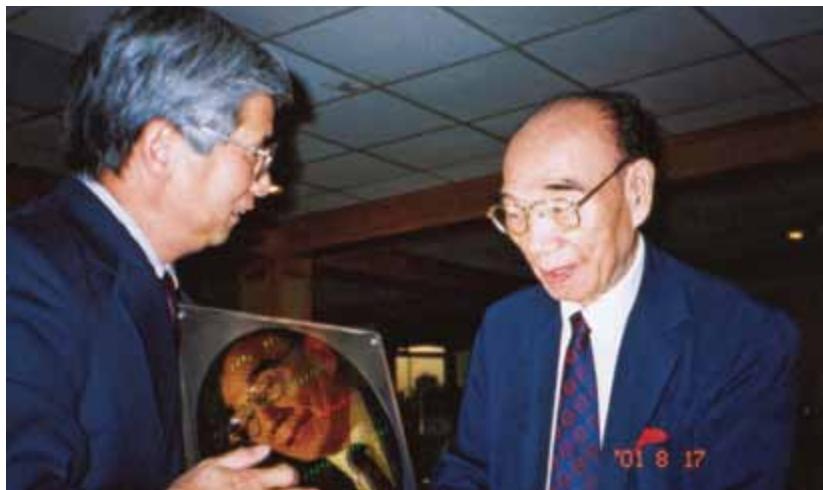
後排左起（一至四）：王震西，李依依，高小霞，劉榮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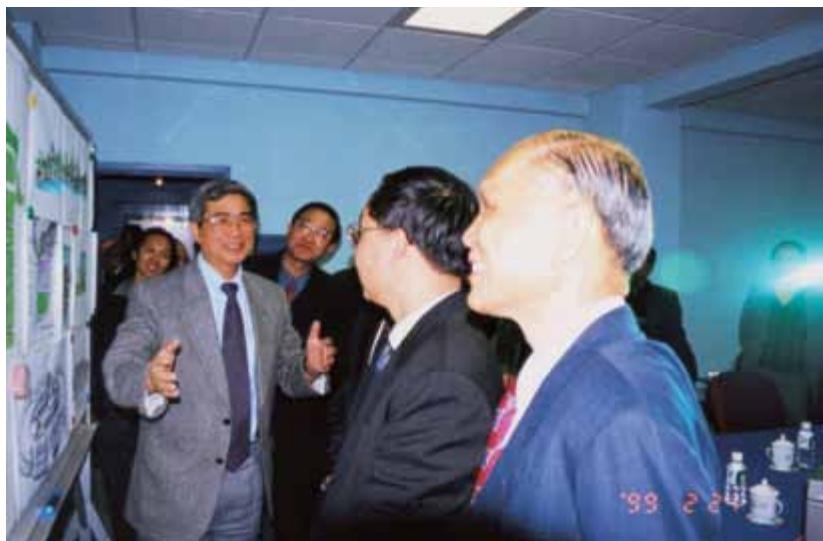
孫運璿先生病後參觀工研院材料所。工研院，新竹。1986  
左起：方賢齊，張忠謀，（醫護人員），徐賢修，孫運璿，林垂宙。  
工研院，新竹。1986



工研院 20 週年年慶日，孫運璿先生接受美國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典禮中致詞。台北市，中央圖書館。1993  
台上前排左起：林垂宙，徐賢修。經濟部長江丙坤。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



代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工會致送 12 英吋晶圓紀念品與徐賢修教授，  
慶祝其九十嵩壽。於美國普渡大學。2001



向廣州市市長林樹森介紹南沙資訊科技園（Nash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k, NITP）構想。廣州南沙。1999  
右起：霍英東，林樹森，（後排）楊永弼，林垂宙，（後排）劉珩。



與廣州市政府會談南沙資訊科技園計劃。廣州南沙。1999  
左起：林垂宙，霍英東，林樹森，何銘思。



香港科技大學與霍英東基金簽訂開發NITP第二期協議。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2005. 7. 11  
左起：霍震霆，朱經武，霍英東，陳祖澤（香港科大校董會主席），林垂宙。